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Quarterly）

2020年第3期（总第145期）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任 杨益新

副主任 尹晓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鹏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晨光 刘第红 李辉
杨云霞 杨益新 张艳宁

主编 李辉

责任编辑 杨丹 陆风 刘怡
田锦 王鹏 程凯丽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9月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 冯 刚 刘文博 1

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研究

/ 齐卫平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确立、内涵及意义

/ 刘俊彦 叶子鹏 16

高等教育研究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的危机与生机

——以学校场域为视角

/ 董云川 曾金燕 25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主题、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 袁利平 师嘉欣 33

社会正义论视角中的新高考公平性问题研究	
/ 王新风 钟秉林	42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的考察	
/ 洪银兴	49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文化交流探析	
/ 陈美华 肖明慧	60
从恐惧到言说：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无声告白》中人物的身份认知情感解读	
/ 李利敏	69

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

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	
/ 郑佳宁	78
民法典背景下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的法律规制	
/ 张凌寒 杜 婧	85

军民融合研究

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实现机理和形式	
/ 杜人淮 郭 玮	93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李 慧 康 静 王 霞	102

CONTENTS

A Research on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Network Environment / <i>FENG Gang LIU Wenbo</i>	1
A Study of Xi Jinping's Major Arguments on Upholding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QI Weiping</i>	8
The Establishment,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Youth Policy / <i>LIU Junyan YE Zipeng</i>	16
The Crisis and Vitality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ol Field / <i>DONG Yunchuan ZENG Jinyan</i>	25
The Strategic The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 <i>YUAN Liping SHI Jiaxin</i>	33
On the Fairnes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 <i>WANG Xinfeng ZHONG Binglin</i>	42
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i>HONG Yinxing</i>	49
An Analysis of Movie Cul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i>CHEN Meihua XIAO Minghui</i>	60
From Fear to Tell: A Cognitive-Emo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in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 <i>Li Limin</i>	69
Regulatory Path f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 <i>ZHENG Jianing</i>	78
When Drone Comes: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Civil Law Code Background / <i>ZHANG Linghan DU Jing</i>	85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Form of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Defense Industry to Lift the Level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i>DU Renhuai GUO Wei</i>	93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Us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Based on DEMATEL Method / <i>LI Hui KANG Jing WANG Xia</i>	102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冯 刚 刘文博

摘 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思想基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给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网络环境下应对这些挑战,学校层面要把握时代发展,推动爱国主义入脑入心;家庭层面要重视家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社会层面要注重法治建设与舆论引导,为爱国主义教育保驾护航;同时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凝聚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合力。

关键词:网络环境;大学生;爱国主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01-07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网络已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新场域。网络一方面拓展了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平台,促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众化,另一方面网络的隐匿性和自由性也给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同志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2]“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3]青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网络环境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爱国主义成为大学生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让爱国主义在大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既关乎青年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也是时代赋予

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使命。

一、学校层面:把握时代发展,推动爱国主义入脑入心

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4]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著的成效。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向上,绝大部分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7》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爱国价值实现程度的评价较好,从2015年到2017年,大学生对“绝大多数中国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9ZD019);陕西高校辅导员精品项目“书院制背景下‘家文化’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19FXM15);西北工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研究”(2019AG08)

作者简介:冯刚,男,四川乐至人,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刘文博,男,福建南安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人是爱国的”这一观点的认同度呈递增趋势，2017年达到89.9%。^[5]这说明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由于高校在重视程度、工作力度上存在差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教育目标上缺乏个性化设计，存在大一统的片面现象，未能尊重不同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差异，设定分层次的教育目标。二是教育内容上缺乏时代性，未能与新时代发展背景相结合，过于强调政治理论的学习，偏重知识传递、理论教化，忽视了受众的情感和行为能力的培养。三是教育方式上缺乏创新性，存在形式主义问题，爱国主义教育往往成为一种走过场的抽象、空洞的说教，手段单一，多采用正面的灌输和说服教育，未能充分发挥网络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优势。解决好这些问题，高校要注重整体性与个性化相结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虚拟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着力提升爱国主义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教育目标上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整体性与个性化相结合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6]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7》调研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生源地、家庭状况、年级、政治面貌、学校类别大学生的爱国价值观践行意愿是存在显著差异的。^[7]不同的青年个体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思想道德水平良莠不齐。因此，高校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性与个性化相结合，在整体统一的长远目标的前提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爱国主义教育规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群体，科学设置相应的远期、中期和短期的发展目标，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进行优化调整，在达成整体教育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体成长目标。

（二）教育内容上要强化理论武装，注重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理论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爱国主义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被无数仁人志士实践过的优秀精神资源，具有历史传承性。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体现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处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表现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的爱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自力更生、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是爱国主义的内涵。这意味着爱国主义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爱国主义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8]因此，网络环境下，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长期以来形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厚重的历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既要反对盲目自大，又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强化对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解读；特别是要针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中存在的种种困惑，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紧扣社会现实，用丰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典型事例启发学生思考，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增强爱国主义的认同。

（三）教育方法上要紧扣信息化步伐，注重虚拟性与现实性相结合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爱国主义教育营造了新的空间和渠道。高校要把握好信息化发展趋势，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成长规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高校可将爱国主义学习资源、教育手段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使得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要采用微信、微博、QQ等广大大学生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多媒体、人工智能情景模拟、现场实践教学等先进技术,创新教育手段,给学生以不同的情景体验,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效。要通过《我和我的祖国》《厉害了,我的国》《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爱国主义电影、动漫等网络音视频,以及动图、表情包给学生以深刻的感受;运用抖音、快手等播放短视频的方法渲染大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合唱、快闪、心理剧等线下情景让大学生切身实践爱国行为。要让大学生参与到爱国主义伟大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了解国情、感受成就,增强使命感。要把仪式礼仪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在仪式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有效的情景认知模式,丰富仪式教育的内涵,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

二、家庭层面:重视家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家庭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初始性和长久性,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初场域。^[9]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家庭教育与环境熏陶的民族。习近平同志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10]纵观历史,从古代岳飞行军、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期盼,到现代钱学森父母“读史书、忠于国”的教诲,再到黄大年父母“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叮嘱。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无一不是来自于家庭教育的滋养和培育。因此,家庭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的言传身教、谆谆教导,使家庭成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关键环境,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少数家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呈现出一些弱化或者忽视的倾向。从思想观念上看,有的家长可能只重视眼前的得失,未能从长远发展角度认识到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性,重视孩子文化知识的学习,忽视个人道德情操的培养,认为爱国主义情感太抽象,应该是学校和

国家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有的家长轻视家庭教育的连续性,认为“孩子上大学了,已经成人了”,有“喘口气,歇一歇”的念头,一定程度上导致在青春期后期这个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在家庭层面上出现了缺失和退场。从自身素养上看,不同家长由于自身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存在教育方式的差异。有些教育方式如专制型、溺爱型、放养型,不仅无益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往往还会给爱国主义情感的养成带来负面效应。从家庭氛围上看,有的家庭受不良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影响,或是秉持陈腐观念,未能与时俱进,形成了恶俗、庸俗、低俗的家风,长期不良氛围的熏陶,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 家长要转变观念,把握契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大学生有没有爱国主义情怀,不仅对国家有重要影响,对家庭,对个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大多数家长都“望子成龙”,而真正“成龙”需要将个人的价值展示出来,为社会、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才是个人的最大价值体现,而能否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也会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格局。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思想,家长采用中小学时期的教育方法自然是行不通,但以“他们已经长大,不用再管了”“大学老师全权负责”的态度来面对亦是不可取。所以家长要转变传统观念,牢固树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的理念,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作为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第一要求,作为大学生的立身之本,成长之基。专业知识大都由学校传授,而价值观的形成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它是家长有意识地通过家庭生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动。这就决定了家长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的生活,把握好教育的契机,因时、因地开展教育工作。如家长可利用假期,带孩子到博物馆、纪念馆等有历史底蕴、文化价值的地方进行参观,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也可通过观看《我和我的祖国》《建国

大业》等优秀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唱红歌、阅读红色经典系列图书等形式,寓教于乐,培养孩子爱国情怀。通过这些形式,让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二)家长要注重家风,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1]家长要注重家风建设,将爱国主义精神写进家风,努力挖掘家规家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发掘家族历史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踏实勤学的感人故事,让大学生传承家规家训所体现的家国大义和民族情怀。“言传身教”是从古至今家庭教育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父母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美丑、高尚卑俗,都会深深地孩子脑海中扎根,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古代“曾子杀猪”的故事就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作为家长要从自身做起,主动地陶冶爱国主义的情操,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做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践行者,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中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实际行动,从热爱乡土、热爱父母和身边的人开始,为孩子做出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社会层面:注重法治建设与舆论引导,为爱国主义教育保驾护航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网络环境下,人们的社会关系除了线下近距离接触的传统关系外,更多的是处在虚

拟社会中的网络关系。网络的开放性与流通性给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的途径,使之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实施。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给中华儿女进行了一次集中、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爱你,中国”的礼赞,“奋斗吧,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涌动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上映前后甚至上了43次微博热搜;各种版本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通过网络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男女老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哼起的歌曲;众多新闻媒体公众号、政府官方公众号都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发布国庆系列短视频,获得了持久的热度与较高的阅读量、点赞量,激发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

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交往的空间限制,使得当今的社会更加开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信息的互通更加频繁,但同时也给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全球化的发展冲击了国家观念。全球化依托网络的发展进一步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逐步形成高度依赖与互嵌式的国家关系,“地球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概念,冲击了爱国主义的文化基础,影响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二是部分社会思潮冲击了爱国意识。西方敌对势力将带有浓厚不良政治色彩和价值取向的西方意识文化,通过网络的全球性、即时性源源不断地对青年学生进行侵袭。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渗透,使得部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的青年开始向往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冲突,降低了集体主义感、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动摇了爱国主义根基。国内历史虚无主义乘机借“还原历史”之名,丑化党的主要领袖与英雄人物,妄图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影响了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动摇了爱国信心。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多样化,民生问题往往容易形成舆论关注的焦点。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别党员干部信仰摇摆不定,出现了以

权谋私、权钱交易、生活糜烂、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做出了与党员的要求、党员的身份格格不入的事情,严重动摇了大学生爱国主义信仰的信心。应对好这些挑战,是网络环境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题。

(一)要强化法治建设,守好爱国主义教育的“定盘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国家要加强法治建设,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和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施,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从情感自律向法治他律的转变。要大力宣传、普及宪法等法律所规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有效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通过执法手段,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与约束力,对违背爱国主义的行为依法严肃惩处,使爱国主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二)要善用网络舆论,树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风向标”

由于网络具有公开性、快速性、广泛性等特点,相比传统舆论,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更广。2019年国庆节前夕,央视新闻微博官方账号发起“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的话题,这个话题引爆网络,网友们纷纷刷屏转发,表达热爱祖国、护卫国旗的真挚感情。该话题的阅读数达到74.7亿次,讨论数更是达到1463.3万条,营造了良好的爱国主义舆论氛围,激发全体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因此,要加强主流媒体建设,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传播矩阵,筑牢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阵地。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独特优势,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在议题设置、内容表达上下功夫,提高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要大力选树、宣传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弘扬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营造全社会学习英雄模范、追求英雄品质的良好氛围,激发社会正能量,凝聚起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培养更多如“局座召忠”等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在网络舆情中的积极作用,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要创作更多优秀的爱国作品,筑好爱国主义教育的“蓄水池”

习近平同志指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13]爱国主义凝结着中华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诚挚的热爱,一直是文艺创作的主题。全社会要创作一大批爱国主义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采用独特话语方式以契合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的成长需求,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天府事变”乐队以说唱音乐与爱国情怀相结合的音乐作品,在符合社会音乐文化发展需求的同时,既吸引了青年人的关注点,也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更为多样化。又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爱国主义漫画系列作品,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动画片之中,《厉害了,我的国》走入高校放映,让大学生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再比如《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战狼》等英雄主义情怀爱国系列电影,这种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逻辑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传递了正能量,满足了受众崇尚英雄的心理以及对坚毅品格、顽强拼搏的精神需求。

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合力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持久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有机配合、协同联动。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由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载体多变,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在信息互通、资源整合、协同联动方面未能形成有效合力,一定程度影响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为此,构建科学、规范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整合各方

面的教育资源,发挥好各自的独特优势,是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最大化的关键。

(一)在信息互通上做好协同

学校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要加强与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家庭的联络沟通。要以大学生成长需求为导向,搭建线上线下的交流沟通平台,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络沟通会商机制、信息互通机制。特别是着重就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工作难点、焦点问题,定期开展情况通报、形势研判、总结研讨,充分发挥三方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有效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形成协同育人工作合力。

(二)在资源整合上做好协同

学校和社会要助力家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在社区、街道、村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围绕家风建设、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方面,通过报告会、文化展演、印发学习手册等形式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加强家长培养培训,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学校要利用学科专业与人才队伍的优势,组建一支政治过硬、作风端正、品德高尚、业务精湛的专业工作队伍,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产出一批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社会媒介、新闻媒体,努力挖掘家风家训背后的爱国情怀故事,重点打造一批具有现代化气息、能够传播爱国主义情怀的优秀家风文化节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强化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力度以及舆论引领,营造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生活氛围与实践场景。高校要把家庭中优秀家风家训融入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全过程,政府部门要把优秀家风家训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教育资源融入社会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守则等行为准则中,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遵循。学校、家庭、社会三者通力配合,形成合力,家风聚为民风,民风汇成国风,构建以家风文化渗透、滋养爱国主义情怀的长效机制,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14]

(三)在考核评价上做好协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评价是一个涉及多种要素和诸多环节的系统工程。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也就决定了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成效的考核将会涉及多个领域、部门和环节。因此,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的考核评价机制,要有利于全面考察、客观评价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的现状与成果,要从考评内容、考评方法、考核主体等方面建立面向大学生成长全过程,家庭、学校、社会全民参与的考核评价体系,同时要注重评价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努力构建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评价体系。

五、结语

爱国主义一直是团结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头脑,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齐心协力唱响网络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主旋律,教育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相结合,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大学生的坚定信念、精神支撑和行动自觉,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有爱国主义情怀、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2] 习近平.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 [3]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9-11(1).
- [4] 冯刚. 改革开放40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编年史(1978—2018)[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91.

- [5] 沈壮海, 王晓霞, 王丹.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 2017[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0-113.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7] 沈壮海, 王晓霞, 王丹.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 2017[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0-113.
- [8] 习近平.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 [9] 冯刚, 高会燕.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蕴含[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16-23.
- [10] 习近平.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新风尚——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13(1).
- [11]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2-18(1).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35.
- [13] 习近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10-16(1).
- [14] 张琳, 陈延斌. 传承优秀家风: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J]. 思想政治工作, 2016(1):166-171.

A Research on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Network Environment

FENG Gang LIU Wenbo

Abstracts: Patriotism is an inherited and eternal spiritual pow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lso an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Grow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ocial information explos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ve posed critical challenges to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or “digital nativ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in network environment, schools should make patriotism well-perceived in the new era; families should value ethics and the children’s growing environment; society should 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guide public opinion; a trinity mechanism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should be created to maximize the effect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approach

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研究

齐卫平

摘要: 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以坚定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这些思想鲜明的观点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认真研究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把握正确方向、坚定政治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重要论述; 坚定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20) 03-0008-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观点鲜明,思想深刻,意义重大,构成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加强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研究,是坚持以新时代新思想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磅礴力量的现实要求。

一、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长链,“领导”是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关键词。虽然在我们党全面执政之前和之后,党的领导面对不同的历史环境、时代特点、奋斗任务和工作要求,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主导国家发展命运、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共同之处。由此而言,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今天才强调

的新问题,一以贯之的历史实践为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提供了历史的深厚基础,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现实的强大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既经历了曲折,又积累了丰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到21世纪,在坚持党的领导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的创新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以一系列深刻思想和重大结论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有什么样的突破?结合习近平重要论述,我们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认识。第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制度优势相联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2019JZD005)

作者简介: 齐卫平,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中共党史党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系，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这两个重大论断揭示了党的领导对彰显国家性质和制度优势的重大意义。第二，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契合，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2]这个观点表明党的领导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历史选择。第三，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战略相挂钩，指出：“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3]这个论述阐述了党的领导法律依据。第四，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实现人民利益相统一，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4]“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高度统一的。”^[5]这个思想表达了党的领导的价值诉求。这些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使党的领导呈现出更加全面、丰满和立体的思想意蕴。

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重要的创新，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上确立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地位和统领地位。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6]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中央引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点聚焦，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呈现了从制度建设向制度体系建构的发展新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完整框架形成体系性的建构。确立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根本领导制度的地位，代表了党的理论创新标志性成果。

二、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理论研究中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制度与文明相联系，认为不同的制度体现着不同的文明，因此把制度文明作为一个课题加以研究，对加深制度认识和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很有裨益。从微观角度看，制度就是一种资源，不管什么样的国家都需要依赖各种制度进行社会治理，国家运转以制度运转为路径依赖，制度的工具价值决定了它的不可或缺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7]人类社会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客观存在，只要进入世界体系，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国家竞争之中。竞争不是坏事，有竞争才有压力和动力。国家间的竞争不是弱肉强食，不是大国强国侵略欺凌小国弱国。长期以来西方霸权国家肆意打压、攻击、制裁别的国家，这样的行为是对国家间竞争的严重扭曲，受到各国强烈反对。国家间的正常竞争说到底还是发展优势的比较，制度优势是比较的重要方面，用“最大优势”看待制度优势，思想十分深刻。

从比较的角度看，首先要指出的是，各国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理由，因此，任何对别的国家制度进行质疑、批判甚至采取颠覆行动，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抄他人的作业，没有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在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呈现出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明显特征。习近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成果精炼地概括为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他指出：“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

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8]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发生在一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之治”的密钥就是制度显著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竞争中体现比较优势的关键。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性资源，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保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统筹推进，既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支撑，又有具体布局相应的体制机制制作辅助。这就使制度优势发挥覆盖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合力。制度对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以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增强物质基础，而且其本身具有国家软实力的意义。国家间竞争中制度优势的比较，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国家治理效能的竞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色，但它本身并不构成制度比较优势的实际内容，只有当我国的制度在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上展示出效能，才能产生制度比较优势。实际上，国家间竞争不可能在一个当量上，很多因素是不可逆转的，如国家规模、区域位置、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人的主观力量难以改变，但制度优势能在一定范围里弥补自身发展的不足。小国某方面的竞争优势大国不一定有，发展中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某些竞争优势。全面地看，国家间竞争不是比出谁强谁弱，而是看哪个国家能够在既定条件下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发展能力。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的论断，为深刻认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一个国家制度选择和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进行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发挥，违背客观规律的制度实践必将遭遇失败的厄运。世界上不少国家或者屈服于外

来压力，或者出于当权者个人意图，效仿搬用别国制度而吞下了苦果，使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泥潭，教训十分沉重。

世界上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制度模式，不存在统一的制度标准，那种世界各国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是根本站不住、根本行不通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和成功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突如其来的“外来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1]这些重要论述观点鲜明，导向明确，奠定了党和人民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长期实践的过程。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我国国体和政体的相关制度，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脉相承的制度探索伴随着与时俱进的发展，长期实践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厚实的历史基础。

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继承和创新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岁月里，虽然世界形势变化很大，国内情况变动频繁，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的主要制度在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实践中始终保持不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些主要制度在继承中得到发展，并在不断创新中丰富了内容和形式，形成渐进改进的制度发展链。

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本国土壤的实践。我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提供了滋养，我们党以深厚中华文化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植根中华大地，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领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和城乡差异大，我们党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坚持以满足人民期待为执政使命要求，使内生性演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靠、管用、有效，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的选择不可违逆。作为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蕴藏于14亿中国人民不可撼动的自信和持续暴发的韧劲。习近平指出：“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2]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引的好制度”“是有党的坚强领导的好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好制度”“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制度”“是为事业聚英才的好制度”。^[13]任何动摇这样好制度的企图都为中国人民所反对，一切想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决不会得逞。

四、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重大时代课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14]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制度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这既是中国的理论特色，又是中国的实践经验。鸦片战争后100多年中国人民寻觅救国救民道路的归宿，就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制度，中华民族实现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体现了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

作为“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表现在：第一，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15]“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16]第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证”^[17]，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中国道路，体现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代表着圆梦的信心和能力。第三，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8]第四，它是团结人民不懈奋斗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要把全体中国人民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连接点，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形成高度的制度认同。第五，它在国家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我

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20]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根，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失去了立足之基。第六，它是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内在要求。“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21]经历40年的发展，习近平号召必须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些丰富论述，从不同角度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重要论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战略定力的要求。定力就是力量把持的意思，国家发展缺乏战略上的定力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西方一些国家恶意攻击中国的主要靶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一直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22]“敌对势力也正是清楚这一点、畏惧这一点，千方百计、别有用心制造种种错误舆论，目的就是搞乱我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制度，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基。”^[23]面对外在挑衅，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制度认同上不乱分寸，在制度坚守上不乱阵脚，在制度执行上不打折扣。保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整个战略定力，我们党才能在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行稳致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制度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国家发展中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就有底气。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仅原先经济文化落后，基础薄弱，

发展滞后，而且又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别的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这样的国情和现实相比其他国家会遇到更多更难的问题和更复杂更尖锐的矛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着眼提高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反复强调我国发展中面临挑战和风险的严峻性。习近平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24]“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或被迫中断。”^[25]严峻形势不容我们有丝毫懈怠。

应对风险挑战需要全方位的举措，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最为重要的利器。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这场1949年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检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成功控制了疫情蔓延，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效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国家制度和体制优势发挥了作用。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外有些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代表性人物如弗朗西斯·福山）虽然对中国抗疫成绩作出肯定的评价，但他们又刻意回避国家制度和体制优势问题，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关系。显然，把中国有效抗击疫情的成功与国家制度和体制的优势相

切割的观点不符合逻辑，没有一点说服力。中国人民很明白，在疫情肆虐的重大危机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之所以能够上下同心、之所以能够举措有方、之所以能够有素不乱、之所以能够死守严防，背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优势的发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就是化解疫情风险挑战的法宝。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26]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尤其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范围的破坏性冲击，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进一步加重了风险挑战不可预测的严峻程度。“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底蕴是领略险峰风光必须牢牢把握住战略定力，化危为机，化险为夷，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六、以坚定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国家发展中，人民的信心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乏自信，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增强信心的核心话语。“在‘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更具体、更显现、更刚性。可以说，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强大底气和有力支撑。”^[27]

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广泛的民主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宽阔平

台，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恪守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执政理念，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中有更多更大更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和谐氛围，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有着这些赋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没有理由对它不自信，没有理由动摇而不坚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是用来聊以自慰的，既要知道自己所长，又要知道自己所短，是坚定自信的理性态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但并非完美无缺。习近平指出：“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29]“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30]“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31]制度自信之所以要保持理性态度，首先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哪项制度都做不到一步到位。其次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随着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既成的制度会出现不适应，缺少的制度会形成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封闭和静止的，需要在开放的动态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从时间上看，它萌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建立于社会主义探索之中，创立于改革开放发展之期，是70年时间连贯实践的成果。从空间上看，它在渐进改进过程中逐步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延伸到国家治理、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各方面，是全方位空间铺展创造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引用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说的一段话，向全党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任务。他用“前半

程”和“后半程”的时间概念进行叙事，提出从制度成熟和定型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前半程，“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2]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而且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3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4]新时代伟大实践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时间延伸中实现创新的空间提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2035年、2049年党的奋斗目标努力的方向。

七、结语

新征程要有新的思想武装，新实践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们党在即将迎来百年建党的重要时刻，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而趁势而上开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进军的历史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

有很重的分量，其中内涵的思想逻辑提供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实践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做好这篇大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增强制度执行力，不断提升制度认同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作出新作为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中国人民对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期待越来越高，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成为我们党实现奋斗目标和满足人民期待的宝贵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35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8.
- [3]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1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6.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90.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90, 125.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119.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12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7.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60.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11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1.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中国制度面对面[M]. 北京:学习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21-28.
- [14]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32.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48.
- [16]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32-734.
- [17]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3.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97.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3.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15, 22.
- [22]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648.
- [23]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3-84.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19-220, 226.
- [2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84.
-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3.
- [27]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中国制度面对面[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35.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48.
- [2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2.
- [3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6.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7.
- [3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9-10.
-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0.

A Study of Xi Jinping's Major Arguments on Upholding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 Weiping

Abstract: Xi Jinping's major arguments on upholding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a component of the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of h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The arguments,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in though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the basic leading system of our nation;" "Competition in system is the most essential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gradual improvements, and endogenous evolution;" "System influences the basis, comprehensiveness,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party and nation;" "Use system power to encounter impact from risks and challenges;" "Make our system complete and enduring" by fortifying our confidence. Those explicit viewpoints ar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party theory innovation. A thorough study of Xi Jinping's major arguments on upholding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f tremendou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correct direction and political standpoint.

Key words: Xi Jinping;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jor argument; fortify confidence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确立、内涵及意义

刘俊彦 叶子鹏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从治国理政全局出发,以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为观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更好地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青年工作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不仅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中国现实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实现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与时俱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春力量、推动我国青年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 青年工作;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七个明确; 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16-09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一代不断发展奋进的历史。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长久发展的历史高度,科学阐释并详细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根本方向、历史规律和基本经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青年事业、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革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瞩目成绩。然而,我们同样要认识到,当前伴随着我国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青年事业、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革都缺乏现有的经验方法作为参考。针对我国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判断、新理论、新思想,科学回答了事关党的青年事业成败的

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见微知著、由表及里,不仅包含了青年工作的具体制度建设,也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青年事业的宏观规划;不仅蕴含着我国青年工作的客观规律总结,而且囊括了群团改革的实践路径,洞见深刻、意蕴丰富。系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有助于强化党对青年工作与共青团工作的绝对领导,把握党的青年事业的时代走向。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确立

2018年6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乘新时代东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19ZDA146)

作者简介: 刘俊彦,男,山西新绛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青年思想与青年工作;叶子鹏,男,安徽池州人,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特聘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青年工作。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辞。贺军科同志代表共青团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的报告。报告指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体系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熠熠生辉。”^[2]6月29日下午, 共青团第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7月2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同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 在这次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等重要文献, 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完整体系。并系统阐明了“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要求”的内涵, 即“七个明确”; 共青团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阐明了共青团应当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如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焕发青年工作生命力, 继而打赢共青团改革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是基于长期的实践积累和持之以恒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 是在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倾注的无限关怀和大量心血中逐步融汇形成的, 既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渊源, 又渗透出深厚的历史情怀和饱满的现实观照。

(一) 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青年作为特殊群体, 被定义为代表着人类未来走向的力量。马克思在《伊默曼的〈回忆录〉》中指出: “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 不取决于老年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 而是取决于年轻人崇高奔放的热情。”^[3]认知青年的积极性、创新性、继承性、发展性和可塑性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群体规定性的深刻剖析。伴随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从社会关系层面去解读和分析青年的本质及其历史作用, 深入剖析青年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相对性与确定性的统一、现实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等特征, 彻底否定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从“思辨式的

绝对精神的神”的角度^[4], “撇开人的实践”^[5]来谈论青年的错误观点, 成为无产阶级正确理解和解决青年问题的根本立足点,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守正创新,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理论基础上赋予这一理论以丰富的时代内涵, 并在纵深层面和横向维度上进一步挖掘探寻。具体地说, 一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 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都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 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6]另一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密切联系我国青年事业实际, 对新时代我国青年的成长路径、责任使命、共青团改革和青年工作等方面都做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 以此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观的新视野、新格局、新境界。

(二) 亲身指导, 亲自谋划青年工作是重要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和青年成长成才始终高度重视。他耐心倾听青年心声, 与青年倾心交谈, 回信勉励青年, 领导部署共青团改革工作, 多次就青年工作和青年问题作出指示批示并发表重要讲话。据不完全统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青年及青年工作所作出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多达百余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便凝结在这一次次关心指导和一次次致辞、讲话与报告中, 对不同领域青年工作进行的不同侧重的阐述, 最终形成了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论体系。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六年, 习近平总书记夙夜在公、日理万机, 但不管他有多忙, 五四的时间总是留给青年人的!”^[7]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习近平总书记仍时刻关心着青年的发展与成长, 乐意与青年交朋友。1986年, 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期间关怀指导厦门大学学生张宏樑的故事已传为佳话。2011

年2月，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组织专家，精心治疗不幸患上急性白血病的大学生村官张广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张广秀回信，希望她保重身体，同时寄语全国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增长才干。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青年发展规划》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制定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的关心、对青年工作的重视。”^[8]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和部署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改革。“习近平指出，过去5年，共青团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的部署，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组织引导青年、推动青年发展、维护青少年权益、深化共青团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团的精神风貌呈现新气象。”^[9]共青团近年来坚守网络阵地、紧跟网络潮流，在微博、微信、知乎、B站、QQ空间、网易云音乐、抖音、快手等领域都出现了共青团组织身影，使信息时代的共青团组织活跃在各大平台，引人关注。

（三）远瞩高瞻，以国际视野定位中国青年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长河，青年一直都承担着主导未来的建设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更是青年所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共同需求。然而，国际形势并不总是随人所愿，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全球治理和世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异常严峻的区域争端和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国情发展，总结世情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全球化思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青年群体在新国际秩序建立和全球治理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中寄语世界青年：“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全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希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0]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关键在于青年之间“心相

通”。习近平总书记鼓励青年在国家交流中积极承担起桥梁纽带作用，勇于承担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建立中的使命责任，同时他也一直身体力行地推进青年互联互通，为青年之间的交往搭建平台。正是基于青年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全球治理能力的中国青年，夯实国际合作与互信的青年基础，为青年发展提供宽阔的国际舞台已成为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伴随着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实践不断发展完善，对“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与科学总结，彰显了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理论的深刻内涵。

（一）明确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

开宗明义，开展青年工作首先要明确其在党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中国青年就深深融入伟大的社会革命，并在之后的斗争中与伟大的社会革命同呼吸、共命运。毛泽东曾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1]此后，党和国家更是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呵护青年群体成长，关爱青年群体发展，关心青年群体未来，努力将广大青年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不断走向深入，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了更加深远的谋划和论断。在同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2]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

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3]从“抓住”到“用极大力量做好”,从“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

“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本质要求,是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薪火不绝、繁荣永续的应有之义。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繁衍更替,后人超越前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伟大事业的实现不可能仅靠一代人来实现,而是需要代代传承。“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14]青年工作就其根本而言,是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党和国家的根脉传承、永续发展为目标的事业,扎实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就是确保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青年的力量,因此,要用极大力量教育青年,培养当代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增强青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当代中国青年牢记历史使命,赓续责任担当,实现奋斗目标。

(二) 明确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15]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是什么,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方向是什么,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树立起中国青年运动社会主义方向的鲜明旗帜,鼓励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将自己的青春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结合,把青春梦想实践在祖国的壮美山河上。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6]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与个体自身价值的实现

密切相关。“人类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17]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中得以印证,自然也成为每一代青年应主动担负的使命与重任。

(三) 明确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

青年工作的职责谓何,使命谓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给出了答案。新时代青年工作要牢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切实完成共青团的使命与责任;同时,要把牢青年工作主线,组织广大青年以党的十九大任务部署为圆心,以专业特长为半径,奋进青春,建功新时代。

首先,新时代青年工作要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展开。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很多科技攻关、社会治理问题都需要一代代青年在接力奋斗中来攻克和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说:“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18]大历史呼唤大发展,大时代期待大作为,今天的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共青团更要时刻铭记根本任务,把“为党育人”作为工作的最终归宿,让当代青年真正成为“德才兼备”,永远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新人。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最大多数青年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19]这一重要论述回答了党的青年工作的政治属性问题,也更加明确了共青团工作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学生在高校生活,少则三到四年,多则九到十年,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需要加以正确引导”^[20],难免会受到外界各种思想的诱惑与干扰,

也会因遇到的现实困难而产生不良的倾向，这就会让青年在思想上产生“跟谁走”“怎么走”的困惑和摇摆，并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未雨绸缪，具备前瞻意识，以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教育引导。

最后，青年工作的主线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围绕中心明确了工作方向，服务大局点明了工作价值。伴随新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青年工作就必须把牢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条主线，继承共青团“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将个人美好的青春梦与伟大的中国梦相融合，调动广大青年建设国家的积极性。

（四）明确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青年一代健康成长指明了道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21]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22]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二是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23]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将他对青年成长成才的期望概括为六个要点，“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24]。概言之，要把广大青年培养锻造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思想

主要围绕砥砺小我、实现大我和超越自我三个维度展开。砥砺小我主要着眼于青年群体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对于自身全方位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道德品格，同时青年的身心健康是个人提升的基础性条件，而读书学习则是个人成长成才的直接动力；实现大我是在砥砺小我的前提下，将个人发展与更宏伟的目标相结合。新时代青年要确立正确的“实践观”和“奋斗观”，知行合一、艰苦奋斗，发挥青年一代创新创业的优势，让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快、更深、更广地融入时代发展，服务时代发展，推动时代发展；超越自我是砥砺小我和实现大我的最终归宿。超越自我需要青年一代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葆有中国情怀的同时，建立起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广国际视野，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投身经济全球化浪潮，承担起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的责任。

（五）明确青年工作的方法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共青团要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用新思想的真理魅力、实践魅力和人格魅力去教育、鼓舞和感染青年，引导广大青年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真学真信中坚定远大理想，在常学常新中增进知识储备，在学思践悟中敢于逐梦追梦，在细照笃行中增进修养修为，在知行合一中勇敢担当作为，从而把广大青年团结在新思想的伟大旗帜下。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更内化成为共产党人工作的基本方法。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自然要自觉学习和运用党的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共青团要跟上青年流动分化的步伐，扩大组织覆盖，扩大工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关键是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25]共青团应把最广大青年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聚青年之力、集青年之思、得青年之心，要常常思考如何能全面、深入、有效地联系青年、服务青年。

共青团要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始终与青年同呼吸、共命运,“团的干部必须心系广大青年,坚持以青年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努力增强党对青年的凝聚力和青年对党的向心力。”^[26]团组织要努力成为广大青年的贴心人和身边人,让青年能信赖、肯托付、愿依靠;真正深入青年,成为广大青年的“陪伴者”和“守护者”,将青年安危挂在心上、记在脑中、落在实处。

(六) 明确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的改革和发展寄予了厚望,鼓励共青团不断地自我革新。在性质上,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功能定位上,共青团一以贯之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历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共青团能够与时俱进,注重自身建设,不断地改革创新。当今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变迁,各种思潮观念相互交错,需求多样,技术的革新与迭代加速,这一系列现实变化对共青团保持和增强先进性提出了挑战。共青团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提高自我革新的能力,改善自我革新的方法,大力推进共青团改革再出发。

推动全面从严治团是共青团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推进全面从严治团,首先就是要在政治上加强团的建设。各级团组织都应在日常工作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和增强“三性”。从严治团要落地生根,就必须紧紧抓住“政治上要严”“团干部队伍建设要严”“团员管理要严”这三个基本要求。^[27]政治上要严,要从根本上落实从严治团的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和面貌。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要严,共青团干部对党的绝对忠诚是关键,各级共青团干部应当在政治和思想上守好底线,在能力和担当上突破标线,在作风和自律上把好防线。共青团员管理要严,要教育引导共青团员实干奋发、争先争优,自觉发挥在广大青年中的模范作用和凝聚作用,以个人的先进性带动整体的先进性。

共青团改革的实质,关键就是在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上下功夫,着力祛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把共青团建设得充满活力、坚强有力。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灵魂,离开了这一根本属性,共青团便迷失了前进与发展的方向。政治性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领导,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青团政治性的论述,为共青团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先进性是共青团的旗帜。为时刻确保先进性,共青团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带领广大共青团干部、广大共青团员、广大青年走在时代前列,紧跟党和国家发展步伐,配合党和国家工作部署,呼应党和国家号召指令。群众性是共青团的根基。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28]这一属性要求团组织切实发挥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加密切地联系好青年。

(七) 明确必须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这既是重大的政治准则,也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既是对全团的政治要求,更要成为全团的政治自觉。90余年来,共青团坚持为党培养青年政治骨干、输送新鲜血液,团结带领广大共青团员为实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而不懈奋斗。在新时代,共青团“要在广大青年中加强和改进理论武装工作,引导广大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从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生追求”^[29]。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0]开展青年工作也不例外,正是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领导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导制定了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党和国家青年工作的行动纲领,也是我国第一次对青年工作制度化的安排”^[31]。该规划明确提出了“党管青年原则”,使青年工作从此具有了根本领导原

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发扬党的青年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特点，对青年工作所作出的开创性推进，其意义十分深远。

党的领导是群团组织政治性的根本体现，必须在全团的工作和建设中毫不动摇、常抓不懈，让共青团始终成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忠诚后备军。同时，从政治性、战略性、规定性的高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也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青年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在思想上、行动中和一切工作的实际落实中，是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则，是共青团实现组织使命、体现社会价值的最重要保障。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作为共青团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工作具体落实到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作为特征突出的指导思想，深刻阐释和解决了青年工作所实际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难题，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与时俱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生力量以及指引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前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与时俱进

青年观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青年。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坚持全面、辩证和发展的观点视角，认识和看待青年在时代发展中的意义，强调青年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均有论述，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一贯高度重视青年与青年工作，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当下，对青年工作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作出深刻阐述，系统完备、科学合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工作思想的中国化。

（二）凝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春力量

“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

的。”^[32]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绝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逐步实现。新时代赋予当代青年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新时代背景，进一步肯定了青年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以及怎样培养青年的问题，强调用中国梦引领青年的成长成才，引领青年发展，希望“广大留学人员要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之上”^[33]。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必将培养出一大批新时代青年骨干和青年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迸发青春活力、贡献青春力量。

（三）指明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实充分说明，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3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压舱石和指南针。当前，共青团工作想要做好，就不能偏离根本任务，即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好、引领好、教育好青年，为党的执政筑牢基础；必须发挥“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多措并举，增强团组织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必须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广大青年对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必须不断推进共青团组织的全面改革，不断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成为始终过硬的先进青年组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完善、成熟，都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青年工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青年工作发展实际实现的。其中既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考量、对当代青年时代特点的准确把握、对党的青年工作的深邃思考，同时也结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年工作的亲身指导、具体实践以及青年时期的奋斗感悟和切身体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现实与未来以及全球

视野和中国情怀的高度统一。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进一步做细、做实、做好青年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6.
- [2] 贺军科.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N]. 中国青年报, 2018-07-04(1).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76.
- [4] 何建津. 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与超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哲学[J]. 兰州学刊, 2005(5): 55-57+185.
- [5] 孙全胜.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83-90.
- [6]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7.
- [7] 在新时代党的阳光照耀下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EB/OL]. (2018-06-26).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6/c_1123034444.htm.
- [8] 新闻办就《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举行发布会[EB/OL]. (2017-05-17).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7/content_5194648.htm#1.
- [9] 心系青年, 总书记为共青团工作指明方向[EB/OL]. (2018-07-03).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18-07/03/c_1123073011.htm.
- [10]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N]. 人民日报, 2015-10-27(1).
- [11] 新时代需要新青年, 新青年要有新使命[EB/OL]. (2017-11-24). http://www.qstheory.cn/2017-11/24/c_1122006087.htm.
- [12]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N]. 人民日报, 2018-07-03(1).
- [13] 习近平: 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EB/OL]. (2019-04-30). <http://m.people.cn/n4/2019/0430/c190-12650798.html>.
- [14] 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强调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N]. 人民日报, 2013-05-05(1).
- [1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1.
- [16]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0.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59-460.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7.
- [19]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EB/OL]. (2018-07-03).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4920817510694104&wfr=spider&for=pc>.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7.
- [21] 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强调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N]. 人民日报, 2013-05-05(1).
- [22]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4-05-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_3.htm.
- [23] 习近平说: 新时代的青年, 要爱国 励志 求真 力行[EB/OL]. (2018-05-03). https://www.sohu.com/a/230464695_500248.
- [24]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0-15.
- [25]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N]. 人民日报, 2018-07-03(1).
- [26]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光荣[N]. 人民日报, 2013-06-21(1).
- [27] 唐庆. 把从严治团要求落到实处[N]. 人民日报, 2018-08-08(7).
- [28] 习近平. 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先进性群众性开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EB/OL]. (2015-07-08). <http://news.cntv.cn/2015/07/08/ARTI1436306451708700.shtml>.

- [29]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N]. 人民日报, 2018-07-03(1).
- [3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6.
- [31] 张春枝. 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探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1): 12-16.
- [3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76.
- [33]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脚踏着祖国大地胸怀人民期盼 书写无愧于时代人民历史的绚丽篇章[N]. 人民日报, 2013-10-22(1).
- [34] 习近平. 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EB/OL]. (2015-07-07).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707/t20150707_519112884.shtml.

The Establishment,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Youth Policy

LIU Junyan YE Zipe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ecretary General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ese youth, and expounded extensively on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blem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provides major guidance for youth policy. The systematic elaboration is not only integrated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but also developed from Marxist view on youth and applied to China's reality. The thought is truthful and historic, which helps develop CPC's youth policy, and generate youth power in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Secretary General Xi Jinping; youth policy; Marxist view on youth; Seven Make-clear; historic meaning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的危机与生机

——以学校场域为视角

董云川 曾金燕

摘要: 哈尼族文化传统场域的衰落与学校场域对梯田文化传承的忽视,共同构成了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危机。祖祖辈辈延续至今的“梯田”仍然是生活于特定地域的哈尼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栖息地。学校是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延续的关键场域。教育要担当文化传承的责任,努力促进校内外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时刻为多元文化“化危为机”、步入现代赓续之路创造必要条件。

关键词: 梯田文化; 传承危机; 学校场域; 文化自知; 多元传承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25-08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是红河水系哀牢山地区哈尼族的主体文化,是哈尼族以梯田及梯田稻作方式为基础在历史中创造和积淀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包含“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梯田为核心的哈尼族传统文化以及其他自然文化景观等。^[1]20世纪末以来,哈尼梯田声名鹊起;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哈尼梯田文化成功申请多个国家级、世界级文化遗产头衔,其文化价值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认可。然而,随着多民族文化的发展日渐融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也像世界其他梯田文化集中区^①一样,面临着传承和延续的危机。学界从不同学科选取不同角度对传承的矛盾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然而,对于梯田文化现代传承的重要一环——学校教育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对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最为集中的元阳和红河两县基础教育系统的调查走访,汲取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仅从学校场域的视角对梯田文化传承危机进行深入的剖析,试图从教育责任的角度来探索其化危为机的现代传承之路。

一、传统场域的衰落与学校场域的凸显

文化传承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中进行。随着红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哈尼梯田文化的传统传承场域中主客体因素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场域呈现出逐步衰落的态势;与此相应,与现代文化共存的学校场域随着红河地区教育状况的不断改善而在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 传承场域: 文化传承赖以发生的社会空间

“场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2],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上空间环境与人的认知相融合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在场域中,主体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不同的场域遵循不同的规则和逻辑,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场域间又会发生交汇和渗透,从而形成某种矛盾张力。^[3]而胡塞尔认为,场域(也称“境域”)指主体及其意向兴趣与客体或对象之间的融合关系;根据主客体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教育学国际合作研究专项“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发展”(C176210224001)

作者简介: 董云川,男,云南云龙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及教育管理研究;曾金燕,女,广东信宜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大学德育研究。

不同程度的融合及其隐显层次，场域可以区分出特殊场域与普遍场域。^[4]在特殊场域中，主体的意向兴趣与客体因素密切互动，构成相辅相成的交汇状态，具有直接性与显在性；在普遍场域中，客体因素通常处于主体日常生活与直接需要之外并且常常为显意识所忽视从而是隐性的交汇状态，具有间接性与潜在性。归纳起来，“场域”概念至少包含三层社会关系的指涉：一是主客体间的融合关系；二是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三是场域间的张力关系。胡塞尔强调第一层，布迪厄强调第二层和第三层。

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历史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对于当代的少数民族成员来说，它是作为主体生活场域中的客体因素而存在。用胡塞尔的场域理论来说，所谓文化传承就是指，民族文化为当代的民族成员的意向兴趣所抓取和吸收，主客体形成互动共生的关系。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说，民族文化的传承还要考虑场域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和不同传承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所谓民族文化的传承场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场域中作为客体因素的民族文化稳定地存在，主体代际更迭有序、权力关系协调，而主客体因素形成较为活跃的互动关系。

（二）哈尼梯田文化传统传承场域的衰落

哈尼梯田文化的传承场域主要有三个：家庭场域、社会场域和学校场域。前两个属于传统场域，其传承方式主要是家庭性和社会性的“示范身教”和“口耳相传”^[5]。在传统场域中，其客体因素是指梯田及与此直接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以梯田稻作系统为核心的历史人文因素。而主体是哈尼族成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可分为传承人和传承对象，广义的传承人通常是中老年人，其中，摩匹（又译摩批、贝玛）文化阶层^②对于梯田文化的传承发挥主导性作用，而青少年则是相对而言的传承对象。受制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地域发展的不平衡，红河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学校教育始终是个薄弱环节。因此，梯田文化的传承一直以传统场域为主，家庭场域与社会场域互动密切，而学校场域发挥的作用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国家不断加大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旅游观光业得到较大

发展，红河地区的民族发展步伐日益融入到国家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这对于梯田文化的传统传承场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哈尼族大量向城镇乃至城市转移，从事梯田耕种的青壮年越来越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为村中主力。^[6]其次，由于现代文化的强势渗入，梯田文化不断遭到冲击和削弱，祭祀仪式、节庆活动等不断简化，民族歌舞、口头文学、手工艺术、建筑技术等日渐流失。再次，梯田文化的主要传承人即摩匹被边缘化和外在化，“逐渐失去了对本族文化的自觉性和热爱性，沦为了文化的边际人”^[7]。如此一来，梯田文化传统传承场域中的主客体因素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场域越来越难以稳定地构建起来，梯田文化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

（三）学校应然成为梯田文化现代传承的重要场域

梯田文化传统传承场域的衰落昭示着寻找梯田文化现代传承道路的必然性与紧迫性，而学校场域正是梯田文化从传统传承向现代传承过渡的关键环节。

首先，国家教育制度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现代教育的系统化建设，使得红河地区哈尼族学生入学率与升学率大大提高，学前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作为梯田文化的后继者——青少年，他们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学校中度过。如果梯田文化要传承下去并且对哈尼族的后辈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学校传承就不可或缺。其次，现代教育所特有的概念化、逻辑化的认知方式有助于学生辩证、理性地认识和评价梯田文化，同时有效地过滤、转换或控制当中不合时宜的神秘、迷信的落后成分。再次，学校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教学模式能够保障学生学习梯田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最后，随着对梯田文化挖掘、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梯田文化诸组成部分能以更合适的方式被吸收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与教学中来，为梯田文化的深入传播创造条件。

事实上，早在2005年国家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中就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

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8]因此，学校在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中不仅至关重要，而且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哈尼梯田文化在学校传承场域中的现实困境

虽然学校在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中至关重要，然而并不会自动地转换成梯田文化的有效传承场域。现代文化与梯田文化属于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形态，具有相互排斥的内在倾向；这种排斥倾向与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共同导致了学校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管理者及教育者的多重认知困惑，强势的现代文化自然而然地挤兑弱势的梯田文化在学校场域中的存在空间，并使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学生群体对于梯田文化表现出日渐淡漠的态度。

（一）异质文化的相斥性导致认知困惑

在比较现代文化与梯田文化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两种文化是异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9]这里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作对比，但更深层来说，是以商品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生产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生产进行比较。现代文化和梯田文化分别构筑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之上。在商品经济以及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扩大再生产是其本质属性。商品经济固然有其盲目性和残酷性，但是它为现代文明注入独立、平等、民主、竞争、开放、创新、效率等核心理念。而梯田稻作系统是传统农耕文明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特殊形态，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均较为低下^③，简单再生产是其本质属性。梯田文化固然也表现出天人之际与人伦之间的和谐观念，但是，更表现出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和对族群的过度依赖，并衍生出愚昧、神秘、迷信、狭隘、守旧、排外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文化缺陷。文化的异质性必然引发场域内不同文化

间的相互排斥与斗争。

虽然现代文化与梯田文化并不必然是水火不容的，梯田文化也存在非常多珍贵的因素和内涵，这些因素可以成为现代文化的必要补充乃至新的生长点。但是，从总体而言，站在现代文化的价值立场批判继承梯田文化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而长期困扰红河地区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及广大教育者的恰恰又是梯田文化能不能融入和如何融入现代文化，以及在学校场域中梯田文化“要不要传”“传什么”和“怎么传”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加之，脱贫致富的刚性要求，升学率与就业率的现实压力，都让他们难以充分考虑梯田文化的学校传承问题。一部分人干脆认为，梯田文化的核心是梯田，大多数学生都已经脱离梯田耕作方式，而梯田又不可能搬进课堂，所以，学校传承梯田文化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可见，文化级差所形成的势能无时不影响着已经无法逃离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中的“在场者”，认知的困惑与混乱也妨碍了他们对于梯田文化传承与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并进一步阻碍梯田文化传承学校场域中主客体因素的就位与融合。

（二）学校场域中梯田文化因素加速退场

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化是相伴而生的。学校是传播现代文化的主要场域。虽然红河地区的学校教育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但是，其现代性质却是毋庸置疑的。现代文化对梯田文化的自然排斥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模糊认知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进一步具体化为学校场域中梯田文化的加速退场。

首先，在学前教育阶段，梯田文化因素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幼儿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初始阶段，对于学生的文化传承态度的养成非常重要。红河地区的幼儿教育普及率还比较低。虽然，大多数幼儿园都会有意识地传承梯田文化，比如，在班级环境的创设与装饰上利用民族元素，在游戏活动中也融入民族歌舞和游戏等，但是，因为缺乏总体安排、制度保障和较好的文化教材，教师对于梯田文化资源的选择和运用具有较大的随机性，融入教学活动的深度也有限，教学效果难以保障。^[10]其次，到了中小学阶段，梯田文化因素日渐稀薄。由于梯田文化跟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没有联系，也不需要考核，

所以，不为师生所重视。校园环境中梯田文化因素缺乏充分的展示，而有限的展示往往一成不变，跟学生的现实兴趣渐行渐远；曾经以课间操形式实施的“乐作舞”因达不到锻炼的效果而基本被取消。梯田文化慢慢成为中小学场域中可有可无的存在。红河县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地政府借助国家大力保护文化遗产的有利形势建立了一所专门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据说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传承民族文化为主旨的中专学校，主要教授民族歌舞、民族工艺品制作以及旅游服务等。不过，学生绝大多数是中考落榜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对梯田文化的理解深度有限，他们对于生计或升学的要求远高于对梯田文化的传承愿望。即便如此，该校的招生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三，哈尼语在教学中快速流失。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介，人类文化的一切形态几乎都要经过语言的标记、过滤并留下印记，成为观照人类文明的独特之镜，成为“存在之家”^[11]。流失本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感知本民族文化最亲切最朴实的途径。

由于外地教师的比例越来越高，而外地教师几乎都不懂哈尼语，所以，双语（汉语与哈尼语）教学在幼儿教育和小学低段教育已经变得困难，小学高年级起已经全部使用普通话教学。此外，学校场域与校外场域基本脱节。偶尔为之的“梯田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形成长效机制，对学校场域及学生的影响有限。

（三）学生对梯田文化的态度日渐淡漠

哈尼族学生既是哈尼族的后继者和梯田文化的传承对象，更是跨越家庭、社会、学校诸场域的重要主体，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然而，作为受教育的对象，他们的受动性也是明显的，而且越是低龄的越是如此。学生对于梯田文化积极的意向兴趣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良好的家庭与社会传承氛围，更需要学校场域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充当桥梁和导引，并且从校园环境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而这些条件恰恰都不具备。相反，解构学生对梯田文化传承意愿的因素却随处可见。

首先，劳作艰辛却收入微薄的梯田耕作方式在哈尼族年轻一代眼中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谋生

手段的多元化，梯田耕作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哈尼族年轻一代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其次，哈尼族学生升学的现实需要与激烈竞争也淡化了他们对梯田文化的热情。虽然国家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但是，少数民族学生升学及继续深造的机会是通过国家或地区的统一考试制度来实现。哈尼族学生出于应试需要，有理由集中时间、精力向应试目标转移，使得跟这一主导目标似乎补益不多的梯田文化受到冷待。再次，在信息化的背景下，智能手机、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化，哈尼族青少年尤其是那些缺少父母心灵陪伴和生活引导的留守儿童，他们的课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地被现代文化填充，梯田文化的存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最后，父辈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生活体验对学生认知梯田文化也产生了消极的导向。作为比较古朴的传统文化形态，梯田文化的确没有为哈尼族融入现代社会提供足够的文化指引。颇有意味的例子是，现代交际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谢谢”一词在哈尼语中居然找不到对应词。当文化程度有限的哈尼族入城务工时，常常感到弱势和孤立，他们很容易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的文化。^[12]父辈的社会经历与切身体验回传给在校的儿女乃至弥散在整个哈尼族的气氛中，加深了学生对梯田文化的厌弃。

总之，管理者、教育者的认知困惑与政策缺失，梯田文化因素在学校场域的不断退场，以及学生对梯田文化日渐固化的淡漠态度等，它们共同作用，使得学校场域至今未能成为梯田文化传承的积极场域。

三、化危为机的现代教育传承道路探索

梯田文化已经无法逃避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和碰撞，它要在现代语境中传承下去，就必须寻求现代的传承方式，任其自然只会陷入更深的危机。红河地区的相关部门及教育者应深刻认识到梯田文化的传承不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收益和概念性的世界影响，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哈尼族而言，更是根深蒂固的精神栖息地。而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必定是多场域互动的传承，其中，学校场域的建构迫在眉睫。

（一）增强文化自知：梯田文化是哈尼族的精神归属

梯田文化的研究者通常站在现代文明的山顶俯

视山下的梯田文化，挖掘和阐释梯田文化对于国家乃至世界的意义，而管理者往往强调梯田文化的经济价值和旅游效益，这些当然都无可厚非，但是，很少有人从哈尼族深层的精神需要来考虑梯田文化的传承意义。

一个民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联系中。梯田文化浓缩了哈尼族漫长、坎坷的非凡历史，凝聚了这个民族在历史中积累的全部智慧。虽然，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和谋生方式的转变，很多哈尼族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逐渐脱离了梯田耕作方式，但是，他们出生、成长在哈尼族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中，一开始就打上了哈尼族的标记，无从选择；而且，从出生到入学这个阶段，通过不断内化祖辈和父辈的教导、濡染生活中梯田文化的点点滴滴，形成了最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乃至集体无意识中某些“原型”^[13]。这些心理或人格结构与梯田文化的文化结构具有原始的同构与对应关系。梯田文化让浸染其中的哈尼族体验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漂泊的有限个体，而是超越有限时空的恒久主体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14]，这种皈依感或归属感是人性精神体验中最富灵性和最为崇高的维度。从这个意义来说，梯田文化是哈尼族的精神归属。

现代化浪潮打破了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瓦解着梯田文化传承的传统场域，促使哈尼族开启现代化进程。长期为贫瘠落后所困的哈尼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出改变生存状况的强烈愿望，这种对于生存与安全的急迫需要将深层的精神归属需求暂时掩盖起来，并深藏到无意识中。但是，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可以预见，如果哈尼族以牺牲和放弃自己的文化作为代价来获取物质生活的满足，那么等到物质上逐渐得到保障，精神需要慢慢成为他们突出的需求时，压抑和消沉在无意识的黑暗地带的归属需求就会重新浮出水面。^[15]现代交际与现代文化固然能够部分满足他们某些精神需要，但是，跟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构的根深蒂固的归属需求却因为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缺失或系统性断裂而形成的精神裂痕将难以弥合，进而成为他们身份焦虑的根源，阻碍其人格现代化的最终完成，甚至构成不安的源头。现代

人之所以常常泛起回到过去寻找乡愁的渴求，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仓促地追赶中有意无意地舍弃了民族或族群作为整体意义的文化形态，失去了民族或者族群的“共同过去”，深层的精神归属需求无法获得满足，不得不沦为现代社会中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寻找灵魂的现代人”。^[16]如果哈尼族撒手于本身的民族文化，未能将这种相对而言的发展阶段上的文化弱势转变成后发优势，在经济追求与文化遗产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今天现代人的乡愁就是明天哈尼族的乡愁。

因此，哈尼梯田文化的传承越来越不单纯是生产功能的延续，也不仅仅是为现代人挽留乡愁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哈尼族留住可以皈依的栖息地。这一点，必须成为哈尼族、当地领导和教育者的普遍认知，并透过他们传递给哈尼族的后辈，继而才能将这种远见和这份责任融汇于哈尼梯田文化现代传承的现实探索之路。

（二）明确角色：多场域互动条件下的学校传承

要探求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道路，就要首先明确梯田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梯田文化，其特殊性在于“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特点，即具有‘复合性’特点”^[17]。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分工与合作，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也必然体现出这种特点。学校只是整个红河地区传承场域的组成部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和社会，各个场域“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8]，因此，都应该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承担起所能够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固然应该由学校担当起日渐重要的作用，但也仅只是在多元传承的条件下扮演的角色之一。再者，梯田文化本质来说属于前现代的文化形态，它不可能整体地、原生态地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下去，而且，它自身也并非静止不变，也因循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自我调整并更新着内涵。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循环，而是发展、更新。因此，学校不仅只是直接担负着所能够承受的任务，并且要有所选择与侧重、有所转换与创新。

从文化组成来说，梯田文化中跟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部分，如农耕技能、建筑技术、祭祀礼仪、民族风俗、饮食文化等，主要还是以社会传承和家庭传承为主，这也是身处在这场域中的哈尼族的生活方式和直接的精神需要。而对于梯田文化中审美性、娱乐性以及时空条件要求不高的部分，如口头文学、民族歌舞、手工制作、游戏活动等，则应该经过教育者的筛选或转换，主动纳入课堂的教学或文化教材当中。从文化层次来说，受传统统觉思维的影响，传统传承方式带有某种神秘性和模糊性，所以，在梯田文化这种形神兼备的综合体中，社会场域与家庭场域所传承的内容往往层次不明、形神混一；而从现代理性角度看，学校场域固然也要求形神兼顾，但更应注重挖掘和阐释这些文化之“形”背后的“神”，即认知部分或核心内涵，比如，顺应自然又利用自然的朴素生态观念，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和睦共存的相处之道，循环、节约的环保意识，团结、坚韧和乐观的民族性格，等等。

梯田文化的现代传承既是多元的传承，也是互动的传承。不同传承场域的自主化或者独立性是相对的，没有彻底的自主场域。^[19]任何一个场域都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各自的传承责任，只能是各擅胜场，相互配合。一方面，学生在社会实践和家庭生活中所积累的对于梯田文化的朴素情感和多方面的感性经验为其在学校中更深入、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梯田文化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对梯田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客观评价，又会扩散到社会场域和家庭场域中，这不仅有助于纠正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哈尼族对梯田文化的鄙薄态度和冲破大多数一直从事梯田耕作的哈尼族的狭隘心理，而且，学校作为现代文化的场域，通过学生群体向传统场域及其传承主体传达出的文化尊重和情感支持，能够明显地增强摩匹的价值感和存在感，提升他们的传承意愿，为学校场域与传统场域的和谐共存、相辅相成提供重要支撑。

（三）构建学校场域：客体吸引与主体趋近的方法探索

实际上，学校场域对于梯田文化现代传承的重要意义在当地的文化部门与教育管理者中仍未取得广泛共识，更别说整体地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然而就长远看，学校传承必定成为梯田文化现代传承

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因此，根据胡塞尔关于特殊场域中客体吸引和主体趋近原则所衍生出的基本方法，可以为学校场域构建提供借鉴。

第一，环境设置与制度安排。首先，校园环境的梯田文化展示，不仅应多维度、系统性，还应取学生的视角，即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而且，内容选择要与时俱进，以体现时代精神与文化选择的动态平衡。切忌一成不变，让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其次，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梯田文化选修课程，将零散的、游离的梯田文化资源整合到课程中来，探索以普通话为主、哈尼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方式，形成一定的考核或考试制度。再次，梯田文化课堂可以适当地转移到梯田耕作现场，让学生对梯田耕作有感性体验，积累必要的直接经验；或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参观各类梯田文化遗址或遗存，增强学生的历史感与责任感。此外，在高中乃至大学阶段，还可以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工作岗位等激励措施，以激发他们对保护梯田以及成为传承梯田文化专门人才的兴趣。

第二，差别对待与循序渐进。红河梯田文化并不是红河地区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不同学校应当根据学校以及班级的生源情况来考虑校园文化建设、文化课设置、班级组建方式、教学方式以及考核与评价制度。比如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既要考虑梯田文化的个性，即民族特色，又要显示梯田文化与现代文化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即殊途同归；教学方式上，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注重培养兴趣，引发他们的思考，而非灌输一些空泛的梯田文化知识；考核形式上，建议多采用才艺表演，如民族歌舞、诗歌朗诵、手工制作、话剧、小品等；评价上，应综合平时课堂的参与度和期末成果质量评定等级。总之，要差别对待而非统一要求，要灵活生动而非照本宣科，要讲求实效、陶冶感情而非死记硬背。再者，教学要循序渐进。大体而言，幼儿阶段应注重对梯田文化积极的情感濡染，小学阶段注重感性经验的积累，中学阶段注重理性的把握，更高级的阶段可以作专门化的训练发展。幼儿阶段的学生感知能力和活动空间有限，尚处于动作思维为主、形象思维为辅、理性思维萌芽的状况，因此，要在活动中进行教学，注重课堂的

参与性、内容的形象性和讲解的趣味性。小学阶段的学生进入到形象思维为主的阶段,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对于梯田文化的感性经验日渐丰富多样。这时,仍应强调课堂的活动性和参与性、教学手段的形象化和多元化,但也要引导学生对于梯田文化的深层内涵、历史成因与现代价值有所思考。中学阶段的学生开始进入理性思维快速发展和日渐成熟的阶段,不仅应透过梯田文化的感性表象去理解梯田文化的深层内涵,而且要有一定的追问、探索的动机。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则可以专门化发展,乃至逐步成为梯田文化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即便一些学生日后回归梯田稻作方式,那也是以掌握了现代技术的现代哈尼族的身份回归,而且很可能为传统梯田生产注入新的动力,这样则有利于梯田人文生态的良性循环。

第三,精选内容与现代阐释。学生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学校对于梯田文化教学内容必须精挑细选。首先,要体现时代性。富有时代精神的梯田文化内容既能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现代文化,产生正向迁移效果,又能让他们感受到古老文化在现代土壤上的生机与活力,增强他们对于梯田文化的认同感。其次,要有民族特色。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成分往往具有典型的文化意义,蕴含着梯田文化的整体信息和文化精髓,将它们运用到在教学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者,要有历史感。费孝通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20]据《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普亚佐亚德亚》等哈尼族迁徙史诗记载,哈尼族经历了千余年的迁徙,避居环境恶劣的哀牢山区,创造出如此绚烂瑰丽的高山杰作。这种非凡的历史和创举无不让人为之赞叹,而本民族的学生焉能不为之自豪!此外,还要对梯田文化具体内容进行现代阐释,做到隐性价值的显性化、相对价值的独特化、功利价值的现实化。^[21]仅以“隐性价值的显性化”为例。比如梯田文化中的森林崇拜,它固然有神秘和迷信的一面,可是,森林崇拜中蕴含着的对于自然、森林的珍视却是很值得称道的;而宗教祭祀活动固然有其神秘和虚妄的色彩,但是文化传承人那种忘我的融入与迷醉,表现出人

与天、地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民族个体皈依民族整体乃至人类总体的精神体验。

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让每一个哈尼族都成为梯田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实际上,学校教育如果能够使一些不同层次、不同禀赋、不同爱好的哈尼族学生及其他民族学生对于梯田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积极态度、参与意愿和传承志向,也就弥足珍贵了,学校场域也因此而功德圆满,实实在在地担负起教育对于传统的传承责任。

总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总是在特定的场域中进行,梯田文化也必然离不开多场域互动的现代传承。在教育传承与现代赓续之路上,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文化自知,构建学校传承场域,推动学校场域与传统场域的积极互动,仍是现在和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命题。

注释

- ① 菲律宾伊富高梯田比红河哈尼梯田更早成功申请“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来一度濒危,险被“摘帽”,经过多方抢救得以基本修复,但一直面临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参见:Dizon JT,Calderon MM,Sajise AJU,Andrada RT,Salvador MG.(2012). Youths' percept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15(1),52-58.
- ② “在长期的‘示范身教’和‘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哈尼族社会形成了一个摩匹文化阶层。这一阶层的主要社会职能,就是专门进行文化的传承。他们是哈尼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哈尼族文化的专门性传承人。在哈尼族社会中,摩匹既是梯田农业的生产劳动者,又是梯田农业生产的指导者。他们掌握民族文化、传授民族历史、农耕节祭知识,熟知哈尼族的一切礼仪,懂得医术等等。”参见: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305页。
- ③ “据一般的估计,梯田所得扣除农药化肥等费用,收入已近微薄,梯田经济大多只能刚好维持家庭粮食需要,少有结余。当然这与哈尼梯田耕作方式有一部分关系,梯田的独特地形决定了无法施展大型机械化,也无法产业化经

营,而只允许传统精耕细作,也即简单的人力付出。并且有的梯田离家较远,步行须在一个钟头左右,来回就要两个多小时,更遑论背着梯田中产出的粮食运回家中了。”

参见:徐义强、李凯冬:《农业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保护与开发刍议》,《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史军超.文明的圣树:哈尼梯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14.
- [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
- [3]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46-150.
- [4]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56-559.
- [5]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97-304.
- [6] 史军超.红河哈尼梯田:申遗中保护与发展的困惑[J].学术探索,2009(3):19-23.
- [7] 太星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境调查——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J].红河学院学报,2018(2):41-46.
- [8]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资料汇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23.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 [10] 赵敏.幼儿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现状的调查分析——以红河哈尼族文化传承为例[J].文教资料,2018(6):84-86.
- [11] 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66.
- [12] 陆祥宇.稻作传统与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保护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1:96.
- [13]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12.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 [15]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28.
- [16]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M].冯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21.
- [17] 闵庆文.哈尼梯田的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及其保护[J].学术探索,2009(3):12-14.
- [18]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4.
- [19]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46-150.
- [20]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88.
- [21] 卢德生.从普遍境域到特殊境域:学校民族文化遗产的路径探析——基于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视角[J].民族教育研究,2016(6):123-128.

The Crisis and Vitality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ol Field

DONG Yunchuan ZENG Jinyan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field of the Hani culture and the neglige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erraced-field culture in the school field constitute the inheritance crisis of the world-cla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erraced-fields that have been inherited for generations are still the spiritual habitat of the Hani nationality living in specific region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local schools are the key field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to realize modern continuity. Education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strive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field and off-campus field, and constantly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diversified cultures to “transform danger into opportunity” and embark on the road of modern continuation.

Key words: terraced-field culture; inheritance crisis; school field; cultural self-knowledge; diversified inheritance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主题、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袁利平 师嘉欣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是美国当局根据高等教育和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而做出的以文本为表现形式的教育规划。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通过出台相关战略性规划推动其高等教育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其战略主题主要集中在质量保障、市场一体化、教育公平、教育国际化和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并彰显出以学生学业成就与发展为关注重点，注重教育质量与公平、教育经费使用效率，提供多元的高等教育机会、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人才等特征。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发展趋势上主要聚焦在主体参与、层级目标、保障机制和重点领域等层面；未来美国将会进一步拓宽市场和州政府参与空间、提升学生能力和美国竞争力、加强问责与数字技术使用以及通过STEM教育和国际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宏观整体理解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主题与发展趋势，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主题；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4-0033-09

一、引言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其现代性(modernity)不断增长、逐渐摆脱传统旧有事物束缚的过程，也是高等教育某阶段发展的最高水平和最强实力的体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的行动方案和配套举措，更是该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理念与行动依据。自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声中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通过各种途径出台了《重塑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A Supplement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2017)、

《反思高等教育认证改革》(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Reform, 2018)、《重新思考高等教育》(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2018)、《通过国际教育和参与取得全球成功》(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2018)、《关于传统黑人大学和学院的白宫倡议——美国联邦机构优先事项摘要》(White House Initiative on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ederal Agency Priorities Brief, 2019)、《改革高等教育法的提议》(Proposals to Re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2019)、《制定成功路线：美国的STEM教育战略(2019—2023)》(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 2019—2023)等系列战略文本，旨在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美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西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办学水平研究”(18JZD053)

作者简介：袁利平，男，甘肃庆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等；师嘉欣，女，河北保定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

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美国当局面向高等教育和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而做出的以文本为表现形式的教育规划, 具有长久性、全局性和层级性等特征, 旨在推动本国社会发展, 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我国正处于实现2035年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阶段, 深入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主题、分析其基本特征、把握其发展趋势, 对我国制定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全面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二、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主题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主题是美国联邦政府针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所提出的改革方略,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 并为其开展具体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战略蓝图。从具体内容来看,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质量保障战略

一是精简认证程序, 关注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精简的、关注学生成绩的认证过程可以降低成本, 并确保对机构质量反馈的有效性。二是消除有地理范围的债权人 and 有任务范围的债权人之间的成见。学术机构的定义是使命, 而不是地理范围。同样, 认证机构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运作, 应应由其所认证机构的学术使命来定义。^[1]三是加强高等教育机构问责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为学生和纳税人带来巨大价值, 学生和纳税人为此买单, 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未能提供足以让学生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优质教育服务。为此, 应建立更完善的体系, 使那些享有纳税人资金的高等教育机构分摊学生贷款的财务。

(二) 市场一体化战略

一是革新高等教育市场。联邦政府应建立试点项目以增加市场驱动的劳动力。超过一半的学生被归类为“非传统”, 然而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充分满足他们独特的需求, 这类学生往往有一定的职业追求, 因此要创新高等教育机构, 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选择更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二是帮助大学生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联邦计划用以鼓励而不

是限制高等教育提供者和雇主之间的合作关系; 通过学徒、基于工作的学习和职业途径是学习技能的关键场所。联邦政府应该扩大佩尔助学金(Federal Pell Grant)的资助范围, 将高质量的短期项目包括在内, 这些短期项目能为学生提供高需求领域的证书、认证或执照。扩大佩尔助学金的适用范围将有助于更多的美国人参加为其提供所需技能的项目, 以更快地在高需求领域找到高薪工作。三是联邦政府应该改革联邦工作研究项目, 为低收入本科生提供劳动力和就业机会。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提高了学生发展所需的重要工作技能和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帮助低收入学生获得工作经验。

(三) 效率提升战略

一是减少学生债务。联邦政府应要求院校制定有关接受先前学习的评估(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s)计划, 并提供援助以支付军人费用的政策, 将以上政策作为财政援助奖励的重要内容。二是鼓励学生负责任地借贷、提高还款能力。研究表明, 联邦学生资助的可获得性与学费上涨之间存在相关性。^[2]当前的借贷体系使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缺乏控制成本的动力, 忽视了借款人可能的偿还能力。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债务问题, 政府建议对联邦学生贷款建立常识性的限制, 并改进对学生履行还款义务能力的指导。联邦政府应该规定家长和毕业生的贷款限额; 向财政援助项目的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和权限, 以帮助学生限制和管理他们的学生贷款; 应该要求各机构提供更定期、更有效的财务援助咨询, 提升学生的还贷能力。三是简化学生资助程序, 缓解学生债务负担。联邦政府应将先前五种由收入驱动的还款方式合并成一个简单的计划, 将月供额度限制在借款人可支配收入的12.5%以内; 将贷款减免扩展到所有本科生, 支持所有美国学生追求任何职业, 并消除对借贷还贷行为的偏见, 简化公共服务贷款减免(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计划的行政复杂性; 在借款人同意的前提下, 允许财政部自动为教育部提供所得税数据使用的应用程序, 更新和管理联邦援助项目和还款计划, 以及针对还款计划进行相关分析和估计成本预估。^[3]

(四) 教育公平战略

一是拓宽美国传统黑人大学的伙伴关系。由美国白宫牵头, 美国联邦机构(包括美国教育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司法部、劳动部等多部门)将优先处理与传统黑人大学相关的重点事务。这些优先事项并不限制传统黑人大学和联邦机构的合作机会, 而是代表了美国联邦机构和传统黑人大学合作的最低标准。与此同时, 联邦机构将致力于促进传统黑人大学和私营部门的互动, 巩固传统黑人大学在当地的竞争优势, 建立起更多有价值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依托公开声明为其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牵头, 给予传统黑人大学行政和立法的优先性考虑。鼓励传统黑人大学同联邦政府部门建立私人伙伴关系, 加强两者合作; 通过发布公开声明, 引导各部门支持传统黑人大学的发展。三是依托计划平台开展合作。各州和地区在联邦政府要求下召开集会、听证会和技术协助, 为本地传统黑人大学提供地方合作计划平台, 丰富传统黑人大学的发展机会, 加强传统黑人大学和当地州政府的联系和合作。四是依托项目平台增强竞争力。通过举办全国传统黑人大学的周会议、联邦跨部门工作小组和传统黑人大学竞争力学者识别项目提升传统黑人大学的教育和社会影响力。

(五) 教育国际化战略

一是充分发展大学生全球文化胜任力。全球文化胜任力(global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是个人在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取得成功及充分参与并采取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4]充分培养这种能力需要养成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社会情感与语言技能; 需要养成理解和欣赏多元国家与世界地区的文化、宗教与观念; 需要精通至少两种语言, 帮助大学生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创新教学。美国在定期参与国际教育评估与调查的基础上, 对照其他国家形成自身教育基准测试, 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为参与成人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了解包括大学生在内的16至65岁成年人的识字、计算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美

国就“学习创新”这一议题同多边组织、国家与地区形成伙伴关系, 通过派遣联邦教育部高级官员进行战略性海外出访, 同其他国家的学校、师生甚至教育政策制定者与专家会面, 以广泛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三是通过积极的教育外交手段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先地位。美国首先在双边国家、多边国际组织、多边国际论坛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同探讨教育问题, 积极参与由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等举办的有关教育和技能的议题会议。其次, 继续参与欧洲信息中心网络(European Network of Information Centers)的相关活动, 促进各国之间对高等教育学位资格的认可, 为本国大学生出国工作或留学提供信息指导, 也为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学习与工作提供充分信息。最后, 通过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领导计划(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建立美国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的持久联系, 了解各自国家教育体系与政治情况等相关信息。^[5]

(六) 教育信息化战略

一是为学生提供数字平台, 开展优质学习体验。首先, 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可在不同高等教育机构间进出, 为其城市流动或者职业发展提供便利。其次, 除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外, 各种类型的成人学习中心、劳动力发展与职业培训机构、图书馆、社区组织以及在线学习机构等均可开展合作, 满足大学生在求学和未来职业道路上更广范围的需求。最后,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终身性的, 贯穿于学生的人生各个阶段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在这种全时性学习经历中, 学生将凭借学分授予和证书获取来证明自己所学的新知识。二是充分使用以高等教育为中心的技术方案。信息技术的使用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目标、需求和兴趣。高等教育需要更加灵活、集成、高效, 且费用能够被学生承担, 技术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现代化结构和实践, 促进高等教育以上特性的形成, 最终实现学生学业与技能水平的提升, 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三、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主题具有整体指导性和行动一致性, 以学生学业成就与发展为关注重点, 注重教育质量与公平、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提升多元高等教育机会、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人才。

(一) 以学生为中心, 关注学生发展和学业成就

一是注重教育机会的扩大和改善。美国政府的投入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经费中仅占10%, 其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6]大学经费的获得依靠学费、捐赠或其他有偿服务, 市场竞争成为大学稳定运行的必然手段。除此, 美国高等教育非常依赖公立高等教育, 吸纳了约75%的美国学生。^[7]高昂的运行成本和巨大的教育需求间存在矛盾, 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阻碍了美国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基于信息技术使用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战略在改善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教育评价等方面具有优越性, 技术的升级和广泛使用将进一步改善高等教育相关行为主体的活动体验, 突破时空限制, 随时随地因需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基于技术的远程在线高等教育和其他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两年制学院成为美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补充渠道。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和改善在于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让其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获得社会所需工作的相关知识技能, 提升社会竞争力。

二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开展高等教育认证。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框架下, 各项教育活动将围绕学生发展和学业成就展开, 表现在高等教育认证方面, 即以学业成就为中心开展高等教育认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进行高等教育问责和质量改进是未来发展常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注重测量工具的开发, 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就和学习能力等内容。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机制建立在自愿、同行评估和自我管理的原则基础上, 是一种民间的行业内部质量认证。^[8]联邦政府不直接参与认证, 而是对认证协会进行“认可”, 使得高等教育认证协会具有教育监督评价和执行的公共权力, 实现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认证协会的“元认证”^[9]。

(二) 以质量为保障, 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

一是联邦政府加强对远程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将以学生能力和学业成就作为认证标准, 而非学时学分。现代技术的改善和学生需求的不断拓展使得传统高等教育以外的远程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丰富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同美国传统高等教育一样, 美国远程高等教育认证近年来得到加强; 美国颁布了包括联邦政府、州、大学联合体或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以及大学四个层级的远程教育法规和政策。高等教育机构依据认定结果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 以此吸引目标学生。包括军事机构、企业、大学、中等后教育机构和与中等后教育学习相关的远程学习机构都进行并且应该进行认证。

二是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问责。高等教育问责的本质在于, 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作为消费产品的高质量追求。^[10]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问责是提升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美国历来有以州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问责传统, 而联邦政府则通过立法和财政手段对高等教育进行引导。除联邦和州政府为代表的政府部门, 由学生、家长和劳动力市场构成的教育消费群体、由高等院校组成的专业协会以及由新闻媒体、其他民间组织和智库组成的社会力量, 也将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美国高等教育问责。

(三) 以公平为理念, 改善学生生存状况

一是承认群体差异, 否认种族差异。特朗普认为联邦政府应基于阶层而非种族差异扶持学生, 即承认阶层差别, 否认种族差异; 同时也认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不利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公正理念, 应予以废除。在群体间实施权利差异化对待, 是对全体受教育者有益的方式, 差异化原则“补正”倾斜配置原则, 能够避免反向歧视。^[11]自实行肯定性行动以来, 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案件逐渐暴露出肯定性行动的局限性^[12], 这为少数族裔高等教育入学提供了更多机会, 也造成了对其他群体的反向歧视, 有损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朗普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派政府和社会对少数族裔高等教育机会的看法, 力求营造多元化教育环境, 以调和变化中的民众意志和社会情

感^[13],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转向。

二是营造多元教育环境。多元的教育环境是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前的环境模拟,能帮助受教育者认识和理解多元性,为其参与甚至形塑社会环境做准备。历史上美国高等教育为少数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或其他教育利益,以弥补其种族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但这种利益的倾斜为少数族裔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利益,弥补其自身不足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该群体的反向歧视。因为,并非所有的少数族裔都是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非少数族裔群体中也存在个体素质不足难以进入其目标院校的现象。在多个群体间实施差异化对待,是对各受教育群体有益的办法,这能在理论上补足倾斜化对待,避免反向歧视。而构建多元的教育环境,可以推动个体之间的交流,淡化群体间的互动边界,增进对彼此的认同。当少数族裔不再被作为一个和主体社会存在隔阂的特殊社会群体的时候,实质平等才能得以实现。

(四)以技术为工具,提供多元化入学机会

一是以多种途径满足不同群体高等教育需求。美国十分重视非传统大学生,鼓励高校多样化发展以适应不同群体大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多元化的高校类型和高校间的联系为满足学生需求、提升其教育程度搭建了平台,学院和大学间的学生交换使得学生有机会进入高水平大学学习。非传统型学生可以根据教育需求、时间和资金情况来选择接受何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充分的选择机会和选择范围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

二是以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通过信息技术的高等教育在线学习网络同样利于深化高等教育普及化。依靠信息技术的高等教育拓宽高等教育时空范围,刺激高等教育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突破了学校固有场所的限制,接受相关教育课程。最终,借助于信息技术,深化普及高等教育意味着一个全面学习社会的建立。^[14]

(五)以成功为目标,开展全球胜任力教育

一是网罗全球范围内优秀人才。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连续颁发多个移民政策文本,以改变移民者结构。这具体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减少移民数量;鼓励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优质移民,取消

链式移民;采用积分法取得移民资格等内容。在教育方面,特朗普政府限制了来美留学生的名额,也提出优先考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学生的留美申请,网罗优秀人才。^[15]

二是以全球胜任力培养为核心。由美国教育部颁发的战略文本中,全球胜任力被认为是加强美国国际教育,提升美国国际优越性的核心能力。大学生需要掌握高级的社会情感和领导技巧(能够同跨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协作和沟通),至少高度精通一门外语用于工作或学习,能从不同视角分析和反思问题高度发展的能力,有能力在广泛的公民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参与,能在全球背景下在个人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等品质。^[16]全球胜任力的养成以专业知识和理解能力为前提。培养全体公民全球胜任力是美国全球胜任力国际战略,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密切相关。^[17]

四、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系列战略文本,针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更新、认证和问责、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联邦政府财政重点等事务做出战略部署,这些战略文本的宗旨都在于提升高等教育机会和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增强学生胜任力,最终形成全球竞争力。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主体参与、层级目标、保障机制和重点领域等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征着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主体参与:拓宽市场和州政府参与空间

特朗普上任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高等教育主体参与方面,主张市场和州政府享有更多的参与空间。一是提升高等教育市场化。2020年2月10日,特朗普指出,应以学生为优先级进行变革性的经济预算,将权力重新授予各州,限制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18]美国高等教育在内外环境影响下,必然以多种方式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市场参与是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式,市场亦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

展战略的重要参与主体。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特朗普就联邦政府2020年高等教育支出预算指出,“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让他们的孩子实现教育自由。联邦政府应通过一项联邦税收抵免,以支持各州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学校选择”^[19]。特朗普站在联邦政府的角度,主张高等教育成本均摊,在各州负责主要经费的前提下,支持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市场参与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特朗普政府主张改革联邦政府援助政策,包括简化联邦政府助学金的申请程序、更新受助大学生数据库、提升助学金的购买力等^[20],通过学生助学金等财政措施彰显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下的美国高等教育将继续保持其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 层级目标: 提升学生能力和美国竞争力

在美国,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而被视为必要的个人经济机会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21]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注重学生能力和学业成就的发展,未来将继续关注学生在入学机会、学业表现和职业技能方面的表现。据官方数据预测,到2026年秋季,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总入学率同比2015年秋季将增加13%,预计提供公立和私立学位的高等院校的入学率都会增加。^[22]其中,18至24岁区间的学生将增长17%,25至34岁区间的学生增长11%,35岁以上区间的学生将增长4%,三者比率基本达到持平状态。^[23]学生入学比率的持续增加和学生类型的持续多样化,意味着高等教育只有不断扩充其内涵,才能满足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特朗普政府关注学生学业成就和能力的发展,在STEM教育、传统黑人大学和学院、国际教育等方面加大资助力度,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胜任力。

(三) 保障机制: 加强问责制和数字技术使用

保障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与技术支持,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加强问责和依靠数字技术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一是注重高等教育问责。相较于以认证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质量改进,以问责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更强调市场中消费者的选择,并以此

为导向提升高等教育质量。^[24]美国高等教育问责机制以学生学业成就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并以此作为判定院校质量的重要依据。美国出于增加高等教育竞争力和满足学生需求的目的,将重点关注能够反映学生学业成就的测量工具。高等教育问责不在于追究领导者和管理者责任,而是在外部力量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督和竞争中提升教育质量。^[25]二是依靠数字技术的保障。美国联邦政府注重数据的开放透明度,社会公众以访问数据的方式了解高等教育相关信息,为学生选择高校提供依据,同时发挥监督高校办学质量的功能;电子政务的全面推行能简化高等教育办事流程,为教师、学生和相关行政人员节约大量时间精力,提升工作绩效。^[26]信息数据的大量开放必然要求确立信息数据的安全边界。未来,美国联邦政府在更新大学积分卡使用制度、为学生提供其所需学校而非最好学校的信息的同时,将进一步优化电子政务的技术体验,加强信息数据的分类和管理,以维护个人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

(四) 重点领域: 以STEM教育和国际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美国高等教育始终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学生的个体成就。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将持续关注STEM教育和国际化教育,巩固STEM教育和国际教育的发展成果,把握好培养高素质综合人才的两个关键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一直是整个美国历史上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美国希望所有美国人都将终身获得高质量的STEM教育,并成为STEM素养、创新和就业方面的全球领导者。未来几年,美国将致力于为STEM扫盲,使全体美国人享有STEM教育;增加STEM教育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为未来社会培养STEM人才。^[27]同时,美国官方文件指出,有效的国内教育议程必须是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文化胜任力的公民。^[28]美国高等教育高度重视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围绕国家制定的相关议程,在实施国际教育计划、参与国际基准活动(含教育评估)以及与盟国和多边组织参与战略对话方面将继续积极开展行动。通过开展相关课程,帮助学生获得及理解专业学科知识,优化大学生在合作交流、掌握别国语言、多视角分析、公民

和全球性参与方面的能力;向其他国家学习并与其合作,借鉴他国教与学的成功经验以加强美国高等教育;积极开展高等教育外交,促进美国的国际优先事项。

五、结语

明确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定位能保证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其理念指导下确定战略目标、方案与举措,开展各项现代化战略活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有明确的官方文本规划,但面临着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挑战。整体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学生学业成就为关注重心,注重以监督问责的方式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以多元理念重新注解高等教育公平,提供更多的多元入学机会,培养具有全球文化胜任力的美国公民。基于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整体理解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主题与走向,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为早日把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需继续遵循“以人为本”这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理念^[29],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活动,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举全国之力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加强学生学业成就以适应发展和提升中国人才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战略目标;发挥高等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借助大数据网络技术优化高等教育要素;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STEM人才助力5G革命。同时,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理念生成到落地,只有做好战略保障、提供技术和制度支持,才有可能克服其挑战。总之我们需要直面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中面临的挑战,做好相应战略保障与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 [1] White House. Proposals to Re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EB/OL]. (2019-03-20) [2020-02-0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3/HEA-Principles.pdf>.
- [2] Scott-Clayton. Judith. "The Looming Student Loan Default Crisis is Worse Than we Thought." Brookings Institution Evidence Speaks Reports. January 2018[EB/OL]. (2018-01-20) [2020-07-08].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8/01/scott-clayton-report.pdf>.
- [3] White House. Proposals to Re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EB/OL]. (2019-03-20) [2020-08-0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3/HEA-Principles.pdf>.
- [4]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EB/OL]. (2018-11-18) [2020-09-02]. <https://sites.ed.gov/international/files/2018/11/Succeeding-Globally-Through-International-Education-and-Engagement-Update-2018.pdf>.
- [5]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EB/OL]. (2018-11-18) [2020-02-02]. <https://sites.ed.gov/international/files/2018/11/Succeeding-Globally-Through-International-Education-and-Engagement-Update-2018.pdf>.
- [6] 戴维·拉布雷,周勇.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3):24-39.
- [7] 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徐丹.寻求高等教育的明智增长——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历史与趋势[J].大学教育科学,2010(5):78-83.
- [8] 杨红霞.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新动向及改革趋势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4):87-91.
- [9] 代林利,钟周.论美国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认证协会的利益互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1):97-102.
- [10] 胡健,杨建国.为质量而问责: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19(8):68-78.
- [11] 张颖.由多元到平等:美国高等教育“AA”方案的合宪性理论反思[J].法学评论,2018(4):178-185.
- [12] 段世飞,辛越优.教育市场化能否让美国教育更公正与

- 卓越?——新任“商人”总统特朗普教育政策主张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6):3-12.
- [13] 邓静秋. 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宪法基础[J]. 北京教育(高教), 2019(6):11-14.
- [14] 胡成功, 张相乐. 从“普及高等教育”到“学习化社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探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5(9):1-11.
- [15] 王正青, 陈琴. 特朗普政府新移民政策对美国高校留学生教育的潜在影响与争论[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7):20-27
- [16]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EB/OL]. (2018-11-18) [2020-02-02]. <https://sites.ed.gov/international/files/2018/11/Succeeding-Globally-Through-International-Education-and-Engagement-Update-2018.pdf>.
- [17] 钟周, 张传杰. 立足本地、参与全球:全球胜任力美国国家教育战略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2):60-68.
- [18] President's FY 2021 Budget Request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B/OL]. (2020-02-10) [2020-09-01]. <https://www2.ed.gov/about/overview/budget/budget21/index.html>.
- [19]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iscal Year 2021 Budget Summary[EB/OL]. (2020-02-10) [2020-03-01]. <https://www.ed.gov/category/keyword/2021-budget>.
- [20] Gabriel R. Serna.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Federal Aid Policy in Financing 21st 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for Underserved Groups Recent Trends.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New Proposals [J]. Journal of Student Financial Aid, 2019(2):13-21.
- [21] Better Information for Better College Choice &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EB/OL]. (2017-01-28) [2020-02-20]. <https://collegescorecard.ed.gov/assets/BetterInformationForBetterCollegeChoiceAndInstitutionalPerformance.pdf>.
- [22] Projections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to 2026 Forty-fifth Edition[EB/OL]. (2018-04-15) [2020-02-02]. <https://nces.ed.gov/pubs2018/2018019.pdf>.
- [23] Projections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to 2026 Forty-fifth Edition[EB/OL]. (2018-04-15) [2020-02-02]. <https://nces.ed.gov/pubs2018/2018019.pdf>.
- [24] 苏永建.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历史演进、全球扩散与发展趋势[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12):1-11.
- [25] 胡健, 杨建国. 为质量而问责: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及其启示[J]. 教育研究, 2019(8):68-78.
- [26] 付淑琼. 数据治教: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策略[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11):20-26.
- [27] 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n'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EB/OL]. (2018-11-08) [2020-02-0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2/STEM-Education-Strategic-Plan-2018.pdf>.
- [28]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EB/OL]. (2018-11-18) [2020-02-02]. <https://sites.ed.gov/international/files/2018/11/Succeeding-Globally-Through-International-Education-and-Engagement-Update-2018.pdf>.
- [29] 瞿振元.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应重点解决七个关键问题[J]. 职业技术教育, 2017(25):7.

The Strategic Theme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YUAN Liping SHI Jiaxi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is a textual educational program made by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Since President Trump came to power in 2017,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relevant strategic plans to promote it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o a new level. Their strategic themes mainly focus on quality assurance, market integration, education equit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etc., and highlight their emphases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quality and equity, education fund use efficiency, diversified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globally competent tal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primarily towards entity participation, level targets, supporting mechanism, and key areas; in future, the U.S. will further expand market and state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and the nation as a whole, strengthe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 through STEM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them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s of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at of China.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themes; development trend

社会正义论视角中的新高考公平性问题的研究

王新风 钟秉林

摘要:新一轮高考改革在促进公平、促进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公平性争议。社会正义理论关于公平与正义等的基本观点,为解读新高考公平性提供了理论视角。从社会正义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选优任能的正当性与选拔标准的多元性之间的不一致是影响高考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促进多元参与下的科学决策,理性引导社会舆论,加强高考改革配套,保障程序公平,维护社会正义,是保证高考改革稳步进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正义论;新高考;公平性

中图分类号: G63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42-07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启动首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上海、浙江改革试点平稳落地后,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启动了第二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在考试时间、考试次数等方面进行了调整;2019年,江苏、河北、辽宁、湖北、湖南、福建、广东、重庆等8省市公布了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从2018年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实施新高考。从浙沪等地试点经验来看,新一轮高考改革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公平性争议,从社会正义论的视角解读新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可以为高考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新高考的公平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在促进个体阶层流动、增加工农子女入学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高考制度依然被认为是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不可否认的

是,高考制度的科学性与公平性矛盾一直存在。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从利益相关群体视角来看,新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包括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考试内容的公平性、考试方式的公平性、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等方面。^[1]

(一) 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

我国的招生计划分配一直实施分省定额的政策,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特点,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招生计划分配的价值导向也有所差异。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强调效率优先,招生计划向重点高校、考生质量好的地区倾斜。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下降等质疑。因此,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在招生计划分配方面提出了多项促进公平的举措,包括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旨在破解高考的区域公平与城乡公平难题。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学者通过对“985工程”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跟踪与评价研究”(AEAA17004)

作者简介:王新风,女,山东临朐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高考改革研究;钟秉林,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高考改革研究。

高校计划招生数据分析发现,“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以来,大幅度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2]当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分省定额政策带来省际招生计划分配不均的问题,具体表现在重点高校属地招生比例过高,人口大省因报考人数多,录取比例低等等。笔者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被访谈者认为,专项计划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改变农村地区教育落后的现实,也没有覆盖需要补偿的所有人群。^[3]同时协作计划如何确定科学合理的指标分配计划也存在制度和现实层面的困境。^[4]部分省份因协作计划指标调出数等问题引发“减招事件”。

(二) 考试内容的公平性

新高考考试内容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高考科目设置的选择性衍生出来的公平性问题和考试内容的能力立意存在的两难价值选择。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主要是指不同考试科目对所有考生都是相对平等的,不存在社会背景、城乡、性别差异。新高考考试科目的公平性问题体现在相似学习能力的学生,因为选择不同科目而考试成绩出现较大的差异,比如试点省份首届考生选择物理科目成绩差异较大。同时,考生出现趋易避难的选择倾向,学生放弃物理学科而选择技术学科,能够获得较高的分数。考试内容的公平性问题表现在其城市化倾向对落后地区及农村考生不利,能力考察的公平性不足成为高考内容改革的弊病^[5],新高考的能力立意得到高中教师较为普遍的认可,但是他们也认为薄弱学校的学生、农村学生因为短时间内无法提升这种能力而处于不利地位。^[6]

(三) 考试方式的公平性

国内学者在分析浙江和上海两地高考改革方案的基础上,认为新高考改革从形式公平走向内涵性公平,是一种实质性公平,尤其表现在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在考试次数、考试时间、考试类型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次选择机会,满足学生的兴趣特长。^[7]考试方式的公平性问题主要体现在等级赋分制、考试次数等方面。一方面,新高考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制,其初衷是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分值的可比性问题,以等级制计分方式避免学生分分必争的现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等级赋分制会在

一定程度上对优秀的学生不利,改革省份部分学生会放弃选择物理等科目。另一方面,为破解“一考定终身”,降低偶然因素对考生的影响,新高考试点省份探索多次考试,甚至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同台竞技。但是因为考试时间、考试群体、命题难度的不同,不同考试次数成绩是否等值受到质疑。

(四) 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

新高考招生录取方式的改革包括取消录取批次、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探索综合评价招生以及规范考试加分政策等方面。总体来说,利益相关群体对新高考招生录取方式的改革认可度较高。尤其是新高考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模式,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综合评价招生实现了学生与高校的双向选择,高校对扩大综合评价招生的意愿强烈,而综合评价招生学生进入高校后也表现出较强的学习潜力和综合素质。但综合评价招生确实也可能对农村学生等弱势群体不利,尤其是因为其家庭文化资本的限制,弱势群体子女难以在面试等环节脱颖而出。同时,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如何统一、高校如何参考也面临困境。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诚信机制、综合评价技术、教育评价范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参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考的权威性。^[8]

高考制度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分配规则受制于社会资源分布状况和社会总体价值导向。高考具有促进科学选才、促进公平、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等多重功能,公平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发展性等多元属性,高考公平问题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视角看待新高考公平性问题,可以在更加宏观的理论视角和社会结构体系中审视高考制度,进而提出深化高考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二、社会正义论视角的高考公平

20世纪70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崛起,进而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哲学领域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弗里德里

希·冯·哈耶克、罗伯特·诺奇克等。他们反对边沁和密尔以效用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即以实际达到的总效用最大化作为公平的价值标准,都将自由作为民主社会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当然,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戴维·米勒将罗尔斯视为左翼的自由派,而哈耶克是右翼的自由派;我国学者则将罗尔斯视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诺奇克是权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9]等。

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在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的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兴起,代表人物包括迈克尔·J·桑德尔、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戴维·米勒等。他们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坚持社群整体利益至上;提倡国家在道德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倡导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合作互动的善治之路。^[10]社群主义正义观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多元性特征。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占有绝对地位。西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规则的绝对性,而新自由主义反对这种功利主义,在尊重自由规则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补偿。因此,他的社会正义理论原则包括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之后的正义理论流派都是在继承与批判他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自身的理论脉络。诺奇克认为补偿原则的实施会伤及个体的权利,因此他提出了强调“持有正义”的资格正义理论,纠正罗尔斯的补偿原则过于强调平等而对既得利益者权利的侵犯。而以麦金太尔、米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强调基于社群的正义理论,强调尊重多元利益主体的善治和协同治理。

从社会正义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择优任能的正当性与选拔标准的多元性之间并不一致,这可以成为新一轮高考改革产生公平性质疑的解读视角。

(一) 社会正义的冲突

西方社会正义理论都在正义的概念框架下讨论公平问题。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诺奇克强调持有正义,米勒强调多元的正义观等,都力图在社会

正义的理念下为破解公平的复杂性寻找答案。公平与正义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与公平相比,正义更加强调社会基本价值导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强调的是在同一标准尺度下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正义是比公平更上位的概念。在社会正义理论的视角下思考高考公平问题,可以在正义理论框架下对利益相关者视角中的高考公平性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评判,通过程序公平对有失公正的政策进行矫正或者变通,继而对高考政策调整提供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历史演变过程^[11],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时代中国社会更强调发展公平的紧迫性。^[12]因此,当前我国社会的正义观更体现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补偿,对高考补偿政策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价值选择的正当性与个体权利自由之间的冲突。

从社会正义的立场看,当前我国高校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具有正当性。我国高校招生计划分配综合考量了国家、民族、地区、城乡等多种利益关系,因此在招生计划分配的环节,并非仅仅遵循同一个标准,而从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历史沿革等角度分别评价一项高考政策的公平性,未免有失偏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高考政策的公平性,则能够做出相对全面而更加中肯的评判。米勒强调在制度设计中“应得”的公平原则,认为在确定正义的要求时应该把人们不同的应得考虑进去,在不同标准之间进行平衡。^[13]高校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公平性问题应综合考量民族、地区、城乡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的“应得”。

社会正义理论论述了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米勒认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也会发生冲突,甚至可以称为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减招事件”呈现出来的就是计划调入省份与计划调出省份的受教育者之间受教育权利的冲突。国家层面为了促进区域公平对招生计划指标进行宏观调控,高校生源指标调出省份的家长从本省考生升学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减少指标调出数。从正义与公平、自由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保障受教育者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在高等教育资源分

配不均的前提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招生计划的分配,缩小省际高等教育录取率的差异,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来看,都符合社会正义的立场。

(二) 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

社会正义理论强调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程序公平可以保障结果公平,因此程序不公平会带来结果的不公平;但同时程序公平未必能够带来结果公平,因为程序执行者的认知、社会背景因素以及程序的交叉等因素,也会带来结果的不公平。

1. 程序公平影响结果公平

米勒提出了程序公平的标准,包括平等、准确、公开、尊严。在程序与结果正义之间,米勒的观点是坚持实质的或结果的正义在评价中的优先性。新一轮高考改革中专项计划的实施、不同科目赋分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程序公平的标准,继而带来结果的不公平,影响考试的权威性与科学性。

首先是专项计划的程序公平问题。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实施的专项计划并没有对非贫困县的农村地区或者城市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偿,同时专项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因身份识别不够精准而让优势阶层受益的问题,即“奶油层”争议。^[14]哈耶克对人们致力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的能力持有悲观态度,认为致力于促进公平的政策只对那些善于利用这些政策的人有利,甚至可能会增加不平等。^[15]因此,我国的专项计划补偿性招生政策需要细化,实现“精准”定位。

其次是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的争议。从新高考试点省份来看,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制是为了在总分录取模式下不同选考科目的分值具有可比性,而且比较简单易懂,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在选考人群结构相同的前提下是科学和公平的。但是因为参与考试的学生群体不同,等级赋分制就违背了程序公平应该具有的平等的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科目之间分数相同,但学业成绩并不等值。后续改革省份在浙沪经验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部分省份出台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第三轮改革省份实施“3+1+2”科目考试,但是等级赋分的问题解决

途径尚需进一步探索。

最后是不同的考试科目的可比性。新一轮高考改革实施“3+3”或“3+1+2”科目设置,选考的假设是3门或者2门选考科目同等重要,中学教育能够保证被选的7门(6门或者4门)科目同等重要,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考试内容都应该是同一水平,但实际上不同科目的学习难度、教学质量、考试内容等有很大差别,学生如果选择某一科目不能获得预期的考试成绩,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16]

2. 程序公平未必实现结果公平

米勒认为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并不完全一致,常常发生冲突。比如,综合评价招生和自主招生过程中专家面试的主观性、不同高校在综合评价环节看重的项目及其占比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入学机会。

其次,因为外在于程序的背景条件,公平的程序不能达到正义的结果。米勒认为,努力和才能确实能够成为应得的合法基础,但强调人们用来竞争有利地位的机会是受到他们的社会背景的强烈影响的^[17],忽略程序公平的背景条件会影响结果的公平。综合评价招生中,“能言善辩”“逻辑清晰”的考生在面试中更容易胜出,但以农村考生为主的部分县市级或者农村中学的考生显然不占有优势。新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选择性和考试内容的能力立意,尊重了学生的选择性和差异性,也可能会忽略学习者背景条件存在的城乡、区域、校际差异,拉大学习者的差距,继而带来不公平。

最后,两种或者更多程序相互交叉时,会出现程序与结果的分歧。首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浙江省将学业水平考试的合格性考试和选拔性考试同一张试卷进行,带来区分度和公平性问题。有学者将合格性考试定义为“基于双重分数解释的常模相关——标准参考测验”,选考科目考试是“基于双重分数解释的标准相关——常模参考测验”,二者性质不同,考试结果用作不同用途的解释时,每一种预期解释都需要进行效度检验,检验考试结果的合理性。^[18]2018年浙江省进行了政策微调,将合格性考试与选拔性考试分离,将两种程序区分开来以解决考试结果的区分度和公平性问题。

（三）选优任能的正当性与标准的多元性

我国以统一高考为主的人才选拔方式体现为选优任能、唯才是举，这正是社会正义理论视角中精英管理社会理想的特征。社群主义的正义理论认为，品质作为选优任能的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选优任能的正当性与选拔标准的多元性的冲突，成为利益相关者质疑综合素质评价、自主招生以及综合评价招生公平性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选优任能具有正当性。科学选才背后的理论假设是，通过高考选才可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撑。米勒提出了精英管理的社会理想，认为每个人的地位和报酬取决于其才能和努力，社会制度设计需要根据个人品质来分配社会有利地位，体现为择优的原则。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以及当前我国高校实施的“强基计划”等制度设计都体现出了这种“唯才是举”的特征。笔者通过对综合评价招生方式录取的学生的追踪发现，试点高校各专业对综合评价招生的生源满意度高，学生在高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一定优势，面试等级分和高考投档成绩与平均GPA具有线性关系，因此认为综合评价招生对考生的评价是合理有效的，也正是基于此，高校对于扩大综合评价招生规模的诉求较为强烈。^[19]

另一方面，综合评价招生等高考新政的选拔标准具有多元性。综合素质本身难以测定，并不是所有的知识、能力、性格特征都能够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新高考招生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是为了改变以高考分数为唯一标准的一元评价模式，强调对学生发展的过程性评价。从米勒关于程序正义的标准来看，综合素质评价程序更加强调准确和公开，也就是说全面而客观地记录学生发展情况，便于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参考选择，同时将这些内容的评价标准和结果公示公开，保障公平公正。但如何记录、如何评价；由谁记录、由谁评价；因何记录、因何评价；如何使用、由谁使用？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用一种标准进行统一的评价，进而在综合素质评价的形式和结果上都可能存在公平性问题。总之，对素质的判断缺乏客观的标准，在缺乏统一标

准的前提下，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就容易产生公平性的质疑。

三、促进高考公平的策略建议

社会正义论为我们提供了解析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公平性的理论视角，从而可以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冲突、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冲突、选优任能的正当性与标准多元性的冲突的视角，提出解决新高考公平性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理性引导，保障社会正义

罗尔斯批判“直觉主义”公平观，认为这种公平观依靠直觉衡量，不可能给出任何建设性的解答。^[20]在讨论高考公平问题时，对高考制度公平与否的判断首先依赖直觉，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评价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也是首先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直觉，但是高考改革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应该尽量减少对直觉判断的依赖，确定一种相对一致的判断。社会政策的走势及其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是非常复杂的，体现了决策者对社会发展趋势和总体福利状况的判断，不能仅从某一群体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评判高考改革，要从多元利益主体平衡的角度，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立足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去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高考综合改革。这就需要政策研究者科学解读相关政策，理性引导社会舆论。

（二）科学决策，实现程序公平

新高考改革中产生的公平性问题，可以通过对考试时间、考试次数、合格性考试与选拔性考试分离以及考试成绩的计分方式等方面的改进来实现。浙沪高考改革试点中在这些方面产生的问题，在本省或者后续试点的省份改革方案中都进行了政策调整，比如北京、山东等地选考科目考试时间与统考时间一致；浙江省将合格性考试与选拔性考试合一，选拔性考试科目的等级赋分进行相应的调整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高考的程序公平。后续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依然需要加强专题研究，包括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等级性考试与统考的关系，选拔性考试科目分值的可比性与公平性，尤其是等级赋分制的技术调整、实施标准分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与指标体系的多元性

等问题。应组建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技术专业人员、高校、中学多元参与的研究队伍,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为教育行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程序的公平性实现高考的公平性。

(三) 多元参与, 形成改革共识

社群主义的正义论者解决公平性问题的方式是强调多元参与下的社会治理。面对有争议的问题,多元参与是保证程序正义的前提,有利于改革的持续性。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既是对利益相关者个体的尊重和利益诉求表达的合理途径,也是社会义务本身的自我实现。在高考改革过程中充分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吸纳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利于改革过程顺利进行。浙江高考改革的过程中,对选考科目、考试时间进行了调整,尽管在征求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时,学生与教师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在论证过程中充分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意识到每年4月和10月的考试时间安排打乱了传统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较大的工作负担,最终权衡利弊,尊重了教师的意见,社会舆论对此反映也比较平稳。高中教师群体是高考改革的直接执行者,他们在改革中的获得感和改革的参与度,直接影响了各利益相关群体对高考综合改革成效的评价。总之,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以程序上的正义保证结果的正义,即便不能实现结果的公平,也因为程序公平而能取得更多的共识。

(四) 配套改革, 建立长效机制

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体现综合改革的特征,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改革配套机制。首先要建立与高考改革相适应的资源配套机制,包括与新高考的选择性理念相配套的教学资源配置,包括充足的师资,满足学生选课走班的需求,保障学生的起点与过程公平。其次要从省级层面建立相应的平台,比如综合素质评价的平台、综合评价招生的平台,为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程,方便中学、学生、家长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填写,保证综合素质评价的信度和效度,为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实现更大程度的程序公平。最后,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强统筹,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岗位,满足学校

和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避免不同学校因办学条件有限而不能为学生提供相关资源带来的不公平。增强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呈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综合素质特征。

参考文献

- [1] 王新风,钟秉林.新高考公平性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浙沪经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4):38-46.
- [2] 张小萍,张良.中国高校“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成效分析——“985工程”高校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48-56.
- [3] 王新风,钟秉林.新高考公平性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浙沪经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4):38-46.
- [4] 李木洲,叶晓芳.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7(2):22-29.
- [5] 李木洲.高考改革的历史反思[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33.
- [6] 王新风.新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0(1):58-66.
- [7] 金晓明.高考改革:从形式公平走向实质公平——推进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430-434.
- [8] 李木洲.高考测试制度改革的历史反思——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3):58-63.
- [9] 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4.
- [10] 何霜梅.正义与社群: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 [11] 黄有璋.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及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7(10):171-175.
- [12] 胡志高,曹建华.公平还是效率: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6):16-22.
- [13]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46.
- [14] 申素平,王俊.美国公立高校积极差别待遇录取政策反思[J].教育研究,2017(9):140-147.
- [15]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66-175.

- [16] 王新风. 新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1): 58-66.
- [17] 戴维·米勒. 社会正义原则[M]. 应奇,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200.
- [18] 陶百强. 对我国新高考方案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思考与政策建议——浙江、上海2014年高考改革学业水平考试方案商榷[J]. 中国考试, 2015(8): 26-38.
- [19] 钟秉林, 王新风. 新高考综合评价招生的成效与现实困境探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5): 33-39.
- [20]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3.

On the Fairnes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WANG Xinfeng ZHONG Binglin

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not only promotes fairness, scientific talent selec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generates new disputes about fairness. The core viewpoints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pro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irnes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fairness,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result fairness, justification of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and diversity of selection criteria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airnes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e should promot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under multiple participation, guide public opinion rationally, issu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he reform, guarantee procedural fairness, defend social justice, and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Key words: social justice theory;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airness

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的考察

洪银兴

摘要: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区域要真正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 需要根据新时代要求进行制度和组织的创新, 包括: 区域内形成合作创新的机制, 壮大核心区的科创内核, 科创中心和其外围有效对接,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对创新型区域可从三方面进行评价: 一是创新产出评价, 二是创新投入评价, 三是创新制度评价。创新型区域都会拥有若干个创新型城市。依托创新型城市向周边辐射创新成果, 就能带动创新型区域的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指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创新成果极为丰硕、对周边科技和产业创新具有较强辐射和引领作用的城市。创新型城市的特征是创新源丰富, 创新的动力来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和各类创新型人才高度集聚、广泛分布的科技创新平台、紧密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型区域尺度范围包含多个创新型城市及其辐射的外围地区。外围与创新中心对接, 要求作为创新中心的创新型城市主动向外围扩散技术。这是建设创新型区域的主动力。外围要成为创新型区域的一部分, 更需要接受中心扩散的高新技术, 主要措施包括建科技创新平台、建科技创新园区、建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其内生条件涉及企业、人和政府三个方面: 要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加强人力资本投入, 建设创新型政府。

关键词: 区域; 创新体系; 长三角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49-11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现在该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 地域面积占全国的1/26; 常住人口占全国的1/6;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近1/4。现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长三角区域来说, 既要明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更要明确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国家需求。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科教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新一体化, 成为创新驱动的先行区。这个地区成为创新型区域将会成为我国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有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 在这么大的区域范围内, 科教资源分布很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 如何在这么大的区域内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创新型区域, 是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建设创新型区域的新时代要求

在一个大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需要有若干个创新型区域支撑。创新型区域属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创新发展研究”(19JJD79002)

作者简介: 洪银兴, 男, 江苏常州人, 经济学博士,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方向为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

部分，直接反映和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毗邻的地区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 and 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创新型区域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子系统，具备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创新型区域定义为：在创新的社会文化、制度与体制、政策与法规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本区域要素禀赋和国内外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高度集聚、产学研紧密结合、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形成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的区域。一体化的长三角区域最有条件率先建成创新型区域。

已有的创新型区域理论有两点不能说明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型区域建设。第一，已有的创新型区域的尺度范围都不大，如美国的硅谷地区、我国的中关村。而长三角区域包括三省一市，范围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创新型区域都不可企及的。第二，已有的创新型区域强调区域内科技水平相近。而在长三角区域，无论是创新资源的分布、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的开放度都很不平衡。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区域内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因此不同的区域内不同地区在创新方面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面对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创新建设创新型区域的目标是要形成创新合力和整体的竞争优势。就三省一市在创新要素的比较优势来说，上海、苏州、杭州的国际化程度更高，吸引国际创新要素的能力强。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具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能力。江苏的苏南、浙江的浙东地区经济发达，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突出，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的能力强。江苏的苏北、浙江的浙西以及安徽的广大地区虽然同这些地区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但有广阔的腹地，而且正在进入经济增长长期，有条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很显然，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型区域建设也存在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这样，长三角建设创新型区域的基本要求是区域内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在合作中形成创新活力，形成区域创新体系。

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是区域创新体系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在地理上邻近能够产

生创新要素集聚的存在基础，但未必会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存在基础。创新体系的潜力最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创新源和通畅的新技术应用的通道。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是指参与者在既定的空间框架内的定位，丰富的创新源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可以转化的原创性技术，便捷畅通的新技术应用通道能够使区域内创新的新技术扩散并得以产业化。

上述区域创新体系基础性要素得以转换成区域创新体系，要求制度和组织完善，能够实现区域内创新要素的集成。这意味着长三角区域虽然具备建设创新型区域的基础条件，但要真正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需要根据进入新时代要求进行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五个方面：

第一，区域内形成合作创新的机制。长三角区域各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长期以来各地多有竞争少有合作，尤其是上海周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竞争更为激烈，尤其是在创新要素的争夺上。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形成不同地区的创新合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便捷流动基础上改变要素不均衡分布状态。各地都会有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要求，但各地集聚的创新要素不应该是竞争同种要素，而是有差别地集聚创新要素，包括分别获取区域内、区域外的及国际的创新要素。分别获取知识创新要素，新技术要素，产业创新要素。在此基础上区域内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创新机构和企业紧密合作，形成创新网络，形成建立在创新链基础上的供应链，构建起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二，壮大长三角核心区的科创内核。过去长三角区域范围被确定为上海和紧靠上海的江苏和浙江的16个市，这时上海的中心地位突出，对周边有足够的带动力和辐射力。现在长三角区域范围扩大到三省一市，上海的GDP只占长三角总量的17%。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上海中心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明显不足。长三角区域建设创新型区域就需要增强长三角中心的内核，从而增强其辐射力。如何增强中心？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心扩容，做大做强内核，形成新的经济板块——长三角一体化科创核心区，也就是区域内创新型城市构成的创新核心区。具体地说，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合（合

肥)集中了长三角乃至全国最丰富的科教资源,大学和科研院所最为密集(除上海外17所“双一流”高校)。在科技创新依托科学新发现的世界趋势下,长三角核心区的内核可以定位在沪宁杭合科技创新走廊,从而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形成科创中心+高科技产业化基地。

第三,形成科创中心与其外围的有效对接。创新型区域也有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外围与科创中心对接的主要方式是将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是区域乃至全国的科创中心,但因处于城市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空间有限,这意味着科创中心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空间上分开,但有有效对接的要求。上海郊区、苏南、浙东及合肥周边的区域首先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其基础性条件不只是毗邻科创中心,可以就近接受其创新的技术,还有三个条件不能忽视,一是这些地区人员文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二是这些地区经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的洗礼,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突出;三是这些地区建立了有效接受技术转移的载体和基地。这些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为吸引外资建立的各类开发区就卓有成效,现在为吸引新技术建立起各类大学科技园区同样非常有效。现在三省一市的其他地区都进入长三角范围,就需要在更大范围的外围地区对接科创中心。

第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区域的着力点在哪里?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①。这就是创新的目标导向。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转向了技术领域。美国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路径就是利用产业链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断供技术、中间产品和市场,再加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导致多条全球产业链中断,其结果是产业链重组。对我国来说,包含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产业链环节回流的前提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发展开放型经济阶段,长三角区域的优势在供应链完备,员工的学习能力强,适合建世界工厂,外商直接投资便可积极进入。现在建创新型区域,需要在原有的完备的

供应链基础上在全区域范围部署产业创新链。这就对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提出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的要求。这是科技和产业创新的目标导向。其方向有两个:一是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布局的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布局创新链,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攀升上布局创新链。长三角的供应链不只是面对区域内,还要面向全国。相应的创新链就是要攻克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关键技术,替代全球价值链上国外高科技含量的中间品供给环节。产业链上的创新链着力研发能替代进口的关键核心技术。在区域内建创新链需要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效衔接。一方面创新核心技术的创新链要从基础研究开始,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高新技术,另一方面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化。形成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以及重要的创新平台和载体。

第五,创新型区域的开放性。自主创新不等于封闭创新。对引进的国外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本身即属于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提升创新能力需要调整开放战略。所谓开放式创新,是指各个国家主攻相同方向的科技,所产生的新知识、新科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主攻同一创新方向过程中吸收和引进新发明、新技术,可降低研发成本,并进入世界前沿。引进外资不再是追求数量,而是追求外资的技术和产业的先进性和高科技性。外资进入环节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研发环节延伸,由利用一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转向以创新资源为主。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通过国际合作进行开放式创新,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力量,依托这些地区的研究型大学开展国际合作,可以获取国际创新资源培育出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先进技术,以原创性成果带动整个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创新型区域的评价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是否成为创新型

国家或者创新型地区,这里既有先进国家的国际标准,又有理论上的科学界定,还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需要综合研究,确定客观的评价标准。

对创新型国家的评价,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的界定,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较高,重要产业的国际技术竞争力较强,科技投入产出的绩效较高,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家财富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大约有2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符合创新型国家特征。具体指标如下:^②

一是研发投入强度高。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如美国为2.6%,日本、韩国、瑞典、芬兰和爱尔兰为3%,以色列则多年保持在4%以上。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强。其核心技术自给率高,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高技术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三是创新产出能力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强。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知识创新成果居全球前列。

四是科技进步贡献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以上。

五是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具有支持创新的良好科技管理体系,支持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备。教育发达,信息等科技设施水平高,知识产权保护严格,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发达。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突出。

上述创新型国家的评价标准无疑是创新型区域的重要参照系。但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使整个国家达到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像长三角这样的区域创新型区域评价标准就应该更高。

与创新型国家的创新产出标准相比,创新型区域的创新产出不只关注原创性成果,更强调技术应用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本要求,更是创新型区域的要求。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综合反映,目前美国、日本平均科技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英

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为50%~60%。根据已有的分析资料,我国目前的平均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0%~40%,即使是创新能力处于全国前列的江苏也才50%多一点。显然离创新型国家标准有很大的距离。对照先行创新型区域的参照系,创新型区域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价。

一是创新产出评价指标。

首先,高水平原创性创新成果丰硕。科技论文是知识创新的产出,其中相当多的是原始创新的来源。发明专利是应用性研究的产出,是原创性创新成果。建设创新型区域不仅要求多产出反映国际水平的科技论文,提供原始创新的成果,同时要产出更多的发明专利,提高发明专利在全国的份额。

其次,原始创新成果顺畅转化为高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才具有国际竞争的优势。高技术产品来源,有的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有的是依托自主创新的技术。后者包括原创性成果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果。这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源头。因此创新型区域特别关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新产品和新产业。这就要求科技创新的成果(科技论文和发明专利)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份额,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品牌的份额,这样,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就成为创新型区域的重要评价指标。

再次,绿色产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所有产业都能得到创新的绿色技术的改造,实现低碳、低排放、低能源消耗。环境和生态得到根本性改善。所有这些都要依靠科技创新。因此,创新型区域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区域。不仅创新的绿色技术先进,而且创新技术在区域的应用广泛,各项排放和能源消耗指标都处于低位,相应的空气优良程度和生态文明指标都处于前列。

最后,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就看你有没有发展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成果在重点领域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这是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力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也可以说是创新型区域的标志性成果。已有的创新型区域都是以创新的引领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标志的。例如硅谷涌现领导全球的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群,北卡“三角区”的生物医药、台湾的集成电路、班加罗尔的软件业、伦敦的金融服务业等都是因拥有掌握产业话语权的产业集群而成为创新型区域的。

目前的长三角区域,处于上海周边的区域产业水准较高,而在远离上海中心的区域来说,还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占很大比重。长三角区域要成为创新型区域,就要求全区域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依托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优化提升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形成若干个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若干个世界制造业集群的要求,长三角区域是最有条件的区域。位于长三角的各省近期都在就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建设做出规划。

江苏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自主可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遴选出的13个重点产业集群,包括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前沿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高端纺织、集成电路、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核心信息技术、汽车及零部件、新型显示等。

浙江加快打造之江文化产业带,做大做强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安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扩大智能家电、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产业优势,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开拓新材料、现代医疗医药、环保技术装备等产业潜力,加强重点企业培育和重点产品开发,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和配套能力。推进“中国声谷”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及智能语音产业集群。

在当下,现代产业竞争的主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竞争。关于如何反映产业的创新力,创新型区域的产业水准评价就有两个有关全球价值链方面的评

价。一是区域内形成多少条以我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二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处于低端还是中高端环节。相应的,长三角区域要成为创新型区域,就要求形成多条以我核心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由低端迈上中高端环节。

二是创新投入评价。

创新源丰富是创新型区域的基础性条件。创新源,或者是丰富的禀赋科教资源,或者是通过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吸引到丰富的技术成果。无论是哪种创新源,都需要足够的创新投入,以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型区域的主要标志是高强度的创新投入,不仅要求足够的经费投入,还要有足够的从事研发的人力投入。只有这样,才有高密度的研发活动。

首先是研发投入,以2007年为例,日本和美国的R&D投入分别占其GDP的3.44%和2.68%,瑞典和芬兰也都超过了3%。就长三角来说,作为创新型区域,研发投入的比重就应该高于创新型国家的平均水平(2%),应该以3%左右作为目标值。这里3%的研发投入,需要政府支持,但更需要企业有足够研发投入,创新型企业一般都有占其销售额8%以上的研发投入。

其次是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的投入。研发机构作为创新的直接载体,其数量与质量,特别是研发机构的质量是关键的因素。南京地区着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在制度上激励科研人员进入新型研发机构,效果非常明显。

三是创新制度评价。

创新制度涉及区域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建设,包括人才环境、创新成果供给环境、创新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主要特征为:创新要素高度集聚,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广泛分布,创新活动极为活跃,区域创新体系高效运行。具体表现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创新主体的角度看,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成为知识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平台上技术创新主体和知识创新主体协同作用,产学研深度融合。

其次,从创新要素的流动看,不仅充分有效地利用本地的创新资源,而且能有效地吸引国内外技术、资金、企业家等创新资源。本地创新要素同外

来创新要素深度融合。

最后，从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看，国家创新体系是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共同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有机系统，包括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两个方面。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将企业、大学与国家科技政策之间的互动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其研究的重点是知识的创新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并将企业、研究型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促进知识创新与扩散的组织视为创新的主要来源。这同样是区域创新体系核心内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处理好技术创新体系（企业为主体）、知识创新体系（大学为主体）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协同。新时代的创新不只源于以科学新发现为源头的“正向”创新路径以及由大学的知识创新、孵化高新技术到企业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模式，还源于市场拉动、产业发展到产业技术升级之间的“逆向”创新路径。其中，孵化高新技术和新技术产业化，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性环节，因为它是连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桥梁和纽带。创新型区域还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这样，创新型区域主要包括以下创新体系：

1. 知识创新体系。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建设和引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高端研发平台，深度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工作，把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国家基础科学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国内高水平的知识创新和国内外一流人才培养高地。知识创新部门创造出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并且有一批成果成为原始创新的源头，创造出一批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发明专利。

2. 技术创新体系。全区域范围各个产业和企业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产生一批有自主品牌的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培育出若干个类似华为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品牌的创新型企业。区域范围内的企业普遍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是采用新技术主体，更是研发新技术的主体。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型企业 and 创新企业家。依托国家和省级研发机构建设，围绕

优势产业和优势产业技术，建设和引进科技与产业创新对接的平台，重点是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公共服务平台、行业技术与产品开发平台、跨国机构区域性研发中心，打造更加便捷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通道。

3. 人才支撑体系。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型区域需要实施各类科技人才支撑计划，构建政策优势突出、服务环境一流、创业氛围浓厚、与产业发展相契合的人才集聚高地，为加快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4. 科技管理与政策保障体系。设立全区域科技创新管理高位协调机构，建立专业性综合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统一组织协调创新平台建设、产业化载体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形成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科技与产业联动发展的新型科技创新管理体系。

基于上述创新投入和制度建设，创新型区域会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能力：较高的创新资源投入能力、较高的知识创造能力、较高的技术应用与扩散能力、较高的创新产出能力、较高的创新环境支撑能力。概括起来，创新型区域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集群。

区域创新体系还涉及科创中心和外围的协同，笔者将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

三、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在已有的区域经济理论中，城市作为区域的发展极，主要是指在城市集聚主导产业，因而成为发展的中心。创新型区域赋予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新含义，指的是成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是科技创新要素的集聚地，也是区域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一个区域没有若干个创新型城市，不可能成为创新型区域。因此建设创新型区域首要任务是建集聚创新资源、辐射力强的创新型城市。

所谓创新型城市，是指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创新成果极为丰硕、对周边科技创新具有较强辐射和引领作用的城市。一般说来，创新型区域都会拥有若干个在区域内分布较为均匀的创新型城市。建成几个创新型城市，并依托创新型城市向周边辐射创

新成果,就能带动创新型区域的建设。

创新型城市的共同特征是创新源丰富,就是说创新型城市作为区域科创中心,需要充分的科教资源。创新的动力来自高水平的研究大学和各类创新型人才高度集聚、广泛分布的科技创新平台、紧密结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美国的硅谷有斯坦福、伯克利等世界一流大学,波士顿128号公路有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顿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实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对创新型城市来说,创新资源可能是内生的,如北京中关村,拥有丰富的禀赋科教资源;也可能是外源的,如深圳通过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吸引国内外丰富的创新资源成为创新型城市。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丰富的科教资源以内生为主,苏州、宁波的科教资源则是以外源为主,既包括吸引的区域外的大学资源,也包括引进外资的研发资源。

一般说来,雄厚的基础研究是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基础研究成果向新技术的转化。就如北京中关村,过去重点大学和科学院林立,但没有成为我国的创新中心。现在这里涌现了一批科创企业、研发机构、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并且有活跃的风险和创业投资,促进了大学和科学院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里充分转化为新技术,也就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因此,创新型城市集聚的创新资源不仅仅是科教资源,还需要拥有一批科技企业家,拥有一批创新平台和孵化器。拥有一批科技服务机构,包括:金融服务、软件服务、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科技中介,尤其是专事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高度集聚。由此这也就给长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这样的科教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指明了方向,要求建立起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到城市强的通道。

在实践中,科教资源禀赋丰富的城市不一定是创新型城市,科教资源禀赋不丰富的城市也可能成为创新型城市。关键是其具备吸引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的能力,就如深圳,科教资源很不丰富,但说它是创新型城市决不为过,原因是其依靠政策、体制和机制汇聚了国内外技术、资金、企业家等创新

资源。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也正在呈现出这种趋势。

由于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个方面,科技创新中心和新技术研发中心可以在空间上分开。因此在现实中,创新型城市有两种类型:一是高科技创新中心即基础研究中心及其成果的高科技化中心,如北京中关村研究型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各类研发新技术的机构林立,成为国家的科创中心;二是新技术研发中心,主要是高科技研发中心和高科技产业公司总部,如深圳拥有华为、中兴、大疆等一大批高科技产业公司总部。而在长三角区域,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所要创建的创新型城市就属于第一种类型,这里都有国内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有条件建设高科技的创新中心,而在上海还同时成为国际顶尖的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所要创建的创新型城市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些城市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产业技术创新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城市已经被国家批准为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方向就要像深圳那样以政策、体制和机制吸引外部创新资源的进入,突出研发新技术,推进高科技产业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发高密度的创新活动是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标志。在创新型城市,专业性技术和人才的高度集聚、较低的交易成本、活跃的创新创业、方便地进入与退出机制、资源的高度流动性及新知识的便捷传播,更容易激发创新主体的互动,创新活动的密度更高。当代创新活动不单是指企业内所进行的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活动,而是多层次的大众创新、网络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的知识创新活动,除了其承担重大课题研究外,科学家的国际流动、国际性科技信息交流、国际科技会议、学术研讨活动和各类科技讲座都很活跃。二是研发平台的技术创新活动,也就是科技成果向新技术的孵化和转化活动。与此相关的有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活动、众创空间、科技咨询以及科技创业活动。三是基层的创新活动,如大学生的创新活动,企业中工人的创新活动,甚至乡镇中的各种创新活动。同时支撑上述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培训和科技中介也极为活跃。这三个层面的活动相互促进,就会形

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

创新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除了创新创业者的自有资金外，更需要风险资本的介入。创新型城市一般都有活跃的科技金融，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充足的各类创业投资基金，便捷的上市通道，都会促进金融进入孵化新技术环节。在孵化新技术阶段集聚的金融资本数量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成为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标志。

创新型城市存在高效运行的创新体系。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科技资源的投入总量及其结构，又包括产出类型及其结构。创新型城市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主要是因为创新型城市能有效地吸引国内外创新要素的集聚，创新与文化相容，科学和技术、科技与金融融合，使创新活动的密度更高，因而创新产出效率更高。从创新的成功率看，创新型城市高效运行的创新体系表现在拥有“三高”的成功率：一是在创新型城市内进行科技创新的成功概率高，能够产出一批进入国际前沿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成果；二是在创新型城市进行科技创业，成功的概率高；三是科技创新的成果在创新型城市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功的概率高。

创新型城市是开放型城市。创新型城市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建设，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形成高端的创新链。其路径包括：引进外资不只是追求数量，而是注重外资技术和产业的先进性，吸引在全球处于产业链高端或前沿产业技术的跨国公司；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设计，吸引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人才到本地集聚，从过去注重吸引资本到注重吸引高端人才转变，注重吸引综合素质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利用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国外新技术在本区产业化，孵化和培育全球领先的新兴产业；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区设立研发机构，增强本土企业向外资研发机构的学习机会；除了“引进来”之外，还需要积极“走出去”，包括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雇佣国外先进技术研发人员，充分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根据以上分析，概括起来，创新型城市一般有以下特征：

1. 拥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完备的交通

通信网络，特别是智慧化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国际性的信息网络通道。

2. 国内领先，甚至达到国际水平的大学、科研院所，提供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并为产业输送技术、管理等各类人才，还通过产业发展论坛、前沿技术论坛等方式扩散新技术。

3. 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高度集聚，包括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孵化器，以及公共性、公益性科技服务平台。

4. 拥有吸引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宜居宜研环境，环保、宜居的城市环境，不仅作为创新创业的载体，还提供绿色、环保、宜居的生态环境以及吸引创新创业人才的生活条件。

5. 良好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居民素质普遍较高，不仅拥有国际一流人才，更拥有众多的高素质科学家与工程师、熟练技术工人。

6. 激励创新和创业的软硬件环境。拥有开放并激励创新的文化和制度。发达的直接服务于创新创业的科技服务业和优越的公共服务业；具备多元、包容的创新创业氛围，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按照建设沪宁杭合长三角科创核心区的思路建设创新型城市就有以下两个着力点：

一是创新政策同城化。以同城化路径建设分属不同行政区的创新型城市的内容包括：科技政策同城化，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税收等）分享机制，科技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建立建设通用、公共性科研平台。

二是补短板。上述城市要成为能带动创新型区域建设的科创中心需要补的短板有三：其一，补基础研究转型的短板，推动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和科学家向创新作为国之重器的核心技术转型；其二，补科学向技术转化的短板，不仅涉及发展众创平台，还涉及技术转移机制的建设；其三，补科技金融的短板，不仅要发展风险投资，还要提供科技企业上市的顺畅通道。

四、外围地区与科创中心的对接

创新型区域的创新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跟创新型

区域尺度范围相关。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区域的科创中心,但不能称为创新型区域。从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看,创新型区域尺度范围包含多个创新型城市及其辐射的外围地区。创新型区域的范围有多大,取决于科创中心的科技创新能力所能辐射的外围的尺度,也包括主动与创新中心对接的外围地区。这类外围地区成为创新型区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像一体化的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范围,其中有部分地区实际上远离创新中心,这些地区需要在主动与创新中心对接接受其科技成果辐射从而成为创新型区域的组成部分。

创新型区域内的不同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区域内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企业分布也不均匀。在此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区域要求各地都有明确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但不要求各地都从事同样内容的创新和创业。各地会根据各自的创新能力和供求条件分别从事科技创新、科技创业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但作为创新型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都会千方百计对接科创中心。

外围与创新中心对接,首先要求作为创新中心的创新型城市主动向外围扩散技术。这是建设创新型区域的主动力量。中心对外围是辐射还是虹吸创新资源,这不只是影响创新型区域的范围,还涉及中心自身的创新能力。同一般的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一样,在贫穷的外围不可能有平安的富裕中心。在科技落后的外围不可能有强大的创新中心。其直接原因是创新的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新技术并产业化才能实现其潜在价值,而创新中心普遍缺乏转化新技术,以及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空间,需要进入外围实现转化。

现阶段的科技创新更多地依靠科学新发现所转化的新技术。对外围来说,要成为创新型区域的一部分,更需要接受中心扩散的高新技术。现代的技术和产业更多来自集聚于中心的大学、科研院所创造的知识、发明和突破性科技成果。因此,必须考虑知识流动或技术转移的能力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衡量地方政府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和接受高新技术转移的机制。以科学新发现为源头的创新路线图涉及由大学的知识创新,到孵化高新技术,再到企业将高新

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创新阶段。孵化高新技术即科技创新的中游环节,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性环节,它是连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桥梁和纽带。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企业在这个阶段产生,就成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这表明外围地区与中心对接的最为有效的路径是推进由大学和外围地区的企业共同参与的产学研结合,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这就需要建设吸引新技术的载体。载体建设突出创新研发、技术转移、创业服务三大功能建设。利用载体整合和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园区资源,引进一批国际、国内一流的专业研发机构,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产学研合作产业基地或中试基地,搭建一批科技与产业创新对接平台,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创新园区、省(市)级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和省(市)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竞争力的空间载体。

首先是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基本方式是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包括各类研发机构)。外围地区吸引中心的创新成果进入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包括产学研共同参与的孵化器,以及公共性、公益性科技服务平台。包括大学和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实验室。平台可以建在大学,也可以建在企业,但平台建设的投资主体是企业。在平台上,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交互和互动成为制度性常态。各种创新要素向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环节,特别要求政府的引导性创新资金也重点投向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其次是建科技创新园区,包括大学科技园区。科技创新园区由各级政府建立。当年发展外向型经济,各类开发区是招商引资的载体,现在发展创新型经济,各类科技创新园区就成为招技引智的载体。吸引区域内外研究型大学进入园区建立大学研究院,落户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依托这些研究院和平台,科技园区不仅孵化新技术,同时还为创新的高新技术提供产业化的空间。如果说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新技术的孵化器,科技创新园区则是推

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加速器”。这样，对科技创新园区的评价不同于过去的工业区和开发区，不以引进多少外资、产出多少GDP为主要评价指标，而要以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评价创新园区。其中包括：创新机构（研发中心和创投公司）的集聚度，创新要素（人才、风投、科技服务）的集聚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孵化器的集聚度，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产出水平。过去开发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于“几通一平”的软硬环境建设，现在的创新园区则需要注意吸引创新要素（包括创新成果和创新创业人才）的环境建设，创造创新创业人才的宜居宜研环境，包括先进网络信息设施、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环境、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包括创新人才和项目的引导资金）等。

最后是建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外围与中心的对接，尤其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并实现产业化尤其需要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包括金融服务、软件服务、文化创意、科技服务。其中有两个服务最为重要。一是科技中介服务。创新成果到哪里去转化，所需的科技从哪里获得，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服务于创新中心和外围之间顺畅的科技中介服务，包括科技市场的建设。二是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创业需要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各级金融机构有足够大的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需要达到规模的活跃的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并需要推动创新企业及时上市的机制。

实践证明，外围地区与中心对接，从而成为创新型区域的地区除了上述对接措施外，还需要有内生的条件。只要满足以下企业、人和政府三个内生条件，就可以对接好创新中心，并且成为创新型区域的组成部分。

第一，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创新主体，不等于说所有企业都是能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就有创新的动力，就能够有效地吸引和整合各种创新资源，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最典型的是长三角的苏南地区，上海、南京乃至中科院的创新项目纷纷落地苏南，原因是苏南经过发展乡镇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洗礼，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非常突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有些禀赋科教资源丰富的地区，科

技成果转化率远远低于苏南，根本原因是这里缺乏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建设创新型区域，关键在于培育创新型企业。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高低关键是企业有没有强有力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而培育创新型企业，关键在培育科技企业家。作为科技企业家不仅要有一般的企业家精神，还需要有科学家的视野。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创新型经济，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投资是第一投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世界上所有创新型区域都紧靠研究型大学，原因是此范围内人力资本丰富。因此外围地区与创新中心的对接，最为重要的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外围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现在长三角区域在接受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创新水平存在的地区差距，差就差在不同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学习能力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外围同中心的对接，关键是在创新投资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度，提高全区域的学习能力。外围地区不仅需要培育科技企业家，还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涌现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在这里需要改变在发展中地区流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之说。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了。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在要素驱动增长阶段，要素跟着资本走，因此引进发展要素以引进外资为主。现在要创新驱动。各种创新要素跟着创新人才走。引进创新要素着力点是引进高端科技和创新人才。

第三，建设创新型政府。外围地区与创新中心对接，各级地方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政府的创新归结为营造法治化的创新环境，主要涉及三点，一是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建设跨行政区域的高新技术转化基地进行制度创新。包括建立推动和激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实现两者有效衔接和协同的制度。政府引导，建立大学科技园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机制，建立技术交易和流动的市场和平台。顺畅的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扩散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政策创新，制定和落实一系列鼓励

创新的财税、人才流动、技术市场、技术奖励、技术标准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从而形成对创新活动的强大的、系统性激励。特别是跨行政区域的推动创新技术的顺畅流动及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创新收益分配政策。三是文化创新,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及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文化。

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容很多,但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建设长三角创新型区域应该成为其具有领头作用的内容。长三角包括三省一市,将这么大的区域建设成为创新型区域,那就可以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型区域,对整个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注释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32页。
- ② 此处参考洪银兴等著:《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中安同良执笔部分。人民出版社,2015,第30页。

参考文献

- [1] 罗志军,洪银兴主编.基于科教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南京模式[M].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 [2] 徐南平,洪银兴,刘志彪主编.创新型省份建设与江苏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 洪银兴,等.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ONG Yinxing

Abstrac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achieve perfectly integr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s requir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era standards. That includes regional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strengthened innovation value of the core areas, effective links between innovation centers and their external units, and innovation chains deployed around industrial chains. The innovation regions should be assessed in three respects: output, investment, and institution. An innovation region contains a certain number of innovation cities which radiate innovation output and facilitate innovation region construction. Those cities are concentrations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output, and paradigms for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of surrounding areas. Rich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one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cities. Their momentum comes from highly concentrated first-notch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innovation talent, extensively distribu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integrate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mong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An innovation region includes multiple innovation cities and their satellite areas. Links between the satellite areas and their innovation centers are functional when the innovation cities actively radiate technologies to the former, which is the major momentum of innovation region construction. To become part of the innovation region, the satellite areas need to acquire high technology radiated from the centers, by buil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industrial parks, and complete service system. There are three endogenous conditions. One, enterprises become the subj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w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s increased. Three, innovation-oriented government is in place.

Key words: region; innovation system;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文化交流探析

陈美华 肖明慧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有着深远的意义。作为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使命。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影视文化产业这一角度,分析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和我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折扣;影视文化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3-0060-09

一、影视作品传播在“一带一路”中的纽带作用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的发展以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为基础,而民心相通的根本路径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互鉴。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文化交往”作为“民心相通”的重中之重,并使之进一步成为加速“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途径。文件指出,要在“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

作”。这无疑为我国以及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指明了一个清晰方向。如何把握文化交流的历史契机,推进沿线各国的文化传播与建设,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影视文化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软实力支柱^[1],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把影视文化传播融入倡议整体布局,找到属于影视文化产业新的传播路径,处理好影视作品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关系,是当下亟待研究的问题。中国以及沿线国家的优秀影视作品能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蓬勃发展,沿线区域文化交流合作能否顺利平稳进行,也是影视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政治背景不同,使得各国、各地区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在影视文化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受到各国受众价值取向、消费习惯以及接受心态的影响,影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外语规划研究”(15BYY048)

作者简介:陈美华,女,江苏泰州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肖明慧,女,江苏苏州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化作品的传播难免面临着考验。如何降低影视文化传播过程的“文化折扣”，以及如何减少“文化折扣”在文化贸易上的影响^[2]是首要挑战。解决好“文化折扣”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影视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巨大潜力，以更好地展现影视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纽带作用。

二、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折扣”指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多样，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从而导致其自身价值的降低。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将“文化折扣”进一步引入到影视文化贸易上来，并提出“文化折扣”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影视产品，基于受众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由于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文化吸引力在其他地方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现象^[3]。这种吸引力的下降从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对受众的接受程度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效益产生直接的影响。

由此看来，“文化折扣”概念最早运用在影视文化领域，这足以说明影视文化产品的先驱性和代表性。作为最具国际化特征的文化产品类型，影视文化绝不能忽视“文化折扣”对其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影响。我国影视文化资源，例如电影、电视剧与纪录片等，在出口到海外时，虽然在审查制度上经过文化、宗教、历史等层面的排查与配音、字幕翻译的校对工作，但依然不能排除“文化折扣”的影响。语言、受众偏好及审美预期、信息解读的复杂性^[4]等方面的隔阂，是不能通过上述排查解决的，这种隔阂，便使得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文化折扣”程度很高，面临着传播范围狭窄以及接受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

影视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上述难题均会导致“文化折扣”，这也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化道路上所必然面对的“拦路虎”。所以，我国电影要“走出去”，就要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从当下对未来的发展路径做出透彻的思考，对我国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经济体，其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速度快，对新兴文化接受程度高。这些国家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也极具潜力。全球影视文化产业增速最快的中国，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与层层改革创新，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建立影视文化产业网，力求为全球的影视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本研究以电影行业为例，通过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的电影市场情况，对其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产品在我国市场情况

自“一带一路”理念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影视文化产业交流范围持续扩大，合作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展，合作成就颇为显著。2014年7月3日，我国与韩国正式签署了《中韩电影合拍协议》^[5]，双方均提出互惠互利的影视文化发展政策，最大限度地为两国电影业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又与俄罗斯签署了电影合作协议，并举办了“2016—2017年中俄媒体交流年”“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年”^[6]等活动，确立了上百个影视文化的合作项目。近年来，俄罗斯电影逐步走入我国市场，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随着电影合拍协议的确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确立的相关影片立项数量颇丰，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合拍影片有中印合作的《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大闹天竺》，中泰合拍的《索命暹罗之按摩师》，中越合拍的《越来越囧》等一系列影片。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片引入数量情况来看，如图1所示，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我国院线上映的电影数量上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除2017年引进数量略微下降,其余年份的影片引进稳中有升,2018、2019年更是实现了倍数的增长。从艺恩电影智库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院线电影放映场次从113.58万次增至635.72万次,上升趋势明

显,由此可见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影片引入抱有很高的市场期望,并且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上映量的显著提升,直观反映了电影合作协议的成功推进,也给沿线各国的电影引进创造了进一步扩大引进和交流的基础。



图1 201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引进情况

“一带一路”沿线引进影片的来源国家非常广泛,包括俄罗斯、印度、韩国、泰国、南非、马来西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新加坡、奥地利、智利、老挝、土耳其、乌克兰、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伊朗、黎巴嫩共19个沿线国家,其中从俄罗斯引进的影片数量最多,从2013年以来共引进了26部;印度其次,为24部;韩国第三,20部。其余国家共引入了15部。影片来源国以亚洲、欧洲沿线国家为主,少部分来自美洲以及非洲国家。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印度影视业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取得了成功,由此成为仅次于好莱坞的具有影响力的

电影品牌。印度电影在其国内外的表现都非常引人注目。在印度,本土电影的院线占比90%,而海外的影片引入仅仅占10%,很难与印度本土电影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成绩也十分夺目,部分影片的海外票房成绩甚至超过了本土票房,譬如在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我国上映,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各大院线掀起了印度电影“观影潮”。笔者收集了从2017年伊始到2019年上半年我国内地从印度引进的电影信息,从中选取了相对热门的11部影片,并对这些电影的上映日期、票房、影片市场、豆瓣评分来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2017—2019年印度电影引进情况

片名	上映日期		票房(元)		电影时长(分钟)	
	中国内地	印度	中国内地	印度	中国内地	印度
《摔跤吧!爸爸》	2017/05/05	2016/12/23	12.99亿	4.15亿	140	169
《神秘巨星》	2018/01/19	2017/10/18	7.47亿	7580万	150	150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2018/03/02	2015/07/17	2.86亿	3亿	141	163
《起跑线》	2018/04/04	2017/05/19	1.42亿	750万	132	133
《巴霍巴利王2: 终结》	2018/05/04	2017/04/28	7684万	6.63亿	141	167

续表

片名	上映日期		票房(元)		电影时长(分钟)	
	中国内地	印度	中国内地	印度	中国内地	印度
《厕所英雄》	2018/06/08	2017/08/11	9461万	9334万	150	155
《印度合伙人》	2018/12/14	2018/01/26	6755万	9408万	135	140
《印度暴徒》	2018/12/28	2018/11/08	6194万	1.6亿	121	164
《调音师》	2019/04/03	2018/10/05	3.25亿	9901万	137	139
《一个母亲的复仇》	2019/05/10	2017/07/07	1.13亿	1700万	146	147
《无所不能》	2019/06/05	2017/01/25	3543万	1.12亿	133	138

从上映时间来看,引进电影在我国内地院线上映的时间比在印度国内上映时间晚了很多,除《印度暴徒》外,其余电影在我国内地上映日期均推迟了半年、一年左右。口碑电影《摔跤吧!爸爸》是在印度上映半年后才引进到国内,《一个母亲的复仇》更是在印度上映将近两年后才引入到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电影严格的引进审查制度,但也延缓了一些口碑极佳、反响热烈的好电影进入我国市场的时间,不利于新电影的前期市场盈利。

从票房成绩来看,引进电影在印度与在我国内地进行比较后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印度票房很高,在我国内地票房表现也极佳的电影,这类电影的代表是《摔跤吧!爸爸》,在印度票房总额为4.15亿元,在我国内地总共收获了12.99亿票房。该片凭借极具吸引力的剧情成为火爆我国内地市场的影片,票房成绩也一路走高,在上映首周就超越了同期上映的美国漫威大片《银河护卫队2》,并且创下了单日票房九连冠的历史,这也是非好莱坞引进影片的最高纪录。

第二类影片的特点是在印度本土反响一般,但在我国上映后成绩极佳。这类影片的代表有《神秘巨星》以及《调音师》,其在我国的票房总额分别是印度本土票房的近10倍和3倍。《神秘巨星》励志喜剧的题材对于印度观众来说略显平庸,但在出口到我国时却产生迥异的效果,这也说明了我国观众对外来文化的新奇态度。在《摔跤吧!爸爸》中担任男主角的阿米尔·汗再次出演《神秘巨星》的男

主,对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来说,阿米尔·汗就代表了印度电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许多观众对电影的好感与期待。《调音师》在我国内地电影市场获得一致好评,除了本身精彩的悬疑剧情外,该片以其自由、开放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影迷的关注,其票房成绩十分显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类影片是在印度本土大获好评,但在我国内地却反响一般。这类影片有《巴霍巴利王2:终结》和《印度暴徒》,前者在印度票房近7亿,却在我国内地院线遭遇“水土不服”,以不到8000万的成绩惨淡收场。《巴霍巴利王2:终结》拥有浓郁的印度文化,因此印度观众很有共鸣。但在我国上映一周便受到一些网友和观众的质疑,认为该片剧情天马行空,“内容看不懂”,口碑下滑。我国观众对于影片中的印度民族意识、宗教史诗背景所知甚少,使得观众只得其表而无法深入共鸣,影片的输出效果也大打折扣。另外一部影片《印度暴徒》,与之前在我国内地上映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起跑线》等影片相比,观众看到的印度引进片在题材上的“套路”已经有些千篇一律,导致审美疲劳,再加上影片自身尴尬的特效和质量平平的剧情,让这部引进片在我国院线吃了“闭门羹”。

从电影时长来看,引进电影普遍存在被删减的情况。在这11部影片中,除《神秘巨星》外,其余影片都或多或少缩减了时长,原片长超过150分钟的影片都被压缩在了150分钟以下,其中《摔跤吧!爸爸》的缩减时长甚至达到了29分钟。

超长的影片时长和低廉的票价是印度电影的标配^[7],但这种特点却并不适合我国院线的口味。我国院线播放的中国影片时长基本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众所周知的“超长叙事”漫威电影系列影片的时长也普遍在150分钟左右,很少出现超过三小时的电影。时长的缩减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影视市场,但内容上的删减也会影响观众对整体电影的观感,导致一些情节衔接上的不连贯,使得观众不理解前后剧情的关联,这不仅影响到影片整体的播放效果,也直接影响了影片的口碑及上座率。

通过对引入的印度电影的特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由印度引入的优秀电影为数不少,这些取得优异票房表现的影片有一些共性特点,比如

在制作水准上十分精良,内容上不落俗套、贴近生活,故事情节真实感人,体现了商业和艺术价值的平衡。现如今印度影片已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视来源的重要分支,对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国应继续引入优秀印度电影作品,增强与印度影视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学习与借鉴印度通过影视作品来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成功经验。

(二) 我国电影在内地与海外市场情况对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上实现了稳步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却无法在海外票房上有所突破,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2013—2019年,中国电影内地及海外票房统计^[8](部分数据无法获得)

	中国电影内地票房(亿元)	中国电影海外票房(亿元)	海外票房占比
2013年	127.67	14.14	11.08%
2014年	161.55	18.7	11.58%
2015年	271.36	27.7	10.2%
2016年	287.47	38.26	13.3%
2017年	301.04	42.53	14.12%
2018年	609.76	—	—
2019年	641.49	—	—

从表2统计的数据来看,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在内地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13年到2015年票房实现了翻倍,2017年的票房成绩是2013年的近三倍,到了2019年则相当于2013年的五倍,增速迅猛。海外的票房成绩相对来说逊色不少,虽然近年来的海外票房逐年上升,但从占比上来看,增幅没有显著提升,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国家电影局没有公布国产电影在2018、2019年取得的海外票房成绩,但从几部热门大片和周边市场的表现来看,情况不容乐观。2018年内地电影票房亚军《唐人街探案2》在北美票房总额约为人民币1340万元,不敌其在内地票房的百分之一,而这已经是2018年我国内地影片在海外场所取得的最好成绩,由此可见内

地与海外票房相差悬殊,海外市场还亟待开发。内地和海外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不禁反思,我国电影何时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市场?

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传播和接受效果》调查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电影总体接受程度不佳,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不感兴趣。我国内地电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以及传播情况欠佳。笔者选取了从2016至2019年在我国内地票房前8位的电影,从票房、海外上映国家以及豆瓣、烂番茄^①评分这几个角度,对我国电影在内地与海外市场情况做出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我国内地票房前8位影片的海内外市场情况

片名	票房（元）		海外上映国家及地区	评分	
	国内	海外		豆瓣	烂番茄新鲜度
《战狼2》	56.85亿	1.1亿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阿联酋	7.1	69%
《哪吒之魔童降世》	50.14亿	7700万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越南	8.5	88%
《流浪地球》	46.88亿	5961万	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	7.9	71%
《红海行动》	36.51亿	2231万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	8.3	80%
《唐人街探案2》	33.98亿	1781万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	6.7	54%
《美人鱼》	33.93亿	1.7亿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	6.7	95%
《我和我的祖国》	31.71亿	800万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	7.8	—
《我不是药神》	30.99亿	4.3万	美国	9.0	86%

从票房成绩来看，我国内地电影票房排名第一的《战狼2》内地票房总额达56.85亿元，创历史新高。改编自神话故事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收获了超50亿元的票房。而这两部影片的海外票房仅为内地票房的2%左右，对比非常悬殊。

《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在我国上映后好评如潮，出口到海外时口碑则一度走低。《红海行动》是我国用好莱坞战争大片的方式讲述爱国主义情怀的影片，但海外受众尤其是美国观众对好莱坞式的动作特效已经审美疲劳，观影热情较低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唐人街探案2》，有外媒评价其“粗糙的幽默感、生硬的情节和快餐式的节奏”不能让观众买账，这表明影片不过硬的质量无法吸引海外观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上映首天就火遍大街小巷的《我不是药神》，该片几乎没有在除美国以外的海外地区上映，但这也不影响该片在海外火爆的口碑。印度、英国、美国的各大影评机构和报纸都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海外评论家称之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认为其朴实的台词和揭露现实的剧情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让人不禁设身处地地进入角色，感受面对生死时的无奈。这也体现了深刻的主题与打动人心的剧情对于观众来说才是最吸引人的。

从这几部电影的海外上映地区来看，我国的“爆款级”口碑电影出口海外基本上都面向英语国

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却几乎很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映。从这几部影片的上映情况来看，我国热门电影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映的国家基本分布在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越南。根据Box Office Mojo^②数据统计，在国内揽收超30亿元票房的《美人鱼》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院线上映的票房总额分别达到79万美元和195万美元，打破了当地的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实属罕见。这应当归功于东南亚与我国相近的风俗习惯以及观念认知。另一“爆款”电影《战狼2》却并未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映，这也说明影片中如果包含太多产地国文化色彩的元素，如《战狼2》中的爱国主义相关内容，由于一定的文化差异，海外观众的接受态度自然不一样，即便出口海外也难免出现观众不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等一系列问题。

内地观众与海外观众对于我国影片的整体评价也值得关注。将豆瓣网和烂番茄网站上搜集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我国与海外观众的打分结果基本相似，豆瓣评分偏高的影片相对应的烂番茄新鲜度也偏高，反之亦然。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豆瓣评分为8.5，相对应的烂番茄新鲜度也达到了88%，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的观众都无一例外赞赏了该动画电影精致的画面和通俗易懂的幽默笑点，这也是其豆瓣评分和烂番茄新鲜度很高的主要原因。2.部分影片在内地与海外获得的口

碑不一,有些影片在内地豆瓣评分一般,但烂番茄指数却很高。著名电影人周星驰的作品《美人鱼》的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其国内豆瓣评分较低,有观众批评影片没有内涵,也有观众不理解其无厘头的笑点和粗糙的特效。但《美人鱼》在国外上映却没有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海外观众对其评价很高,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5%,综合评论网站Metacritic上的八篇评论都打出了75分以上的成绩。这部科幻喜剧对生态保护主题的抓取,是打破文化壁垒的金钥匙。环境破坏、生态危机、底层生存等现实主义主题,是全世界各种文化都能较好接受的,因而该影片在顺畅的文化传播基础上获得了良好的海外票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人鱼》影片中所包含的价值观通俗易懂,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不多,更容易被海外观众所接受;《我不是药神》影片有关医疗健康的话题与精彩感人的故事情节,打动了不少海外观众。诸如此类的影片构建了全世界情感共鸣的故事情节,不需要观众具备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和风俗习惯,如此才能有效避免“文化折扣”的负面影响。在影片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寻找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共性和创作的契合点,尽力扩大影片的潜在受众人群,用更为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来进行艺术的呈现与表达,才能唤起不同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认知体验。

四、多举并进推动“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产业合作与发展

(一) 克服“水土不服”,实现影视文化内容上的创新

无论是印度引进的部分电影到内地遭遇“水土不服”,还是我国部分电影出口海外票房不理想,这都说明“文化折扣”的巨大影响。在引进与出口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影视文化总会面临文化折扣的问题,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有效降低文化折扣,首先需要找到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文化心理上的接近。例如可以通过融入他国元素、加入全球议题来提高自

身吸引力。《流浪地球》所构建的国际视角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影片里的“联合政府”汇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在地球各地建造上万座行星发动机,让观众感受到了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也自然而然得到了海外观众的青睐。我国电影成功“走出去”更要放眼世界,要选择国际化的题材和叙述方式^[9]讲述海外观众能够看得懂的中国故事。

此外,应注重影视文化作品自身质量的打磨。优质精良的内容才是一个好作品的核心,也是后续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一个作品需要考虑故事情节的设置、角色安排、拍摄手法、后期剪辑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此外,题材选取是否真实自然,是否能引起观众情感共鸣,后期的生产制作、宣传营销是否到位,这些细节都需要通盘考虑周全。想要在国际市场上讲好中国故事,让海外市场看到我们的特色,我们必须从自身的内容上进行精炼与完善,创造出彰显我国特色的影视文化品牌。

我国影视作品也要注意总结海外发展经验,了解不同国家及地区受众对内容的偏好。譬如东南亚沿线国家的观众大多喜欢喜剧、爱情类的题材,《美人鱼》在越南、马来西亚的火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东欧的观众则更欣赏具有艺术观赏价值的影片。不同性别、年龄层次的观众对内容的喜好也不尽相同。了解不同受众的审美,把握其审美喜好,才能更好地打开市场,促进影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二) 加快审查速度,全面拓展影视文化传播渠道

缓慢的审批速度,是阻碍海外优秀影视作品进入我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电影审查为例,我国对引进影片审查时间较长,对其内容主题上的筛查十分严格,有些海外影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上映,但实际上这些影片所讲述的主题与内容不一定就无法为我国观众所欣赏。我国电影相关审查部门应该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适当放宽引进准入标准,以国际化的视角包容海外影视作品的多样性。

在传播渠道方面,有关部门可将审批权限下放到各大视频网站,促进网络视频平台和电影院线的合作与建设,鼓励民间合理上传国内外优秀影视作

品,实现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播交流。作为我国国内知名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目前播放量前几名的影视剪辑片段多是有关美国漫威的主题,其视频点击量极大,这些片段均又通过个人剪辑与上传,使得广大网民们接触到漫威系列所包含的超级英雄的相关娱乐内容。民间的各大视频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政府应鼓励民间在不侵犯原版版权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的视频剪辑与上传,充分发挥各大视频网站平台的作用,汇集民间智慧,促进影视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三) 发展多语教育,开展民间影视文化作品交流活动

“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海外优秀影视作品的翻译与我国影视文化作品对外译制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影视译制行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影视作品翻译标准规范,在行业内广泛推广。我国拥有多所外语类高等院校,其他高校中也大都设有多语种专业和语言学专业^[10],应该加紧多语人才的培养,尝试将更多语种国家的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引入课堂,并开展相应的影视剧文化、国别意识形态等学术研究^[11],有利于培养出精通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专家,为进一步开展影视文化交流合作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此外,我国应重视民间影视文化作品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政府间的国际电影周、电影节活动频繁开展,这些官方的影视文化交流活动的确在国家层面实现了文化交流与合作,但效果不尽人意。北京师范大学提供的中国电影海外观众调研数据表明,半数以上的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知之甚少,中国导演与演员在国外认知度不高。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发挥民间力量,在合法前提下,鼓励民间创作、开展百姓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政府间官方的影视文化交流所不同的是,民间的交流活动更为深入,来自民间的作品帮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社会、人文的各个方面,也帮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

五、结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的影视文化交流

收获颇丰,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交流合作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地减少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也需要不断探索、发展新的传播路径。在未来,“一带一路”理念下的各国影视文化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完善与创新,在各区域内实现文化包容,推动沿线国家影视文化产业的深入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注释

- ① 豆瓣评分是观众在观看影视剧后给予的评分的平均值,分数为十分制,分数越高代表该部作品质量越高,越受观众喜爱;烂番茄新鲜度指的是对一部影视作品的整体评价,分数为百分制,百分比越高代表该部作品受欢迎程度越高。
- ② Box Office Mojo是美国在线的电影票房数据统计网站,旨在通过分析、评论、采访和最全面的在线票房追踪这种艺术与商业结合的方式来介绍电影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秦莉,陆腊梅.大数据助力“一带一路”影视传播的路径[J].西部广播电视,2020(9):128-129.
- [2] 侯泽敏,李书慧,孙志国,王宪良.“文化折扣”对我国电影出口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2(44):18-19+42.
- [3] 梁君,汪慧敏,江畅.中国文化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折扣效应[J].社会科学,2020(1):29-37.
- [4] 邱燕妮.从文化折扣角度看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产品策略[J].中国经贸导刊,2012(8):53-54.
- [5] 佚名.中韩正式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EB/OL].(2014-07-04)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704/093020925.shtml>.
- [6] 童刚.新闻办举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情况发布会[EB/OL].(2017-05-11)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1/content_5192939.htm#2.
- [7] 张雷,王牧耕.影以为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电影交流及其启示借鉴[J].中国电影市场,2020(5):52-59.
- [8] 苏晓龙.“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电影海外成功对中国电影的启示[J].东南传播,2019(6):34-37.
- [9] 贾冀川.从《流浪地球》看中国电影“走出去”[J].群

言, 2019(3):29-31.

[11] 陈美华, 陈祥雨. “一带一路”背景下英语与非英语语种

[10] 陈美华, 陈祥雨. 新时期语言原籍鉴定 (LADO) 在外国人

教育问题探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5):738-743.

事务中的应用初探[J]. 中国外语, 2019(4):37-42.

An Analysis of Movie Cul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HEN Meihua XIAO Minghui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ignificant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ovie cultur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vie culture industry of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movie industries since the initiative was unveiled, and provides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discount; movie culture

从恐惧到言说：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无声告白》中人物的身份认知情感解读

李利敏

摘要：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2014）一经出版，就深受中国和美国读者及评论界的喜爱和关注。小说虽以莉迪亚的突然死亡展开，但其内容涉及种族、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女权、同性恋等多个主题。作者通过不断转换的内部视角，慢慢展示李一家每个人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痛苦的心理及情感活动。在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作品中的人物都体现出了民族性与跨国性，而伴随身份“杂糅”出现的异常凸显的认知矛盾——范畴身份上的美国人与实践身份中的中国人，即民族性与跨国性的矛盾——是导致小说中人物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中的跨国性主题，以及个人情感在身份认知与建构中如何从深陷身份恐惧、到全面反思恐惧原因、最终走向言说和解之路，为世界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以人类共同情感沟通为基础，消除各种不平等社会现状的有效途径；同时，本文试图从文学情感批评角度对世界主义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世界主义文学；身份认知；情感；恐惧；言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3-0069-09

伍绮诗（Celeste Ng，1980—）的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一经出版，就深受中国和美国读者及评论界的喜爱和关注。《无声告白》荣登2014年亚马逊最佳畅销书榜榜首，并获得马萨诸塞州图书奖、亚太裔美国文学奖等奖项，被十多家出版物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不仅如此，《无声告白》还入围多个其他奖项，如俄亥俄州图书奖、约翰·克雷西（新血）匕首奖、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卡贝尔小说奖等。小说的流行和受关注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一个老生常谈的美国华裔生活主题，本来读者群体就有限，其大受欢迎出

乎意料！然而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小说超越了传统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冲突，它的内容涉及种族、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女权、同性恋等多个方面，作者通过“内部视角”^[1]节制、冷静地展示李一家每个人在面对痛苦时的心理及情感活动，自然地唤起读者的共鸣。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开启通过人类情感唤起共情，以此来获得社会上不同群体人士的认同，最终拥有归属感的实践。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中的跨国性主题，以及个人情感对身份认知与建构的作用，试图从文学情感批评角度对世界主义文学研究和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戴维·洛奇小说的‘对话性’研究”（3102020WGYCX03）；西北工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特色《美国文学》课程混合式在线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2020JGY44）

作者简介：李利敏，女，河南汤阴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外语教学。

小说主要情节紧扣华裔教授詹姆斯·李（James Lee）一家在美国社会之命运展开。李一家是教科书式的模范少数族裔家庭的典型代表。爸爸詹姆斯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美国大学教授；妈妈玛丽琳（Marilyn）曾经在美国著名女子名校拉德克里夫学院物理专业就读，金发碧眼白皮肤；三个混血孩子——大儿子内斯（Nath）、二女儿莉迪亚（Lydia）和小女儿汉娜（Hannah）——也都健康、成绩优异并听话。不论之前的祖辈们如何辛苦，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成功跻身于社会中产阶级的行列。但是，这个看似成功的模范少数族裔家庭在认知和情感上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归属感，并实现他们想要的理想生活。这种看似幸福、平静的生活因二女儿莉迪亚的死亡而被打破。

小说出版以来，最受文学批评界关注的是小说中人物的身份问题。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通过自我建构对社会自我的认同，它主要是人在自我轴心上发展和实践的；同时也受到诸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外在社会差异轴线的影响。就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研究中的身份研究而言，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1. 聚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身份认同主题，主要探究作品中对母国的怀念、依恋和永恒想象；2. 讨论作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美国人双重身份在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冲突；3. 宣称美国人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华裔如何迎合宗主国价值和文化的等；4. 超越民族身份的跨国主义身份、杂糅身份建构，但在此过程中难免会遭遇身份缺失的风险；5. 从个人成长和个人经历入手，探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认知、精神和情感体验，这是从人类共同情感、审美出发，构建文学情感审美共同体的阶段。虽然以上划分有过度简化之嫌，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能管窥华裔美国文学的创作及批评走向。

近20年来，情感成为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的认知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也成为西方史学界新的研究热点。研究普遍认为“人类情感因其生物性特征而具有普遍性”，情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物”^[2]。有关身份的研究不能忽视人类主体的情感因素，而有关情感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多大

作用，会受到情感本身特性——即其社会性、认知性、建构性和普遍性——的影响。“吉尔伯特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肯定了情感的社会调节剂作用，指出社会地位、归属感和关爱关系到身份认同问题。”^[3]《无声告白》中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建构自我，但又都在社会、家庭等的环境下自我建构失败，他/她们都不认同并接纳自己。正如弗洛伊德的研究，他/她们的“自我不再是认同中心，而是一个承受矛盾冲突的心理界面”^[4]。目前对小说的研究有从心理学角度、创伤角度分析的，但具体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对世界/自身的认知和感受、以及由此外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未得到讨论。如果将身份建构问题仍置于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下讨论，恐难解决建构过程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追求构建人类共同情感和审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文学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一、世界主义文学与身份认知情感

歌德定义的“世界文学”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学共同生存的联合体”，是“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5]。歌德强调的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融合，最终达到共同审美体验的世界文学。这是基于文学文本内部运行规律的论断。进入21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为了应对西方比较文学危机，推出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长期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的主流是欧美文学比较，这在无形中就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而达姆罗什通过倡导研究被忽视国家作品，将各民族文学纳入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域下，以期达到对比较文学的重构，但其立足点仍是各民族文学的集合。

与之不同，“世界主义文学”是基于“世界主义”及“世界公民”衍生出来的。根据王宁^[6]的论述，“世界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超越民族主义、追求道德正义、普世人文关怀、处于流散状态、消解中心且主张多元文化认同……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等十种形式。最早的“世界公民”第欧根尼（Diogenes，前404—前323）或是为了逃避其流散身份抑或是寻求一种真正的超然状

态，之后的“世界公民”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的公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主义文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品中所具有的世界性或全球性的主题（包括政治、社会等问题），以及表达对这些主题和问题的态度和所使用的语言”^[7]。它强调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跨国家和跨民族性。二是指“书写或反映移民流散的生存状态和地位等的文学作品”^[8]。有关移民流散，这本身就是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也是一个牵涉面广、非常复杂的问题。由此牵涉到文化霸权、边缘化群体、“本土世界公民”^①“杂糅”^[9]文化身份等诸多议题。

如果说世界公民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等是世界主义文学中被认同的主流，“本土世界公民”强调并坚持捍卫其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的独立主体性；那“杂糅”身份的流散者呢？林萍认为“‘杂糅’身份蕴含了帝国再生产殖民主体的权利运作策略”^[10]。在此生产过程中，三方互作用共同建构了后殖民流散者的“杂糅”身份。首先是所处国家对流散者的社会硬性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社会规约及社区相处等；其次是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所处国家在此方面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种知识话语建构等；最后是个体将诸多因素吸收、内化后的自我身份建构。由于前两者强大的“意识形态语境”，个人的自我建构往往呈现出“自愿的、归顺的姿态”^[11]，也即在内心深处渴望成为被宗主国接受的本国人，为此他们主动抛弃其原有文化身份特征。但这仅仅是个人主观愿望，现实是宗主国并不接受“杂糅”身份者进入其国家。宗主国一方面通过强势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操控，让被殖民者主动认同并渴望融入其中；另一方面却因为其非我族类的身份特征将其无情关在门外。而消解的主要途径就是强化民族文化在自我身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强化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民族文化视野下的集体自我与个人自我的认知结合。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真正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最终消解意识形态与个人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建构具有“本土世界公民”身份特征的世界公民。

随着世界的变化发展，身份也由原来的本质

主义身份观逐渐演变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前者强调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受别人影响而建构的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后者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12]身份从原来的社会规约、被动被定义状态慢慢成为一个自我主体建构的概念。广义上，身份主要是指文化主体在强文化与弱文化之间的集体认同选择。这一明显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主体的焦虑、希望、痛苦和快乐的体验。个人主体总是受到文化主体的影响，但是，如果能够超越广义身份、关注个人认知与情感，以及它们在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个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我。

当今文学认知情感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对情感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他在《理解民族主义》（2009）一书中写道，“民族主义是根据一定地理区域并受某种政府统治下的一类人所组成的圈内身份认同”^[13]。这里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中，霍根首先提到的是“圈内人士认同”，这个圈子或者以地理疆域作为参考指标，或者以政府统治区域作为参考指标。而“圈子”在霍根看来本身就是强调情感上“认同感”的存在，在此定义下的“民族主义”就是以个人出发且联系个体身份存在、而非以政治结构为基础的。霍根所说的民族主义具有两个特征：1.它是复杂且等级化的非游牧民族社会，2.它遵守圈内/圈外人群认知和情感观念。

我们的思维决定我们总是会对差异关注度更高，弗里达（Frijda）曾说：“奇怪性本身驱动认知活动”^[14]。同时，人们也只有充分了解大的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够理解认知内容的差异性。主导差异性的原则有哪些，这就要从身份形成谈起。根据霍根的研究，身份有“实践身份”（practical identity）和“范畴身份”（categorical identity）之分^[15]。实践身份包含我们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它强调我们的能力、行为习性、兴趣、生活常规、概念、想法对思想行为的指引，它更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实践身份是在某一特定圈内群体

共享的身份，不同群体实践身份都不同。在实践身份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懂一个群体的语言自然会被划为圈外人士。范畴身份是我们将自己纳入哪类人群，即将自己置于圈内或圈外人士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固定群体成员身份确定是靠称谓、国籍、标签等形式，比如按照国别划分的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等。总之，范畴身份是将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群归为一类，范畴身份对于自我身份定义至关重要，在将自己划为具有某种范畴身份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属于某一圈内群体。实践身份与范畴身份之不统一、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时，一方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另一方。实践身份改变不会影响范畴身份，反之亦然。

研究表明，不同圈子的划分对圈子本身并无影响；但是在评价和具体行为中，圈内人士会对圈外人士表现出偏见。根据神经生物学研究结果，人们通常会通过“是否与自己相像”，即从面部相似度来判断他人是否与自己属于一个圈子。研究将行为、言语纳入认知身份建构的构成因素。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瓦赫特尔（Wachtel）认为人们属于哪个国家，“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任何客观身份标准，如使用相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遗产等，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认为他们是”^[16]。卡斯菲尔（Kasfir）认为有很多标准可以用来定义民族人群——“语言、疆域、社会结构、文化模式、行政划分，积极身份认同感”^[17]。上述标准，前面几个都属于实践身份的构成部分，只有积极身份认同感属于范畴身份部分，并且它是一个特定群体中最具有决定因素的政治行为。而圈内/圈外区分的范畴身份识别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也是高度动机化的。通常情况下，范畴身份识别会带有很强的利己主义成分。

国家、社区、学校都可视为一个团体或机构，它们对待少数族裔、特别是华裔的态度会再加工为华裔对自我的看法和感受，进而会影响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情感建构。当社会团体情感和个人自我情感狭路相逢，妥协的必然是弱势的个人，外在的表现形式会与社会团体情感看起来一致，但这是伪装或压制个人情感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共有的情感，如爱、依恋、同情心和信任，都是产生归

属感及同一群体认同的手段。同时，有权力的群体为了隔离其他人，也会在群体中有意识地培养反感与不信任的情绪。”^[18]因此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情感认知及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团体、机构、社区等共有情感的影响和压力。

二、《无声告白》中的世界主义文学美好愿景

小说开头与加缪《局外人》的开场白有些类似，“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19]开篇，作者伍绮诗就将读者、书中人物和叙事者置于大家都不知道莉迪亚死亡事实的“局外人”身份。《局外人》的开头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20]第一人称的“我”不知道妈妈去世的确切时间，而默尔索在妈妈葬礼上没有哭泣成为法官判处其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文本世界中的默尔索成为一个被法官、检察长、辩护律师等司法人员排除在外的局外人，那在《无声告白》的文本世界中，局外人的概念扩展到家庭成员内部，家人之间的互不敞开心扉。一家人由于彼此在乎、害怕失去反而成为局外人的心痛事实，让读者在惋惜之余，不禁深入思考为何家人之间会有如此之深的不安全感和爱之负担。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希望超越了国家性和民族性，构建了世界主义文学的主题之一。

故事发生在1957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各社会群体为获取诸种权利进行反抗、游行等。跨种族婚姻在当时的美国是极其罕见的社会现象，由白人女子与华裔男子组成的家庭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生活成为更加突兀的存在。小说采取现在、过去交替的叙事手法。小说第一章开篇记录了1977年5月3日，像任何往常的日子一样，李一家开始吃早餐。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最钟爱且引以为傲的二女儿莉迪亚已经死了，接着就是家人寻找莉迪亚的各种行为。第二章直指莉迪亚死亡的原因是其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期望及一切相关事情的不可完成性。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很多如“anything”“everything”“something”

“that” “those”^[21]等的含混表达，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不可言说，也凸显了要讨论的诸如华裔少数民族裔/华裔混血儿融入白人社会问题、女性解放问题、夫妻关系问题、个人创伤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子女争宠问题、父母与子女关系问题、个人社交问题、同性恋问题等的敏感性和棘手性。变换的叙事视角给读者呈现出每个人物的内心想法，在交织错乱、纷繁复杂的关系中让读者明白，小说题目中小写的“i”指的不仅是自杀的莉迪亚，还是李一家的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可言说的秘密和伤疤，犹如洋葱层层裹套一般，慢慢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在第一章陈述出莉迪亚死亡的事实后，第二章就直指其死亡背后可能的原因。小说将叙事从1977年拉回到1955年莉迪亚父母相识的那个秋天，开头直问：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如同所有事情：与父母有关。（1）因为莉迪亚的父亲和母亲。（2）因为莉迪亚母亲的父母和父亲的父母。（3）因为很久以前，莉迪亚的母亲失踪过，她的父亲把她带回家。（4）因为她的母亲觉得与众不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5）因为她的父亲觉得融入人群比任何事情都重要。（6）因为上述事情都不可能实现。（笔者译）^②

在这一段中，连续出现了六个“因为”，看似陈述死亡原因的并列句，在语法结构上、语义上却是并列（1）（2）、解释（3）、总结（4）（5）和转折（6）的关系。六个“因为”不仅道出了小说中出现的所有矛盾，也将小说的世界主义文学主题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1）句叙述了莉迪亚的死亡是因为她的父母。这是一句高度概括、同时又含糊不清的表达。读者无法清楚知道其父母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女儿走上不归路。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莉迪亚父母的跨种族婚姻。虽然小说将故事设定在美国各种社会运动高涨的20世纪70年代，但莉迪亚父母的婚姻则是在1958年，那时的跨种族婚姻在很多地方还是违法的，认为这是“丢掉种族自尊”的行为^[22]。事实上，美国反对异族通婚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有明文规定的《反异族通婚法》最早产生于1661年的

马里兰州，主要是禁止白人与黑人通婚。187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州法律修订案，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此后美国各州都有明文法令禁止异族通婚，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突破。1948年加州终结了《反异族通婚法》，此后各州民权人士经过近20年的运动，1967年6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弗吉尼亚州的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通婚的法令。然而正如叙述者所言，从法令的颁布到普通大众从内心认同跨种族婚姻还需很长的时间，并且有些人是永远也接受不了跨种族婚姻的。在此种社会大环境下，玛丽琳和詹姆斯的婚后生活不仅是孤立的，也让他们的理想变得难以实现。

在（2）中引出的话题是第一代华裔在美的生活，以及20世纪美国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要求。詹姆斯的父母是冒名顶替同乡死去的儿子来到美国的，其父亲的“纸儿子”身份在政治上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他们不会如美国公民那样要求民主、平等、人权等，他们是美国社会的隐身人。在此不安全感中长大的詹姆斯也希望自己越普通、越不被人注意越好，这种人为地将自己的性格、情感都隐藏的认知图式会慢慢让他走向忽视自我、最终失去自我的身份认知困境。可惜的是詹姆斯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拼命将自己的这套生存理念强行灌输给莉迪亚，让莉迪亚按照“大家”的穿着、服饰、行为方式塑造自我。与詹姆斯不同，莉迪亚的母亲玛丽琳行走于另一极端——极端的自我中心。受到母亲被父亲抛弃经历的刺激，玛丽琳潜意识里认为“母亲渺小、孤独的一生”^[23]就是被束缚于家庭之中造成的。因此对于当时美国学校教育中的训练女性做家务，能够“管理住宅”^[24]，要在吃饭前“用光鲜的皮肤和整洁的家居服取悦丈夫”^[25]，“一位好妻子，应该掌握蛋的六种基本烹饪方式”^[26]，玛丽琳是极为反感和反抗的。玛丽琳的反抗一方面是在为母亲的一生叫冤，更是对当时社会价值标准的谴责和质问。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完全按照社会价值规范行为的女性典范为何会被丈夫抛弃，为何度过如此孤独而又没有人在意的一生？因此，第（2）句中叙述的都是詹姆斯和玛丽琳从父母经历中获得的反思和经验——对自我情感/身份的刻意忽视和追求男女平等。

第（4）（5）句描述了母亲将追求“与众不同”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父亲将“融入人群”看作是高于“任何事情”的目标，莉迪亚死亡的原因进一步明晰。由于父母亲本身无幸福感和成就感，在此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从小不仅没有得到足够多母爱的滋养、父爱的支撑，更由于母亲突然的离家出走、父亲全然精神的坍塌带来无法治愈的伤痛、患得患失及特别强烈的不安全感。孩子们总是害怕被父母、兄弟姐妹抛弃，这种深深的焦虑感让他们建构出否定自我的身份认知。事实上，莉迪亚就将母亲出走、父亲几乎精神崩溃的情形都归因于自己表现不好。

最后一句“因为”道出上述所有期望的“不可能”。不管是父亲想要的“融入人群”，还是母亲想要的“与众不同”；也不管是莉迪亚父亲想让莉迪亚实现的与白人孩子打成一片，还是母亲期望的莉迪亚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医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不可能”道出了人人平等、种族平等、互相认同等在世界主义文学美好愿景中，人人渴望但却不能实现的残酷现实。

三、从恐惧到言说：世界主义文学视域下李一家的身份认知情感解读

恐惧、害怕是围绕在李一家上空的魔咒，这是典型的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外在表现。面对各自受到的创伤和伤害，一家人都表现出或逃避或伪装的解决方式。只有莉迪亚一人从正面直击问题核心，虽然最终未能战胜恐惧，但她的努力让一家人意识到需要修补的有那么多。首先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爸爸对自己华裔身份所表现出的恐惧。

他害怕告诉玛丽琳这些事情，害怕一旦他承认了，她就会像他一直以来看待自己那样看待他：一个骨瘦如柴的被社会排斥之人，靠剩饭养大，只会背诵和尽力通过考试。一个骗子。他害怕她一旦形成这个看法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了。^③（笔者译）

这段话的三个“害怕”全面暴露了詹姆斯对自己的极端不自信，以及完全否定自我的深层原因。第一个“害怕”陈述的是詹姆斯害怕和恐惧玛丽琳

知道自己过往的经历。他父母冒名来美、他在劳埃德学院被捉弄孤立、一家人吃厨房里被扔掉的剩菜等都是詹姆斯不堪的过往。作为出生在美国的詹姆斯，其范畴身份就是美国人，他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踏入学校是詹姆斯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社会团体，在这一团体中，詹姆斯被捉弄、被孤立，才意识到其中国人的实践身份使得他与众不同。生物特征是一个社会群体区分圈内/圈外人士最直观的依据，詹姆斯不被团体接受的个人体验深深影响了他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之后的詹姆斯拼命地将一切具有美国性的东西附加在自己身上，如过圣诞节等美国节日、学习美国桥牌、研究牛仔文化、与美国人结婚等，只是希望能够获得圈内人士认可，成为一个在实践身份上被认可的美国人。

第二个“害怕”反映出社会文化环境对自我身份建构的巨大影响力。詹姆斯对自我的评价是“被社会排斥之人”、吃“剩饭”的、“只会背诵和考试”的“骗子”，这一方面是他对个人成长经历的总结概括，另一方面更是当时社会所刻画的刻板中国人形象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人对自我的评价与自身认知、情感、社会环境、历史等紧密相连。当一个人不断被孤立、被捉弄；当一个人不断在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书籍中看到上述对中国人标签化的描写时，他很难不将这些形象投射到自己身上，从而误以为这就是他。詹姆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最终建构出一个厌恶自己、完全否定自我的实践身份。

虽然詹姆斯完全否定自己，但他一直挣扎着试图得到圈内人士（美国人）的接纳和认可。在詹姆斯的个人认知中，玛丽琳向自己张开怀抱就是美国对自己的接纳，玛丽琳成为詹姆斯获得美国性的最大依仗，失去玛丽琳就意味着被整个美国抛弃，这是詹姆斯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殊不知这些仅仅是外在的附加物，詹姆斯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从内心深处建构一个自信、肯定自我的身份，以此来对抗所谓的社会歧视。相比而言，其女儿莉迪亚要更加勇敢。

从那个夏天开始，她就开始非常害怕——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后来，过了不久，她最大的恐惧出现了：失去内斯。^④（笔者译）

如何让所有事情重来一次，从头开始，这样她就再也不会害怕一个人了。^⑤（笔者译）

在小说最后，莉迪亚不断追问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为何自己如此沉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杰克的坦言让她发现，一切的根源是自己的“害怕”。玛丽琳的离家出走给家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当害怕被玛丽琳抛弃的恐惧变为现实，詹姆斯崩溃了。刚失去妈妈的内斯和莉迪亚惊慌失措、茫然无助；又突然面对爸爸的魂不守舍、痛苦自责；两个未成年孩子之前建构的家这一最具归属感的避风港瞬间坍塌，他们陷入深深的被父母抛弃的恐惧和无助中，这对他们后续的自我身份建构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幼小的莉迪亚将一家的离散归因为自己做得不好；内斯则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无垠的太空。因此，当玛丽琳回归家庭后，不管是莉迪亚主动迎合父母的所有期望，抑或内斯被动地假装不在乎父母对其的忽视和批评，还是詹姆斯对玛丽琳更加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都是一家人恐惧的外在表现。

对于莉迪亚而言，她短暂的一生是在越来越大的恐惧中度过的，这是莉迪亚一直没有意识到，却最终为了克服恐惧失去了她宝贵的生命。如果说当初妈妈的出走是莉迪亚经历的第一次恐惧，那接下来爸爸精神崩溃，整个家庭风雨飘摇就是让莉迪亚感到恐惧的第二件事情。为了不再陷入被父母抛弃的恐惧中，母亲回归后的莉迪亚拼命满足父母的期望与要求，而随着父母越来越高的要求，莉迪亚也越来越没有自我，越来越不快乐。因为她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也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达成的。在无助恐惧的时候，是她的哥哥内斯给了她安慰和温暖，让她卸下伪装，成为真正的自我。内斯的存在是莉迪亚自我身份建构中最核心的支撑物。随着内斯要去哈佛读书，莉迪亚内心的恐惧达到最高点。无助的莉迪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内斯的支撑物，然而杰克不仅拒绝她，还在争执中说出“至少我不会一直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至少我不害怕”^[27]这样的话语，最终让莉迪亚意识到没有自我的根源就在于害怕。

莉迪亚想到当初妈妈出走，她被内斯推入湖中，溺水时身体完全陷入黑暗的感觉与承载父母梦

想让她窒息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她能克服对水的恐惧，她就能克服不害怕一个人独立存在的恐惧，她就有勇气告诉父母她不想当医生，她要做她想做的事情。带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莉迪亚跳入湖中。

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以及以后的很多年，詹姆斯和玛丽琳说话时会选择真正能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措辞，无论是对内斯，对汉娜，还是互相之间。他们需要说的太多太多。^⑥（孙璐 2015：279）

虽然莉迪亚再也没能从湖里上来，但是在追问莉迪亚为何死的过程中，李一家意识到家人之间是多么的互相不了解。如果他们能够克服各自的恐惧，早些沟通，能够用语言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自认为不可言说的秘密，莉迪亚就不会离开他们。

四、结语

伍绮诗以一个跨种族家庭为切入点，借小说中不同人物之口，以独白式的话语叙述美籍华裔在美生活中构建自我身份时的经历和情感认知，言说少数族裔在美生活的精神压力和伤害，期待通过文学的渗透达到改造少数族裔生存空间的目的。身份的重要性绝不仅仅体现在虚构叙事作品中，在现实中有许多血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身份不同所带给个人及种族的灾难。因为身份差异、社会差异、文化差异、身体差异，强势群体总是对弱势群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无声告白》虽是从个人抗争层面讲述李一家的恐惧，以及由恐惧带来的沉默到最终的无声死亡；但小说中构建的积极沟通态势却意义重大。小说最终，全家人努力寻找合适语言正确表达自己情感；同时，小镇居民对李一家的关心，出席莉迪亚葬礼上表现的无声支持，都为目前日益紧张的文化、种族、国家冲突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言说、融合和沟通。世界主义文学正是在此契机下，不仅为我们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融合、超越之场所和空间，也为解决现实语境下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注释

- ① 屈维蒂在《东西方的世界主义:希腊、中国与印度》一文中,以印度作家作品为例,假设世界主义是一种观点、风格,并从作家生平经历及作品人物、情节、主题等的跨国特征入手分析世界公民,他认为可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区分为“世界公民”和“本土世界公民”,并最终讨论成为“印度世界公民”的可能性。
- ②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分析内容,原文如下:How had it begun? Like everything: with mothers and fathers. Because of Lydia's mother and father, because of her mother's and father's mothers and fathers. Because long ago, her mother had gone missing, and her father had brought her home. Because more than anything, her mother had wanted to stand out; because more than anything, her father had wanted to blend in. Because those things had been impossible. (Ng 2014:25)
- ③ 小说原文:He was afraid to tell Marilyn these things, afraid that once he admitted them, she would see him as he had always seen himself: a scrawny outcast, feeding on scraps, reciting his lines and trying to pass. An imposter. He was afraid she would never see him any other way. (Ng 2014:48)
- ④ 小说原文:Ever since that summer, she had been so afraid—of losing her mother, of losing her father. And, after a while, the biggest fear of all: of losing Nath. (Ng 2014:273)
- ⑤ 小说原文:How to start everything over again, from the beginning, so she would never again be afraid to be alone. (Ng 2014:275)
- ⑥ 小说原文:For the rest of the summer, and for years after that, they will grope for the words that say what they mean: to Nath, to Hannah, to each other. There is so much they need to say. (Ng 2014:282-283)

参考文献

- [1] Keen, Suzanne. Empathy and the Novel[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 赵涵.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J].史学理论研究, 2020(3):133.
- [3] 张秀丽.“斯图亚特神话”的建构与解体——论《威弗利》中的苏格兰情感共同体书写[J].外国语文研究, 2020(2):54.
- [4]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 2004(2):39.
- [5] 蒋承勇.“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J].文学评论, 2018(3):24.
- [6] 王宁.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J].中国比较文学, 2014(1):17.
- [7] 乔国强.试谈西方的“世界主义文学”[J].社会科学战线, 2018(2):174.
- [8] 乔国强.试谈西方的“世界主义文学”[J].社会科学战线, 2018(2):175.
- [9] 林萍.捆绑之误与认同之殇——拉什迪“世界主义”批判[J].外国文学评论, 2018(3):194-207.
- [10] 林萍.捆绑之误与认同之殇——拉什迪“世界主义”批判[J].外国文学评论, 2018(3):196.
- [11] 林萍.捆绑之误与认同之殇——拉什迪“世界主义”批判[J].外国文学评论, 2018(3):194-207.
- [12] 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11-215.
- [13] Hogan, Patrick Colm.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On Nar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Identity[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4.
- [14] Hogan, Patrick Colm.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On Nar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Identity[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7.
- [15] Hogan, Patrick Colm.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On Nar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Identity[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8.
- [16] Hogan, Patrick Colm.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On Nar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Identity[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35.
- [17] Hogan, Patrick Colm.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On Nar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Identity[M].

-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35.
- [18] 乌尔特·弗雷弗特. 书写情感的历史[J]. 世界历史, 2016(1):18.
- [19] 伍绮诗. 无声告白[M]. 孙璐, 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1.
- [20]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
- [21] Celeste Ng.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M]. London: Blackfriars, 2014.
- [22]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56.
- [23]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95.
- [24]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29.
- [25]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29.
- [26]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81.
- [27] 罗刚,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66.

From Fear to Tell: A Cognitive-Emo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in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Li Limin

Abstract: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Celeste Ng's debut novel published in 2014, was an instant hit to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readers and critics. It starts with the unexpected death of Lee family's beloved daughter Lydia, interweaving with many themes, such as race, family, marriag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m, homosexuality and so on. Through constantly changing internal perspectives, the author shows the painful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movements of the Lee family in the process of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embody the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the prominent cognitive conflicts in their "hybridity"—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 be American in the categorial identity and to be regarded as Chinese in the practical identity,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transnational nature—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family's trage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national theme in the novel, the emotive processes of each character in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deep fear to thorough reflection, and finally to tell and forgive. It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to eliminate all kinds of unequal social status on the basis of human emotion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motion criticism for the study of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identity cognition; emotion; fear; tell

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

郑佳宁

摘要: 用户行为信息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用户享受个性化服务、便捷消费所伴生的副产品,具有动态性、集聚性和敏感性三大特征。从现实适用来看,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沉淀用户行为信息、进行用户行为化定位、开展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方式,实现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考虑到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情境下存在客观的负外部性,有必要从保护用户的隐私空间、避免用户行为信息滥用、确保自动化决策公正性三方面入手,构建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从而保障用户权益不受损害,实现商业化运用的最佳效益。

关键词: 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隐私保护;信息滥用;自动化决策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78-07

云存储、大数据分析、无损压缩等新兴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商业社会无法记录、无法追踪的交易形式。现在只要连接到网络,就必然会留下“面包屑”,即用户行为信息。在如今的互联网2.0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网络。包括在线选购衣物、订购美食、预订酒店、预约出行等,从搜索到下单再到评价服务,每一步操作都可以线上完成。事实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价值已然凸显的大背景下,用户在利用网络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代价正是其行为痕迹不断地被采集、保存,继而被整合、分析,甚至可能因数据中间商的加入而流入市场。各大互联网企业倾向于开发利用其掌握的用户行为信息,以最大化实现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价值。在此过程中,难免引发侵犯用户个人隐私、滥用用户行为信息、自动化决策不公正等现实问题。由此可见,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在具有提高企业服务能力 and 价值收益上的正外部性的同时,还带有信息安全上

的负外部性,可能引发企业泄露用户信息、滥用用户信息的风险。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互联网企业实施的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行为进行规制,以最大程度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已然成为互联网用户和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的利益诉求。

一、用户行为信息的概念与特征

提到个人数据信息,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等可以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直接关联到特定自然人,因此能够轻易识别其身份。^[1]此类数据信息,可谓信息社会中的个人数字代号,只要掌握这个数字代号,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其对应的个体,故其对于维持个体人格独立、保障私人空间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除了此类可识别的个人数据信息,由个体的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数据财产私法规制体系的重塑研究”(19YJA820057);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18CXTD08)

作者简介: 郑佳宁,女,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法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能源财产、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法律规制。

网络行为而产生的另一类数据信息也逐渐开始备受关注。这些信息包括浏览网页而生成的历史记录, 注册网站或手机应用而生成的账号和密码, 使用购物网站进行消费而生成的消费记录, 使用手机地图或旅游应用而生成的位置和行踪信息, 以及安装智能家电时提供的电器配备信息和生活起居信息等多方面的内容。毫无疑问, 这些信息对应的是独立的个体, 但此时的个体不仅是具有一般民事主体身份的自然人, 同时还是网络活动的参与者, 是使用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用户。本文将记录了用户网络行为轨迹的信息统称为用户行为信息, 在概念层面与可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个人信息以作区分。

用户行为信息, 可以被定义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产品或者接受互联网服务的过程中, 因检索、浏览、下载网络信息资源等行为而产生的一系列信息。该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用户的知识需求度, 包括知识关注度和价值度两个层面的内容, 从而为互联网企业刻画用户数据画像提供直接且重要的数据支持。例如, 互联网企业可以利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统计分析用户对相关知识的评论、收藏、问答等隐性行为, 了解用户的关注重点和偏好, 从而建立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模型, 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如直接过滤与用户需求无关的信息, 为其推送与其需求相符的特定化信息; 又如, 依据用户需求程度的高低, 对推荐给用户的各类信息予以综合排序, 以提高用户接收信息的有效性。大体而言, 用户行为信息可以被划分为访问数据、检索数据、下载数据、评分数据等几类, 其来源渠道主要包括两种, 即由用户主动提供和在用户无意识状态下由企业的自动信息抓取工具采集生成。^[2]所谓由用户主动提供, 强调用户行为信息直接根据其线上行为生成, 譬如用户注册会员时填写的用户名、密码、感兴趣的内容等, 又如用户使用社交服务时主动发布的个人简介和地理定位, 亦包括用户使用媒体服务时发表的时事评论等。至于另一来源渠道则侧重于依靠企业通过cookie等工具, 跟踪、采集用户的线上行为而获取用户行为信息, 如用户输入的关键词和历史记录, 又如用户使用运动手环时被记录下的运动轨迹、作息時間、健康状况等信息。

用户行为信息的核心内容亦须围绕用户行为轨迹衍生, 实践中, 用户通过鼠标、键盘、手机、智能手环、语音识别设备、智能化触控设备等信息输入设备访问网页或其他界面, 或者通过诸如点击链接、滑动浏览、输入信息、搜索关键词、发表评论、上传图片、提供定位、在线交易、下达指令、个性化设置等具体行为, 均可生成用户行为信息。与个人信息相较而言, 用户行为信息具有动态性、集聚性和敏感性三大特征, 具体如下:

第一, 用户行为信息具有动态性。用户行为信息不同于姓名、证件号码等一成不变的个人信息, 具有较强的动态性的物理特征。这是因为,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的内心思想在不断变化, 其表现出来的外部行为也随之产生变化。可见, 用户行为信息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时效, 即用户行为信息的更新速度直接关系到其商业价值, 由于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活动, 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也必然如此, 互联网企业只有持续收集用户行为信息, 方能实现商业用途。

第二, 用户行为信息具有集聚性。用户行为信息的数量非常可观, 完全可以称为“大数据”。即使单条行为信息仅能反映部分行为片段, 但当海量的用户行为信息聚集起来, 借助云存储、大数据计算等新兴技术, 就可以有效挖掘出特定用户与相应用户群体的诸多行为特征, 其具有的商业价值也随之大幅提升。用户行为信息商业价值的实现并非一劳永逸, 历史信息具有比对分析的重要意义, 互联网企业往往会长期保存用户的初期行为轨迹, 不断累积信息的商业价值。

第三, 用户行为信息具有敏感性。用户行为信息对于自然人的人格而言, 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互联网企业可以利用其掌握的用户行为信息绘制出一个反映用户行为偏好、性格特征甚至心理特质的“内在人格”。事实上, 对用户进行数据造像, 正是复刻用户的内在人格。无论用户行为信息能否准确识别用户的真实身份, 这些行为信息已足以感知用户的内心想法。^[3]因此, 即使单一的用户行为信息并不与宗教、民族等个人信息具有同等敏感度, 但基于此绘制出的个体“内在人格”画像, 已经足以反映出用户并不想表露于外的敏感信息, 因此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特征。

二、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及风险

互联网浪潮下各大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愈演愈烈，用户行为信息的巨大商业价值也开始备受关注。为充分挖掘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价值，各大互联网企业力求详细地记录用户的行为细节，并以数据化的形式使其具象化。用户行为信息在互联网商业活动中的普遍化运用，正是大数据时代下高新技术改造商业形态的一大例证。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虽然采集、储存和处理用户行为信息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但推进商业化运用所带来的收益亦蔚为可观。在巨额收益的驱使下，建立用户行为信息档案库^①已经成为各大互联网企业秘而不宣的通用规则。在实践中，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第一，沉淀用户行为信息，优化用户体验。用户行为信息的沉淀主要体现为互联网企业总是能够自动记忆用户的历史消费选择，并为所有用户保留其个性化的设置。例如，再次登录同一网站或打开同一手机APP时，用户不再需要重复输入复杂的账户名和密码；浏览网页时点击查看交易过的历史订单，甚至是浏览过、收藏过或放入购物车预备交易的商品，不会因为退出登陆而无法得见；点餐平台上所购买的餐品或提交的评价，可以在事后再次查看等。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推论，即用户行为信息的点滴积累使得网络的记忆远远强过了用户的记忆，且此种网络记忆还会伴随用户行为信息的持续累积而不断更新，充分掌握用户行为信息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可能要比用户更了解自己。在此推论上，互联网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优化自身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商务运营效益，以获取行业竞争优势地位；用户则能够拥有更优质的互联网服务体验，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提升交易效率。

第二，进行用户行为化定位，提供定制化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互联网企业在累积了足量的用户行为信息后，即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等数据挖掘工具，提取并汇总涉及用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生活需求、选择偏好等各项特征，以构建一个崭新且完整的消费者数据画像。这一画像的终

极目标，是以类似360度全方位镜像反射的方式，对用户性格和生命进行数据塑像。^[4]掌握着这样的用户数据画像，互联网企业就可以将用户按照需求、偏好、购买力等消费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区别化、定制化的产品或服务。由此，用户所浏览的网页终端或手机客户端，将逐渐仅显示互联网企业基于对用户行为信息的分析，认为用户会感兴趣或是希望接收到的内容。例如，电商网站根据用户搜索、浏览、点击、交易等相关行为信息不断调整客户端首页推荐的产品类目和搜索结果的排序方式；餐饮类APP通过用户的定位、订餐时间、订单内容等历史行为信息，在不同就餐时段向用户展示符合其口味且处于其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的餐厅；新媒体网站根据用户的定位、可浏览的时间和兴趣领域，就推荐内容做出相应的安排与调整；社交网络服务提供商则基于其对用户行为信息的分析结果，为用户推荐其可能认识的人、感兴趣的人或相关公众号。

第三，开展个性化广告推荐，提升经营效益。如何将广告推送给真正具有消费需求，且拥有购买能力的客户，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促成交易，是广告学上有待解决的核心命题之一。由于缺失对个体消费者的全面了解，传统的广告投送模式往往只能以数量取胜，即通过漫无目的的“广而告之”模式，提升交易成功率。但此种广告投送模式存在成本高、准确率低等弊端，投放广告的效益难以得到保障。用户行为信息定位广告的出现，将广告向消费的转化率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企业能够利用算法技术对海量的用户行为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判断用户的消费需求、选择偏好甚至购买力，进而基于产品特性向潜在的客户投送符合其需求、偏好和能力的定向广告。^[5]精准的广告投送，能够完美消除产品和服务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由此大幅减少生产商、经销商的销售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对于用户而言，接收符合其行为爱好分析结果的广告，亦提高了获得所需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降低了用户的选择成本。

在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过程中，须警惕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和互联网企业不当行为所带来的系列风险。具体而言，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

风险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点, 未来法规规制的思维亦应当由此切入。

首先, 用户隐私空间遭受侵犯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下的用户行为信息挖掘, 已经使得用户行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正如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的Andrew J. McClurg教授所言, 数据挖掘所取得的成果已经等同于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完整的相片式记录, 这与有人整天拿着相机随时摄录你的生活简直别无二致^[6]。海量集聚的用户行为信息在经充分挖掘后刻画出的立体数据人像与自然人具有极其类似的性格特质, 即使互联网企业只能将该数据人像连接到特定智能设备, 从而针对用户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 也会使用户感受到隐私被窥探, 并引发不安。因为用户行为信息与自然人真实身份之间由可识别性构筑的界限并不具有绝对性, 在用户行为信息充足, 或者有其他的外部可识别性信息加以辅助的情形下, 可以准确识别自然人的真实身份。正是由于用户行为信息与自然人真实身份间的连接具有现实可行性, 所以互联网企业通过用户行为信息侵蚀用户隐私空间成为可能。因此, 有必要对互联网企业采集、处理、共享用户行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以保障用户隐私空间的安全性。

其次, 用户行为信息遭到滥用的风险。在运用领域上, 滥用用户行为信息主要指互联网企业将用户行为信息用于政治、舆论引导等非商业领域, 背离了其采集用户行为信息的初衷。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 一家英国数据分析公司不当利用从Facebook获取的近8700万用户的个人资料以提升政治性广告投放的精准度, 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荐候选人的相关信息, 从而影响选举结果。^②在运用方式上, 滥用用户行为信息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企业直接买卖用户信息以实现营利目标。通过直接买卖用户行为信息获利的行为, 与在知情同意原则下合法采集用户行为信息的原则不符, 必将造成用户信息的广泛泄露, 从而扰乱信息商业化运用的市场秩序。在运用目的上, 滥用用户行为信息, 常指互联网企业依据用户行为信息对用户进行区别对待以获取超额利润。典型者为“大数据杀熟”行为, 即互联网企业依据用户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消费意

愿等内容对其进行标签化处理, 同时使用协同过滤等分类算法计算用户购买概率并将其进行分类, 以便预测出不同用户所能接受的商品价格, 并据此对新老用户进行区别化定价。^[7]

再次, 自动化决策结果不公正的风险。自动化决策是人工智能的本质, 旨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 结合用户大数据进行打分、评价或者推荐, 从而在商业领域提高用户点击率、增加企业交易利润率。一般来说, 产生不公正的自动化决策结果的原因, 可以从算法程序设计、算法数据输入和算法黑箱当中寻找。互联网企业的自动化决策依赖算法程序, 若程序本身是不公平的, 必然直接影响决策结果, 而算法程序的形成过程必然带有主观色彩, 即程序设计者的主观价值潜移默化地融入算法程序的设置之中。此外, 用户行为信息的采集大多以注册账户或特定的客户端为中心, 而注册账户、客户端背后的自然人并不具有唯一对应性, 在多人使用同一账户或同一客户端的情形下, 互联网企业输入的数据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 由此导致自动化决策结果的背离。与此同时, 由于自动化决策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即使决策程序的设计者客观上也难以完全掌控决策过程中每一个逻辑数据的来源, 算法中的技术壁垒亦使得用户客观上无法全面了解决策的全过程, 故算法黑箱不可避免, 决策结果可能因此出现偏差。

三、商业化运用的法律规制路径

正如上文所述, 当前互联网企业所掌握的用户行为信息涵盖了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兴趣爱好、政治倾向、健康状况、起居作息、交易习惯等, 具有数量大、范围广、程度深之特点。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丰富的用户行为信息复刻出一个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倾向上都与自然人别无二致的虚拟形象, 若其对用户行为信息的采集、利用不当, 将直接侵害用户的人格、财产上的利益, 或者使用户陷于诸多难以预知的窘迫、不便或者不公平的情境中。为此, 必须在推进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过程中, 通过法律规制手段来消解商业化运用所伴生的风险, 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空间、防

止用户行为信息滥用, 并尽量保障自动化决策的公平性。

(一) 保护用户隐私空间

第一, 积极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用户的知情同意是互联网企业采集用户行为信息应遵守的一项原则, 亦是信息采集的合法性基础。^[8]实践中, 大多互联网企业的用户行为信息采集协议存在篇幅长、专业术语多、重点不突出等问题, 使得该原则流于形式。为了切实满足知情同意原则的两个构成要素“知情”和“同意”, 一方面须明确互联网企业的告知义务, 即将用户“知情”的权利转化为互联网企业的义务, 另一方面应推进用户“同意”方式的规范化。当前, 大多以用户点击“同意协议”按键的方式表明其对互联网企业采集自身行为信息的有效承诺, 然而此种承诺方式的规范性不足, 带有一定的随意色彩。为此, 建议使用电子签名作为用户明示同意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此一来, 不仅能够进一步实现“同意”方式的规范化,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用户对于行为信息采集协议内容的关注度。

第二, 赋予企业信息财产权。考虑到用户行为信息的单个原始数据的价值极低, 并不具有商业化运用的可能性, 因此, 只有经由互联网企业通过技术性手段对海量原始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加工后, 所形成的数据分析结果才具有商业化运用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 算法技术实现了低价值的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衍生数据的转化。^[9]因而有必要明确企业对用户行为信息的权属, 赋予互联网企业对用户行为信息的财产权。如此一来, 一方面能够避免出现因权属分散于自然人个体而导致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难以实现的问题, 调动企业开发信息的商业价值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可以在特定情形下为用户提供相应的请求权基础, 促使互联网企业合法、合理地开发、运用用户行为信息。

第三, 推行数据匿名化处理技术。推行用户行为信息匿名化处理技术, 可以最大限度地模糊用户行为信息与自然人之间的联系, 降低可能对自然人权益造成的损害, 并促进用户行为信息的市场流转。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指出匿名信息应满足“无法

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两个基本特征。在未来, 有必要为用户行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确立统一的技术标准, 包括明确用户行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适格主体、信息内容、技术手段、基本方法等内容, 以增强用户行为信息匿名化建设的规范性、标准性和有效性。需要注意的是, 匿名化信息并非意味着绝对无法识别出特定主体,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 在数据库存储数据充足的情形下, 有可能实现对于信息主体的反向追踪。因此, 企业不能将匿名化技术作为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挡箭牌, 而应不断对相关技术进行优化, 以保护用户隐私空间免受侵蚀。

(二) 防止企业信息滥用行为

第一, 强化互联网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增强互联网企业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提高用户行为信息处理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 是推动企业这一信息控制者形成有效的内生治理机制的重要条件。^[10]互联网企业对用户行为信息的披露应当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原则, 即信息内容符合“真实”情况、披露环节契合“完整”程序, 且披露时间满足“及时”要求。互联网企业应当披露的信息内容需与用户行为信息的处理密切相关, 主要涉及信息采集、存储和利用环节。互联网企业信息披露的重点在于涉及信息交易、信息共享等会引发行用户行为信息流转的相关内容, 对该内容的充分披露将成为防止企业滥用用户行为信息的有力枷锁。

第二, 保障用户的监督权。从用户视角而言, 企业披露的相关信息是其行使监督权的直接且重要的依据。用户作为互联网企业所提供产品、服务的接受者, 由其负责监督互联网企业的行为最为直接、高效。在监督过程中, 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畅通的监督渠道, 如在其信息披露的官方页面增设用户专栏, 供用户提出疑问或者发表意见, 并在企业内部设置专员负责处理用户专栏内的反馈信息。又如, 企业专设用户热线, 由内部专员负责与来电用户对接。当然, 用户的监督渠道开放期限应当由企业在法律规范范围内, 结合自身经营状况或者人员安排等因素进行灵活设置, 不能由法律进行“一刀切”, 但是一经确定即应当借助信息披露途径向社会公开。

第三，完善用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互联网企业与用户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相较于用户而言，互联网企业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控制着作为关键证据的定价算法与数据信息。此时，若遵循以双方主体平等条件为基础而构建起的一般举证规则，则对用户明显不公。因此，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该企业负责证明其并未存在信息滥用行为。赋予互联网企业这一义务并不会对其造成过重负担，因为其本就应当履行在一定期限内保存相关数据的法定义务，且已具备相应的数据保存技术条件。此外，由于仅依靠用户信息采集协议的约定，可能很难使用户获得合理的赔偿数额，有必要通过强制性立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企业实行了违约行为；用户一方有损害事实；行为和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企业主观恶意严重，即基于故意或者恶意倾向而泄露、传播、使用用户行为信息。惩罚性赔偿的基本标准，则须结合互联网企业的主观恶意程度、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用户所受的损害程度等因素进行个案判断。

（三）维护自动化决策的公正

第一，规范算法设计者的行为。算法程序作为人为设计的工具，其运行结果虽然由技术自动生成，但是必然留有设计者的主观印记。因此，为了保障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公正性，在算法程序被投入应用之前，应当尽量减轻设计者给算法程序带来的不当价值取向。为此，法律规范应当增强对算法程序设计者的约束，促使其在设计算法程序时尽量秉持中立、无歧视的态度。若算法设计者在算法程序设计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其应主动回避；若算法程序存在价值取向上的歧视或不公平，应当依据法定程序进行人工干预、改正。在算法程序投入应用后，亦须持续进行维护、优化，积极开发可以预防、纠正算法偏见的有效工具。如谷歌即已经研发了“阈值分类器”，以改进机器学习系统来避免算法歧视的出现。^[1]

第二，提高算法运行机制的透明度。在算法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提升算法运行机制透明度，以增强自动化决策的公正性。透明化的算法运行机制是破除算法黑箱的重要武器。虽然，自动化决策信

息可能会涉及商业秘密，但是在特定情形下，互联网企业仍应当承担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即在用户对决策公平性具有合理怀疑时，可以要求企业依据法定程序披露与其利益相关的自动化决策信息，以实现互联网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在未来，我国还可以借助相关法律规范推动具有算法研制的企业共享算法技术，以尽可能地降低算法设计中的技术壁垒，有效限缩算法独裁的空间，保障自动化决策的公正性。

第三，明确算法解释请求权。当用户认为互联网企业的算法决策不公正时，应当行使算法解释请求权，要求企业以用户能够理解的方式对相关事实予以解释。此时，互联网企业不得以事前已经提供详尽的说明、解释或者向用户提示了可预见的相关风险为由，排除其向相对人的解释义务。互联网企业的解释内容应当包括两项：一是决策系统的运行原理、一般功能等；二是决策产生的原因、直接导致决策结果的数据信息等。在解释的过程中，若互联网企业囿于自身知识、技术能力而无法对相关事项予以说明，则应当寻求算法设计者的帮助，后者有义务协助其向用户进行解释。若发现不公正的决策系由算法本身错误引起，用户可以要求互联网企业对自动化决策系统进行修正，而后重新决策；若发现该决策系因数据使用错误导致，则可以要求互联网企业更新数据或者修正数据，以便进行重新决策。

注释

① 譬如，淘宝网的个人“成就清单”能显示出用户首次使用该APP的时间、自初次使用至今的总消费金额、浏览购买比率以及购物车的物品类别。网易云音乐APP的年度总结能够全面展示用户收藏、播放的歌曲、聆听次数甚至具体的听歌时点。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实时搜集和挖掘信息，为每位用户构建起详细的网络行为信息档案，完整地记录其网络活动轨迹。通过分析上述档案，企业能够更加了解每位用户需求，并预测其行为倾向，以便为其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最终实现产品、服务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精准对接。

② Alvin Chang, The Facebook and 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

explained with a simple diagram, May 2, 2018,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8/3/23/17151916/facebook-cambridge-analytica-trump-diagram>.

参考文献

- [1] 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 中国法学, 2015(3):38-39.
- [2] Patrick Myers.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User Privacy and Behavioral Targeting[J].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2016(3):717, 720.
- [3] Andrew J. McClurg. A Thousand Words Are Worth a Picture: A Privacy Tort Response to Consumer Data Profiling[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3(1):63, 124-125.
- [4] Andrew J. McClurg. A Thousand Words Are Worth a Picture: A Privacy Tort Response to Consumer Data Profiling[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3(1):63, 125.
- [5] Elspeth A. Brotherton. Big Brother Gets a Makeover: Behavioral Targeting and the Third-Party Doctrine[J]. Emory Law Journal, 2012(3):555, 558.
- [6] Andrew J. McClurg. A Thousand Words Are Worth a Picture: A Privacy Tort Response to Consumer Data Profiling[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3(1): 63, 63-64.
- [7] 余敏. “大数据杀熟”可以避免吗？——电子商务逆向选择风险规避[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9(4):141.
- [8] 郑佳宁. 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采集中的适用与规则构建[J]. 东方法学, 2020(2):198.
- [9] 韩旭至. 数据确权的困境及破解之道[J]. 东方法学, 2020(1):106.
- [10] 周汉华. 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J]. 法学研究, 2018(2):18-19.
- [11] 汪怀君, 汝绪华. 人工智能算法歧视及其治理[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0(2):105.

Regulatory Path f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ZHENG Jianing

Abstract: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as a by-product of users' enjoying personalized services and convenient consumption in the Internet econom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ity, aggregation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ternet companies mainly realize the commercial use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by precipitating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positioning users by their behavior, and developing personalized advertising recommendations.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full commercializ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aspects of protecting user privacy, avoiding abuse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and ensuring the fairness of automatic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establish specific rules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In such way,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are not damaged, and the benefit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are maximized.

Key words: user behavior information; commercial appli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information abuse; automatic decision-making

民法典背景下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的法律规制

张凌寒 杜 婧

摘 要: 无人机正处于商业化发展浪潮之中,并被电商、房地产、广告等行业广泛使用。然而,民用无人机的快速普及成为了个人隐私信息的巨大隐患:无人机可飞抵人类无法到达的位置收集的大量高清图像造成个人隐私泄露,与此同时我国缺乏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详细、有效的保护机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隐私空间以物理作为界限,而无人机模糊了公共空间与隐私空间的界限。因此,民法典隐私权救济路径与行政监管路径应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应将隐私空间从物理空间发展至“以人中心”,完善民法典提供的隐私权利救济路径,设立利于被侵权人的举证规则。并且,通过无人机标识制度实现民法典中的收集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无人机收集数据飞行的行政监管,并通过空管系统建立飞行的备案、识别制度,并为被侵权人提供无人机相关信息。

关键词: 民用无人机;个人隐私权;民法典;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85-08

2018年以来,中国民航局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①《高风险货运固定翼无人机系统适航标准(试行)》^②规定了民用无人机的申请程序及注册登记义务、适航标准,表明我国将无人机纳入飞行器的航空飞行安全管理中。然而,无人机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信息收集器。作为商业平台企业的信息产业链中的关键工具之一,搭载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如同可移动的监控,无声地悬停在建筑物窗边收集大量个人信息。伴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民用无人机“不请自来的摄影问题”^③大量出现。无人机在公共空间飞行,却可窥视私人空间,造成了隐私空间“边界模糊”的问题,法律却并无足够的资源予以应对。

本文针对民用无人机造成的隐私空间边界模糊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其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危害及法律应对无力的现状。参考美国对无人机飞行的相关

规制手段,结合我国民法典有关个人信息与隐私法规,以期构建平衡无人机产业发展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制度方案。

一、民用无人机飞行侵害个人隐私的法律缺位

(一) 无人机作为信息收集工具的优势

2016年,原本用于军事领域的无人机系统(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走向商业化发展。^④由于无人机多用途、高效率、噪音小、不易被察觉的特点^⑤,并且可以大量收集关于所经地区的个人和地面信息^⑥,因此受到诸多重视信息价值的行业的青睐。

无人机的信息收集用途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⑦商业领域,房地产行业用来拍摄空中影像观察房屋建筑情况,农业领域使用无人机观测作物情况。^⑧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理的法律制度构建研究”(19YJA820053)

作者简介: 张凌寒,女,河北张家口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与网络法;杜婧,女,湖南常德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与网络法。

私人用无人机则被用于娱乐、自拍、竞技比赛等。^⑨例如顺丰物流在2017年6月首获无人机物流合法飞行权,其在无人机领域申报和获得专利数量达到111项。^⑩无人机正在并即将扩展至农业领域,石油、天然气勘探,电气工程,房地产,快递运输业,新闻业,电影电视拍摄^⑪,甚至救援任务。^⑫《2019年无人机市场报告》显示全球无人机市场将从2018年的14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430多亿美元。^⑬实际上,民用无人机以其“小”“轻”“快”的特点,成为了收集信息的最佳工具。

民用无人机是重视信息价值的平台与企业收集信息的重要工具。无人机的强大功能性使其能够快速、大量、精确地收集地面个人信息,又可以节约企业的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无人机作为信息收集工具,无须遵循现行的收集信息的告知义务,有效节约收集信息时的合规成本。

首先,无人机具有收集个人信息的功能优势。其一,无人机可以实时收集信息并反馈给所属企业。大多数无人机搭载可远程控制的高清相机^⑭,有些无人机具备更高级的机载设备,比如夜视镜头,定位装置,无线网络搭载器,车牌自动识别器。^⑮单纯的无人机对于信息依存企业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当无人机连接上网络,其所能收集的信息能够实时传输到企业手中,并且与企业掌握的其他信息结合,最终形成巨大的信息网。其二,无人机收集信息图像的分辨率较高,可以有效填补信息依存企业其他产品的空缺。以谷歌公司为例,他们的使命是搜集全世界的信息并整合以赋予其经济价值。谷歌的产品线上已经有了卫星和街景。卫星能看到整个星球,但分辨率很低;街景分辨率很高,但只能看到有限的范围。而无人机的出现则填补了中间的空白。^⑯其三,无人机不受空间限制,其搭载全球定位系统,并且可以在操作者视线范围之外飞行,突破谷歌公司的街景项目中地面移动车辆的空间限制。^⑰

其次,无人机具有收集个人信息的制度成本优势。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规制处于空白状态。在现行的法律规制下,民用无人机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经批准即可投入使用。对无人机的监管侧重于无人机的航行安全问题。^⑱民用

无人机的所属企业可以在没有充分告知个人,也没有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地面个人信息,尤其是在类似个人房间的隐私环境下的个人信息。

(二) 民用无人机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缺位

目前,我国关于民用无人机的规制具有“重飞行安全、轻权利保护”的遗憾,我国目前无人机规制的法规多关于飞行安全与市场标准。如2018年3月民航局提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规定了民用无人机的许可申请条件及监督管理程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民用无人机的航行安全问题已经得到重点关注。整体来看,相对于民用无人机的快速发展而言,我国的民用无人机规制管理机制尚处于构建框架的初步阶段。

对于无人机侵犯个人信息规制则刚刚起步。2019年11月5日,民航局下发《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管理规定》,涉及轻小型民用无人机所涉数据的问题。但是对于民用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尚未纳入无人机管理框架之内。综上所述,民用无人机使用的急速扩张凸显出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缺位。

二、民用无人机收集信息的隐私空间论

从我国民航局发布的政策法规来看:规则制定均针对民用无人机发展现状和经济需求而制定,对于民用无人机的规制呈现宽松化趋势。^⑲在行政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只能转向私权救济。但民用无人机侵害隐私的认定的核心问题,在于无人机打破了传统隐私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造成了空间隐私权的“边界模糊”。

(一) 以物权空间为中心的传统隐私空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看,侵犯隐私权的情形需要基于侵权人对于住宅或某种具体物权的侵犯才能成立,即隐私权是存在于以物权为中心的特定空间中的权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三条^②以及第一百五十二条^③之规定, 可以视为个人对于建筑物的权益空间仅限于: 纵向空间到航行空域为止, 横向空间到建筑区划界限为止。

然而在实践中, 个人不动产权益的无限延伸难以实现。20世纪中期之前, 曾存在这种个人不动产权益无限延伸的权利观点, 即: “天空原则”^④ (adcoelum), 认为不动产所有权人的空间权利范围上至天堂下至地心。^⑤但是, 随着科技推动航空业的发展, 以及地下资源的价值发掘, 个人不动产的空间权益必然为公共利益让步, 个人不动产的空间权益受到公共空间权益的限制。换一个角度, 从紧邻建筑物的空间向外延伸, 到达何种程度视为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以物权法的现行规定, 建筑物实体外部的地上空间权利是否受到保护, 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 都是不明确的。^⑥

现在, 民用无人机有能力进入到权属不明的“公共”空间内, 法律也并未做禁止性规定。在侵权法空间权理论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我国针对无人机航行安全问题, 采用的是划分整体空域的“禁飞区”制度。^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各地情况自行规定禁飞区。有的地区设置严格, 未经批准, 严格限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入车站、街道、公园、大型活动场所、展览馆、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人口密集区域。^⑧另一些地区则更注重机场净空保护^⑨, 对人口密集区域的无人机飞行未做规定。现有明确规定的适飞空域的《海南省民用无人机管理办法(暂行)》^⑩规定: 微型适飞空域真高不得超过50米, 轻型适飞空域真高不得超过120米。从整体情况看, 禁飞区规定的制定目的仍然是保障航空安全, 对于无人机进入个人隐私空间时的处理未做规定。

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逐步开放民用无人机使用, 在城镇人口密集区发现无人机的身影也将成为常事。按照我国现行的无人机相关规定, 出于航行安全考虑, 在城镇人口密集区飞行的无人机需要取得合法飞行权。这意味着取得合法飞行权的民用无人机可以自由出入人口密集区, 加上其所具备的影像收集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 为民用无人机大量收集个人隐私信息提供了条件。为了取得更精确的信

息, 在缺乏限制的情况下, 会出现民用无人机过于靠近个人不动产的问题。此时, 个人往往只能消极应对, 采取自力救济手段。因此, 不动产建筑物之外的空间, 缺乏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机制。

(二) 隐私权空间范围的扩展: 从物权中心到“以人为本”

传统隐私保护机制的中心是以物权为圆心扩展的空间, 而非权利人。以物权为中心的隐私空间, 显然无法对抗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侵权。而互联网时代, 隐私权的空间中心应当向“以人为本”位移。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民法典就是对“以人为本”的回应, 该法典将隐私权列入“人格权”, 对隐私权做了明确的法律界定^⑪, 突破了传统的“私密空间”, 扩展到人的“私密活动”; 且对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做出进一步规定。^⑫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转变系回应现代社会中个人隐私意识的增强, 这一社会需求也就要求权力空间随着人的位移发生动态的扩展, 而不是仅限于不动产提供的物理空间。

回到民用无人机的侵权情形下, 法律对隐私空间的滞后定义带来了隐私保护缺位的法律后果。这种不利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 权利人难以意识到民用无人机收集了自己的信息, 即缺乏“权利人同意”这一合法收集个人信息的前提。互联网企业收集个人信息的一般模式是“告知—同意”模式, 具体步骤是: 企业提供隐私信息收集政策视为履行告知义务, 用户使用互联网服务视为同意该隐私政策。这种没有弹出注意界面, 提醒用户企业收集隐私信息行为的模式, 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起到隐私信息保护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追求高效的年代, 用户通常直接使用互联网服务, 而鲜少注意到该服务提供者的隐私信息政策。而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形下, 连“告知—同意”模式这样的表面提示义务也没有提供, 个人往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失去个人隐私信息, 根本无法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权利人明确同意”。其二, 个人无法识别侵权的民用无人机权属, 即无法确定侵权人。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采用远程操作模式, 权利人无法直接确定侵权人。在个人察觉民用无人机在附近悬停, 并试图采取决策时, 只能对于操作者的财

产——无人机采取自力救济的手段，驱赶或者拉开距离，而侵权人的身份则处于未知状态，后续的侵权之诉根本无法进行。民航局关于无人机的政策法规中规定了无人机使用企业的登记注册义务，需要提供无人机的相关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在何种情况下公示、公示的内容范围仍不确定。

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不平衡会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愈发倾斜。由于无人机收集信息的隐蔽性，信息的权利主体往往缺乏防范意识，鲜少意识到侵权问题；再加上无人机侵权情形下，难以确定侵权主体。个人即使意识到无人机侵权问题，由于无法确定侵权人，也难以适用个人隐私信息的传统侵权法保护。在传统侵权法保护难以适用的情形下，需要合适的外力介入个人和企业之间，重新调整两者的平衡。

三、无人机个人隐私保护机制的构建

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的现状，既需要发挥民法典私权保护的优势，也需要及时建立有效的行政监管、多方力量与主体的参与方能建立有效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

（一）民法典适用于无人机侵害个人隐私的困境及调适

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③规定了隐私权的侵害行为，这一条款中的“拍摄、窥视私密空间”与“拍摄、窥视他人私密活动”可适用于无人机侵害隐私的情况。

但在具体实践中，民用无人机侵权情形下，权利人如何举证，成为难题。从定位侵权人，到举证侵权行为，再到申请删除信息，对于被收集信息的权利人而言，实际操作中都异常困难。此情形下，个人信息和隐私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公民的自力救济成为了必然选择。但无论是防御性地拉上窗帘，还是攻击性地将无人机击落^④，对于民用无人机侵权问题而言，都并非根本解决方案。单一的纵向空间划分机制在无人机安全问题上可以起到实际作用。但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上，应当以个人权利为圆心，建立有弹性的圆形权利防卫机制。

民法典明确规定取得个人信息必须取得权利人同意，而民用无人机侵权情形下，如何确定权利人

是否同意被收集信息成为现实问题。从现实角度来看，就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无人机而言，拉上窗帘作出一个物理的拒绝姿态可以起到防止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但是，现在已经出现搭载红外扫描装置的民用无人机，比如亚马逊公司2017年的专利：一种送货无人机搭载的系统可以扫描客户房屋结构和图像信息，无人机能同时将这些信息发送回亚马逊的数据库。随后，亚马逊的图像识别算法将分析这些信息，以确定客户可能感兴趣的其他产品，然后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有针对性的广告为用户提供建议。^⑤这使得物理形成的任何障碍失效，个人信息的物理屏障彻底被新技术所打破。从亚马逊公司的民用无人机使用可以推知：企业默认其官网上的隐私政策尽到了告知义务，使用其无人机送货服务的客户应明知送货无人机有收集信息的功能。即使企业的这个假设成立，对于无人机经过地区和周边其他非客户的个人隐私信息，企业仍然没有尽到所谓的告知义务，也没有权力进行无告知收集，更遑论对信息进行图像分析。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提出的方案^⑥是：无人机标识。该规定要求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将符合要求的登记标志图片粘在无人机外观上，且要求登记标志附着于一个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查看的部件之上。当然，由于目前个人信息收集的前提均采用“告知—同意”模式，这一举措在表面上解决了权利人同意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无人机可视标识并不意味着实质上取得权利人同意。

（二）无人机空管系统的行政监管路径

我国民航局已经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对无人机用户实名登记、驾驶员资质、飞行数据传输^⑦做出了规定，并且建立了“中国民航局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交通管理信息服务系统”（UTMISS，下文简称空管系统），该系统已经广泛接入如大疆、无人机云等我国绝大多数无人机实时飞行数据源，这意味着空管系统具备成为无人机用户信息库的条件。在该系统已经成功在深圳试点的前提下，建立我国关于民用无人机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成为可能。该系统的适用具体分为两部分：

其一，空管系统数据库可为无人机监管保护提

供数据,飞行数据的备案与上报能够为监管无人机侵害隐私行为提供信息。根据《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管理规定》,从事轻、小型民用无人机及植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民航局实时报送真实飞行动态数据。具体数据包括:飞行记录编号、制造商代码、实名登记号^⑤、时间戳、坐标系类型、高度等,并要求数据报送频率应当不低于每5秒1次。从该规定看,空管系统理论上能够作为定位无人机用户和飞行轨迹数据库。此外,所有无人机应履行登记注册义务,由登记注册部门将无人机信息登记,并同步上传无人机的登记注册码至APP客户端,以建立切实可行的无人机快速识别系统。

其二,空管系统数据库可用来为被侵害的个人提供需要的数据。目前,《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管理规定》明确了单位可以申请使用数据,对于个人使用尚未规定。如果可以允许个人使用空管数据库的APP客户端,被侵权人可到管理部门查询该无人机的具体信息,再按照正常诉讼程序保护自己的权利。

当然,对被侵权人的信息披露应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止无人机机主的个人信息泄露。具体可考虑的措施包括,第一,被侵权人申请具体信息披露应向民航局提供:身份信息、数据用途、数据内容^⑥、数据传输和保管措施;第二,应将披露信息的无人机限定于民用范围。应确定被申请披露的无人机系私人娱乐用无人机、民用无人机,而非军用无人机、政府特殊用途无人机;第三,民航局最终向申请人披露的数据应当界定披露范围。考虑到无人机登记注册人的隐私权,无人机操作者的全名、无人机编号、注册地址,不应向个人披露,仅可在确有侵权的情况下披露无人机编号。

(三) 隐私权利主体应提高防御意识

双向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中的权利人要意识到权利在自己手中,以空管系统为基础的无人机信息系统APP客户端就是一面虚拟的保护墙,赋予权利人拒绝民用无人机收集个人隐私信息行为的权力。个人可以主动地使用APP客户端对于不明身份的无人机进行识别,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向民航局提出申请快速地确定侵权人。因此,对于民用无人机未

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即全方位的信息收集和图像分析,个人需要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保护态度。

另一方面,建议隐私信息的权利人对在附近飞行的无人机尽到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避免采取过激的自力救济,以免产生后续的财物赔偿纠纷。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隐私信息,获得合理的赔偿,而无须采取击落无人机等过激自力救济手段。

四、结论

新技术的产生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隐私信息无疑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无人机技术而言,其商业化发展对于信息依存企业是一个突破口:无人机能够更隐蔽、更精确地收集地面信息。无人机技术是无数信息收集技术中的一种,同时也是现在备受各方关注的一种技术。搭配无线网络传输技术、高清摄像头、红外装置的无人机已经足够完成收集信息的任务。但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不会止步于此,更微型的机身,更长的飞行时间^⑦,更精细的图像分析技术,更宽视野的4D相机^⑧,更智能的搭载式A.I.,这些技术是未来的可见发展趋势。与日益膨胀的技术发展相比,作为技术受众的人往往处在被动状态,被动地接受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普及,最后是新技术对“权利”的“侵入”。仅就个人的隐私信息而言,其权利的外延早已失去房屋墙壁等物理外壳的保护,原本依附于不动产权利的个人隐私信息,现在处于随时流向大数据的外溢状态。这种不自觉的外溢状态使得个人隐私权处于无防护的危险状态。针对无人机技术的现阶段发展情况,基于空管系统数据库的双向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能有效地在侵权情形下授权个人定位侵权者,同时对无人机所有者起到义务告知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的实施,必然需要生产和使用无人机的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作为受众和使用者的个人,这三者共同合作,起到各方作用,才能使之切实可行。总而言之,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侵权问题,其解决方案的核心基础也必然是可行的技术,以现有技术约束新技术的膨胀式发展趋势,滞后的法才有可能跟上新技术的脚步,在其“越轨”时起到阻挡作用。

注释

- ① 2018年3月21日发布。
- ② 2020年1月20日施行。
- ③ 无人机下的隐私问题如何解决? 链接见: https://www.sohu.com/a/149365947_650579, 访问日期: 2020-6-6。
- ④ 克里斯·安德森: 五年内无人机商用市场将有200亿美元的规模, 链接见: <http://tech.qq.com/a/20160429/031188.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7-08-10。
- ⑤ Hillary B. Farber, Sensing and Surveillance: Constitutional Privacy Issues of Unmanned Aircraft in UNMANNED AIRCRAFT IN THE NATIONAL AIRSPACE: CRITICAL ISSU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225, 228 (Donna A. Dulo ed., 2015)。
- ⑥ 同上at 229。
- ⑦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UA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Help, FED. AVIATION ADMIN., <https://www.faa.gov/uas/faqs/> (last visited Sept. 10, 2017)。
- ⑧ AMANDA ESSEX, NAT'L CONF. OF STATE LEG., TAKING OFF: STATE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DRONES) POLICIES 5 (2016), <http://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taking-off-stateunmanned-aircraft-systems-policies.aspx>; Marc Jonathan Blitz et al., Regulating Drones Under the First and Fourth Amendments, 57 WM. & MARY L. REV. 49, 54 (2015)。
- ⑨ Facial Recognition Drone Gives Your Selfie Stick Wings, UAV EXPERT NEWS (Apr. 5, 2016), <http://www.uavexpertnews.com/facial-recognition-drone-gives-your-selfie-stick-wings/> Mike Murphy, The First US National Drone-Racing Competition Was Won by an Australian, QUARTZ (July 18, 2015), <http://qz.com/457748/fpv-national-drone-racing-championship/> (last visited Sept. 10, 2017)。
- ⑩ 国内首家, 顺丰获无人机物流合法飞行权, 链接见: <http://tech.163.com/17/0701/18/C09FVOV100097U7R.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7-8-22。
- ⑪ Commercial Drone Shipments to Surpass 2.6 Million Units Annually by 2025, TRACTICA (July 21, 2015), <https://www.tractica.com/newsroom/press-releases/commercial-drone-shipments-to-surpass2-6-million-units-annually-by-2025-according-to-tractica/> (last visited Sept. 10, 2017)。
- ⑫ Ope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Small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80 Fed.Reg. 9543, 9545, 9548 (Feb. 23, 2015)。
- ⑬ 《drone-market-report2019》, 链接见: <https://www.droneii.com/project/drone-market-report>。
- ⑭ 以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产品Phantom 3 SE为例: 可录制4K/30p视频, 静态照片的有效像素达到1200万像素。具体见: <http://www.dji.com/cn/phantom-3-se/info?lang=cn#specs>, 访问日期: 2017-08-12。
- ⑮ 同注5 at 228-29。
- ⑯ 克里斯·安德森: 五年内无人机商用市场将有200亿美元的规模, 链接见: <http://tech.qq.com/a/20160429/031188.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7-08-10。
- ⑰ John Villaseñor, Observations from Above.—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and Privacy, 36 HARV. J.L. & PUB. POL'Y 457, 498 (2013); Melissa Barbee, Comment, Uncharted Temtoy: The FAA and the Regulation of Privacy via Rulemaking for Domestic Drones, 66 ADMIN. L. REV. 463, 479-81 (2014)。
- ⑱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许可证持有人开展经营性飞行活动, 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无人机管理有关规定的要求, 遵守空中运行秩序, 确保安全。”
- ⑲ 例如: 与《2012年美国联邦航空局现代化改革法案》相比, FAA于2016年发布的新规简化了民用无人机的许可证办理流程。在新规生效之前, 使用民用无人机必须持有FAA颁发的许可证(COA, a Certificate of Authorization), 且取得许可证的时间长达4到6个月的时间, 这可使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
- 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三条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 属于业主共有, 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 属于业主共有, 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 属于业主共有。第一百五十二条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链接见: http://www.gov.cn/flfg/2007-03/19/content_554452.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7-8-29。

- ②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内容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 ②② Jack Nicas, Drones Boom Raises New Question: Who Owns Your Airspace?, WALL STREET J. (May 13, 2015, 12:43 PM), <http://www.wsj.com/articles/drones-boom-raises-new-question-who-owns-your-airspace-1431535417>. (last visited Sept. 10, 2017).
- ②③ United States v. Causby, 328 U.S. 256, 260-61 (1946); Cujus est solum ejus est usque ad coelum et ad inferos, BLACK'S LAW DICTIONARY (6th ed. 1990).
- ②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 ②⑤ 2015年民航局公布的《轻小型无人机运行管理规定（试行）》（AC-91-FS-2015-31）中规定：“15.1.6 满足当地人大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遵守军方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发布的通告和禁飞要求。”各省、直辖市以此为依据设置各地的禁飞区。
- ②⑥ 2017年6月江西省公安厅发布《针对民用无人机发布飞行管理通告》，链接见：<http://jx.people.com.cn/n2/2017/0610/c190181-30307752.html>；2017年7月广东省公安厅发布《关于加强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的通告》，链接见：http://www.gdga.gov.cn/xxgk/jfkg/201706/t20170629_79349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8-27。
- ②⑦ 《四川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链接见：<http://zwcw.sc.gov.cn/xxgk/NewT.aspx?i=20170818212119-634178-00-000>，最后访问日期：2017-9-2。
- ②⑧ 2020年04月01日发文，http://jt.hainan.gov.cn/xxgk/0200/0202/202004/t20200427_2781103.html。
- ②⑨ 民法典1032条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 ③⑩ 民法典1033条 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短信、电话、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 ③⑪ 同上。
- ③⑫ 此时后续可能会涉及到关于无人机的赔偿问题以及行为人证明无人机拍摄了自己隐私信息的问题。
- ③⑬ 信息来源见：<http://www.cnbeta.com/articles/tech/635607.htm>
- ③⑭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3.4 民用无人机的标识要求
（1）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在收到系统给出的包含登记号和二维码的登记标志图片后，将其打印为至少 2 厘米乘以 2 厘米的不干胶粘贴牌。
（2）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将登记标志图片采用耐久性方法粘于无人机不易损伤的地方，且始终清晰可辨，亦便于查看。便于查看是指登记标志附着于一个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查看的部件之上。
（3）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必须确保无人机每次运行期间均保持登记标志附着其上。
（4）民用无人机登记号和二维码信息不得涂改、伪造或转让。
- ③⑮ 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动态数据管理规定》《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 ③⑯ 无人机拥有者在民航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完成登记后，系统自动分配的登记号。但并非强制性登记。
- ③⑰ 数据内容至少包含：数据水平坐标范围（即侵权行为发生位置）、时间范围（即侵权行为发生时间）、数据类型（图片或者影像）。
- ③⑱ 大多数无人机可以持续飞行20分钟，10 Drones with the Best Flight Times, DRONES GLOBE (Mar. 2, 2016), <http://www.dronesglobe.com/guide/long-flight-time/>. (last visited Sept. 10, 2017).
- ③⑲ 信息来源见：<http://www.loooker.com/archives/47034> When Drone Comes: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When Drone Comes: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Civil Law Code Background

ZHANG Linghan DU Jing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UAS, major industries like e-commerce, real estate, and advertising are using UAS as a tool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empires. Meanwhile, the speedy expansion of UAS causes safety issue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wo aspects. For one, drones collect an ocean of high-resolution pictures at locations inaccessible by people, and leak personal privacy. For another, China lacks a specific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system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civilian drones. The key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from physical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private space, the boundar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is blurred by drones. Therefore, Civil Law Code relief for personal privacy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should function simultaneously. Private space should be expanded from physical space to “human-centered” space. The Civil Law Code relief procedures for private rights should be perfected by adding proof rules in favor of the infringed. Also, the notified-and-agreed rule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the code should be validated by labeling drones. In the meantim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ver drone flights for data coll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filing and identifying flights through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 and providing the infringed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drones concerned.

Key words: civilian drones; personal privacy; Civil Law Code; information revelation

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实现机理和形式

杜人淮 郭 玮

摘 要: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必须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国防工业是国家科技创新重要力量。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可通过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共用、成果互转互用、平台兼容兼顾、活动协同协调、制度相容相通等作用的发挥,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军民科技创新效率,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实现,主要有军民自主创新内外驱动、军民科技市场需求牵引、军民科技双向转化推动、军民协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等形式。

关键词: 国防工业; 军民协同; 科技创新; 机理; 形式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093-09

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当今国与国竞争越来越聚焦和体现于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水平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随着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耦合关联性越来越紧,融合度越来越高,“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动向,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一体论证和实施,努力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2]。为此迫切要求发挥国防工业优势,通过军民协同创新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一、实现机理

根据科技是否用于军事目的,通常可区分为军用(国防或军事)科技、民用科技和军民两用科技。现

代国防工业同时担负着发展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包括军民两用科技)重任。国防工业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功能的发挥,通常通过军民分离创新和军民协同创新的途径来实现。其中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主要是通过军工和民用科研生产单位共同参与军民科技研发(R&D),推动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共用、成果互转互用、平台兼容兼顾、活动协同协调、制度相容相通等,促进军民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高军民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从而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其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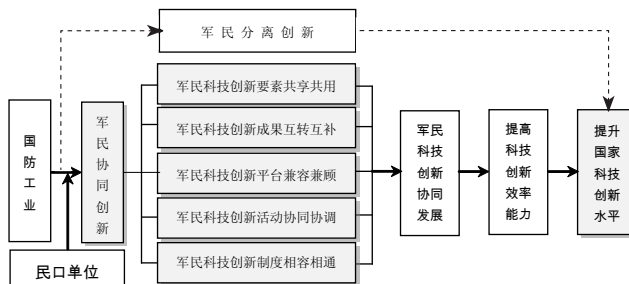


图1 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实现机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防工业发展的军民融合战略研究”(12BJY07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要论述研究”(17WTA014)

作者简介: 杜人淮, 男, 江西新建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 郭玮, 女, 山东青岛人, 解放军海军某部, 研究方向为国防经济理论与实践。

(一) 军民科技创新要素共享共用

科技创新要素的投入是启动和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基础。国防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也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过程,必然是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共用的过程,由此可推动军地军民创新财力、人才和设备设施等资源充分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从而为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供创新要素支撑,更好发挥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功能。

1. 提高科研经费的保障力

科研经费的投入是开展科研活动和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前提。军民科技创新领域在科研经费保障上各有优势,前者由于国家对国防安全的高度重视通常在经费投入上会得到优先保障,后者由于利益驱动和市场机制作用通常具有较强的科研投入内在动力,融资渠道较多、融资能力较强。通过军民科技创新要素共享共用,可充分发挥军民科技创新领域科研经费保障比较优势,增强整体国家科研经费保障力。通过增强国家科研经费保障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还可促进经济建设发展,使国家科技创新获得更加充足和更可持续科研经费来源,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科研经费保障力。

2. 壮大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创新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资源。军民科技创新人才各自具有不同专长和优势。通过军民科技创新要素共享共用,促进军民科技创新领域科技人才的相互交流与密切合作,不仅可使科技人才的才华得到最充分发挥,而且可通过日益密切的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不断丰富知识和增长才干,提高科技创新人才能力和水平,促进军民科技发展。

3. 提高设备设施综合效率

科技创新活动离不开科研设备设施等资源。尖端和前瞻性科研活动则需要更为先进的科研设备设施。军民科技创新领域的科研设备设施各有优势。通过军民科技创新要素共享共用,不仅可使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实现科研设备设施充分共享,而且可实现军民科技创新设备设施优势互补,这样既可提高科研设备设施综合利用效率,又可增强军民科技创新综合能力。

(二) 军民科技创新成果互转互用

军民科技创新成果并非都是作为最终消费品进入军事训练和作战等军事消费领域或居民生活消费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将作为科研设备、设施、材料等用于科学探索、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制,成为开展科研创新活动的必要科研条件。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成果双向转化和相互使用,就可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更好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1. 提高成果的科技创新贡献率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成果互转互用,不仅可通过直接使用或转化使用实现国防工业内部军民科技创新成果的军为民用、民为军用,而且实现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等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的军为民用、民为军用,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科研成果的闲置浪费等问题,而且可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利用率^[3],从而提高军民科技创新成果对军民科技创新和国家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2. 提升和改进科技创新科研条件

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领域不同程度存在的诸多“卡脖子”技术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设施、设备、仪器等科研条件落后。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成果互转互用,可使更多先进的军民科技创新成果直接使用或转化使用在军民科技创新领域得到充分利用,并产生溢出效应和叠加效应,从而不断提升和改进军民科技创新条件,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三) 军民科技创新平台兼容兼顾

科技创新平台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军民科技创新平台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军民研发技术交流信息平台、军民研发能力数据库、军民技术虚拟整合网络平台、军民融合产业园区等。推动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使军民科技创新平台在军民科技创新中实现功能兼容和活动兼顾,有助于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1. 畅通军民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渠道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平台兼容兼顾,可使军民科技创新主体更加灵活、更加便利共享军民科技创新平台,这不仅有利于军民科技创新主体共享科研数据信息、开展科研合作攻关和分享科研成果等,而且有利于打通军民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科研交流渠

道,从而密切军民科技创新协同关系。

2.提高军民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平台兼容兼顾,不仅可解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的资源重复配置和闲置浪费等问题,提高科技创新平台利用和配置效率,而且可使军民科技创新平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军民科技创新效率,促进军民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四)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协调

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协调,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必然要求。通过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和军民科技创新间的有效协调,有助于打破军民科技创新的军民分离和自成体系格局,充分发挥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掘军民科技创新的实力和潜力,并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活动的协同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等取得“1+1>2”的效果^[4],不断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1.有效发挥军民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协调,可进一步密切军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军工民用生产企业和政府部门、军队部门、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等各类军民科技创新主体合作关系,提高分工协作水平,形成强大合力,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的力量基础。

2.有效发挥军民科技创新资源作用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协调,可充分调动和广泛利用军工、军队和地方相关部门及单位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和管理等科技创新资源,不仅可使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相互协调,而且可实现军民科技创新资源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军民科技创新质量效率。

3.有效发挥军民科技创新平台作用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协调,可有效整合和充分发挥军工、军队、地方相关部门与单位所拥有的国家或国防各类重点实验室和各类工程中心、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各类科技文献资源与服务系统、计量标准体系以及计量检测技术等科研、服务、支撑等平台作用,不断增强军民科技乃至整个国家科技创新的组织、实施和运行等方面能力。

(五)军民科技创新制度相容相通

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需要相关制度体系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撑。军工和民口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制度差异,是制约发挥国防工业优势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壁垒和障碍。推动军民科技创新制度相互兼容和相互贯通,特别是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军民科技创新制度相容相通,以及军民不同产业和企业科技创新制度相容相通,不仅是提高军民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有力保障,而且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有力保障。

1.破除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障碍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制度相容相通,不仅可破除军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军民科技创新自成体系和各自为政的管理格局,实现军民科技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平台、创新成果和创新活动等充分沟通、交流和合作,而且可破除军民科技创新标准体系、保密制度和准入制度等壁垒,更好实现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创新平台相互开放共享和创新成果双向转化共享,促进军民科技创新的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

2.增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动力

通过军民科技创新制度相容相通,可更好发挥政府、军队、军民产业等各部门和领域制定实施的鼓励、引导和支持军民科技创新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保障激励作用,以及在长期科技创新中所形成的创新文化的保障激励作用,为推动军民科技创新增添更加强劲动力。

二、实现形式

综上所述,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有助于增强军民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军民科技创新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但要真正发挥好国防工业协同创新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功能,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一)军民自主创新内外驱动

科技自主创新是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核心。国防工业的军民科技自主创新水平,主要取决于军工和民用领域军民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并受到军工和民用领域自主制造能力、转化能力、管

理能力、营销能力等影响制约。现代国防工业为军民结合型国防工业,其科技自主创新包括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和民用科技自主创新。军民自主创新内外驱动,就是将国防工业军民科技自主创新纳入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把军工和民用领域的科技自主

创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军工民用领域科技、人才等优势和作用,通过国家主导和内生需求的驱动作用,推动军民科研经费投入、军民科学探索、军民技术研发、军民产品开发等合作与协同,从而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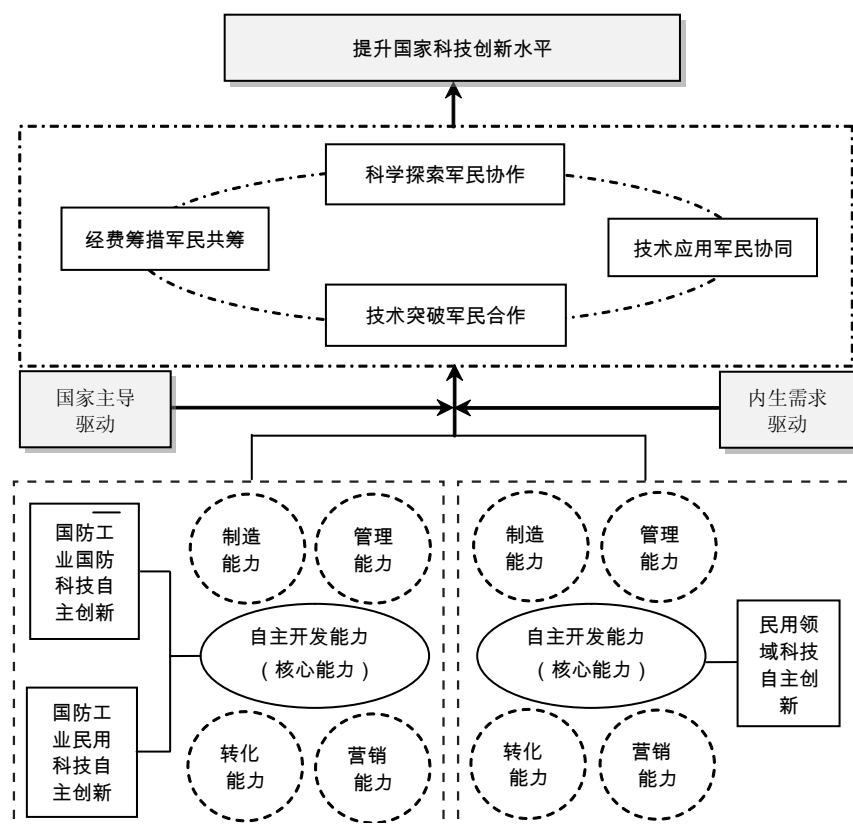


图2 军民科技自主创新驱动实现形式

1. 国家主导驱动

富国与强军是国家需要统筹发展的两大目标^[5],创新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军队战斗力重要内容。因而国家必然会在推动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和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健全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筹划制定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健全和完善财政、金融、投资、土地等方面支持政策等,推动军民科研经费投入、军民科学探索、军民技术研发、军民产品开发等合作与协同,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2. 内生需求驱动

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推进,科

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军工和民用领域的军民科技自主创新不仅对优质科技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军民科技自主创新协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均有推动军民协同筹集使用科研经费、军民协同进行科学探索、军民协同开展技术研发、军民协同开发军民产品等内在动力,从而加快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二) 军民科技市场需求牵引

军民科技创新成果分别用于满足军事和民用需求,并主要通过军用和民用科技市场来实现。军民科技市场需求主要指军民科技产品市场规模的大小和产品潜在需求量。国防工业承担军事和民用科技研发双重职责,军民科技市场需求牵引就是军工科

研生产单位通过军民科技市场获得军民科技研发任务,按照军民科技需求部门要求,同有关军民科技生产主体开展合作科研活动,通过军民科技资源互

通、平台共享、技术溢出、技术转移等,不断提高军民科技研发能力和效率,从而不断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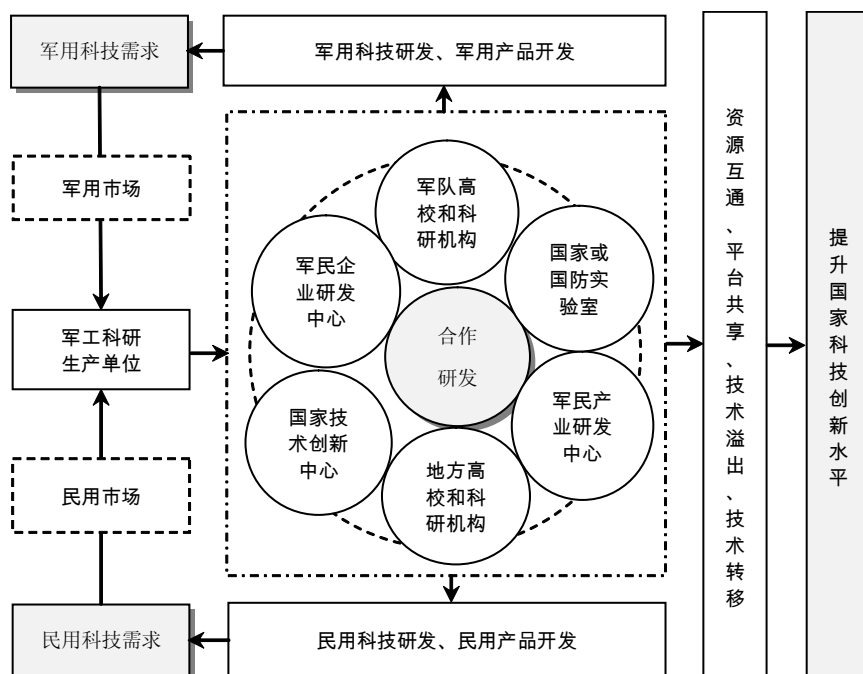


图3 军民科技市场需求牵引实现形式

1. 军用科技市场需求牵引

军用科技市场需求主要是指军事、军工部门或者政府（国防动员等）部门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国防建设而确立的一系列军事科研项目，以及武器装备等军品科研生产单位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科技瓶颈或难题。军事科技市场需求牵引又称使命驱动，其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过程：参与军事科技项目的招标，获得军事科技研发项目，或寻求军事科技研发任务→依据军事科技需求主体要求明确科技研发目标，确定科技研发方案，细化科技研发任务→聚合和组织军民科研生产单位对军事科技进行合作研发→推动军民科技资源互通、平台共享、技术溢出、技术转移等，最大限度满足军民双重需求，不断提高科技研发效率和能力，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2. 民用科技市场需求牵引

民用科技市场需求主要是指政府部门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确定的一系列民用科研项目，以及民品科研生产单位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用科

技瓶颈或难题。民用科技市场需求牵引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过程：调查市场、定位需求→瞄准民用科技发展趋势，紧盯民用部门和人民生活对科技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可行性研究，明确民用科技研发方向、目标和任务，并充分兼顾军事需求→联合军地科研机构、地方高校、企业单位等对民用科技进行合作研发，并将民用科技成果直接或进行转化满足军事需求，促进军民科技发展，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三）军民科技双向转化推动

国防工业部门和民口单位想要在科技发展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都有必要及时和充分采纳对方的最新先进科技及创新成果，通过必要转化使之与自身科技发展相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整合、研究、开发、再创新，由此不断推动科技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已为军民技术的双向转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6]军民科技双向转化推动就是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通过军民科技的整

合、研究、开发、再创新等,推动军民知识产权、生产技术、产品技术、科技人才的双向转化,从而不断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如图4所示。

1.军民生产技术的双向转化

军民生产技术包括军民生产设备技术、生产技术方法等。军民生产技术双向转化就是把先进的民用生产技术转为军用和把先进军事生产技术转为民用,或者通过军民生产技术双向转化平台直接研发生产军民兼容型高新技术和产品^[7],或者通过现

代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对传统军民生产技术进行改造,使相同生产技术研制生产军品和民品等不同产品,通过发挥军民生产技术相对优势,助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如在2016年成立的“陕西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和“陕西省高新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两个推动军民生产技术转化平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充分调动了各界科研力量和创新资源,在卫星导航、武器装备信息化、水下航行器等10余个尖端前沿技术上有所突破。^[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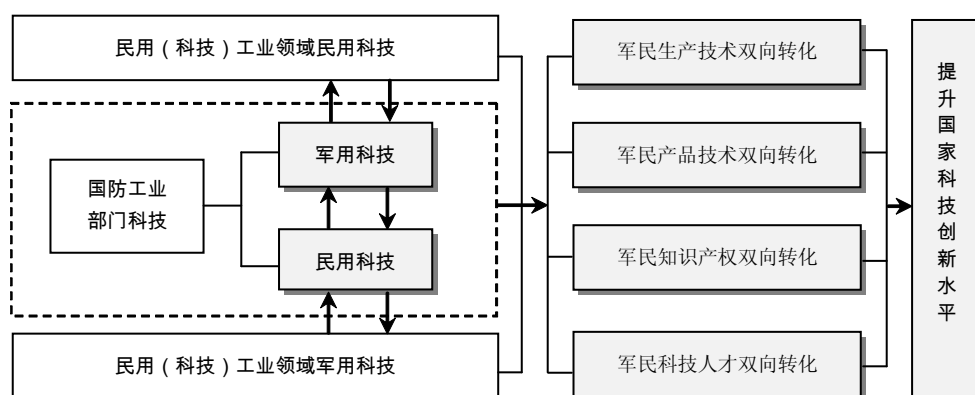


图4 军民科技双向转化推动实现形式

2.军民产品技术的双向转化

军品和民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因而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也不同,但各自都有比较优势。军民产品技术的双向转化就是把军用产品技术转为民用,或者把民用产品技术转为军用,通过军民产品技术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强强结合,助力提升军民产品水平和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如,我国遥感军事卫星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均优于民用卫星,近年来将侦察卫星数据技术转为地理国情普查、国家土地督察和海洋监视监测等民用领域,不仅打破了国家科研、经济建设和国家普查等工作中对外国卫星数据的依赖局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开支,而且加快提高了国家整体卫星遥感技术水平。

3.军民知识产权的双向转化

知识产权通常具有军民属性,如专利就有国防专利和普通(民用或通用)专利之分。军民知识产权双向转化就是将国防知识产权转化应用到民用领域,或者国防科技创新中广泛使用民用知识产权,

从而加快推动军民科技进步,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涉及军地两大系统和参与国防项目的多方利益主体,为加快推动军民知识产权双向转化,需要界定知识产权关系,加强军民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平衡和处理好有关方面利益关系。这就有必要加快推动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和保密制度改革,着力破除军民知识产权双向转化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

4.军民科技人才的双向转化

科技创新人才通常被区分为军事科技创新人才和民用科技创新人才,军民科技创新人才通常在各自领域具有自身比较优势。军民科技人才的双向转化就是破除军民科技人才界限,实现军民科技人才的交流使用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军民科技人才各自比较优势,助力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9]为加快推进军民科技人才双向转化,需要建立军民科技人才双向流动机制,畅通军民科技人才相互转化渠道;利用“互联网+”构建信息化、网络化军民科技人才双向转化服务平台,提供及时准确的人才计

划、科技人才活动等信息，实现军民人才的良好互动、流通，为军民技术人才双向转化创造良好环境。

（四）协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新的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是国家为了加快国家科技创新和促进科技发展，通过充分调动科技创新各方力量和统筹协调利用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攻关的发展模式。^[10]国防工业协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就是国防工业创新主体和政府、军队、民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创新主体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过重大科技项目建设的经费投放、基地建设、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军民协同，在加快推进重大科技项目建设进程中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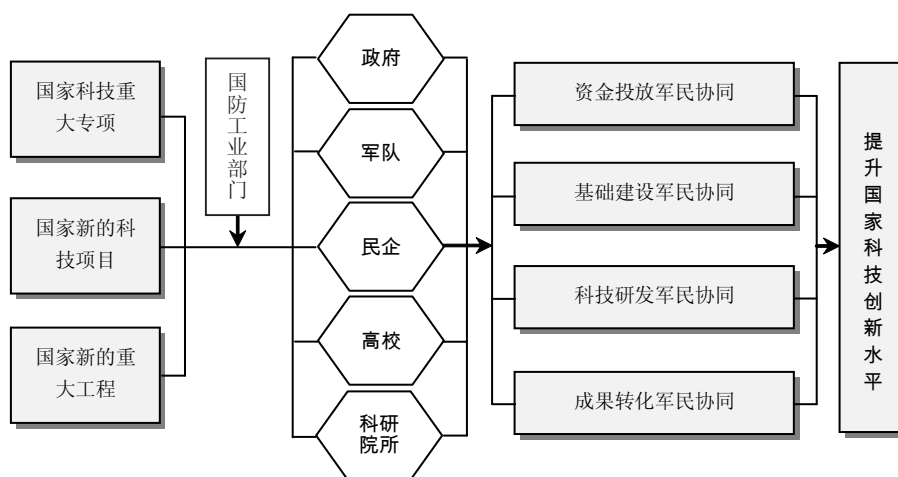


图5 军民协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形式

2.基础建设军民协同

军工科研生产单位通过军民协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需要军民科研等基础建设协调联动和整体推进，使军民科研等基础优势互补、功能兼备，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一是军民互通军民科研等基础建设信息。军民科研等基础信息互通，既要防范和避免科研等基础建设的重复投资和闲置浪费等问题，又要有助强化科研等基础建设更好服务重大科研项目建设。二是军民协同拓展科研等基础建设功能。民口重大科技项目科研等基础设施需要融入和增加国防功能，可协调军队

1.资金投放军民协同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需要与国家和相关参与主体对资金来源与投向进行协同安排。一是按照各自承担的重大科技项目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分工，明确所需的资金规模和分摊比重，协同安排资金的投向投量，确保资金得到可靠保障和投入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效、军事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二是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军工和民口科研生产单位协同安排和用好国家投放及其军工民口等投放的资金，既要保障资金被用于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工作，又要保障资金得到最有效利用。三是军工和民用相关创新主体协同监督资金使用，共同全程参与资金的预算审查、开支检查和成果考核等监督管理，确保资金依法依规用于重大科研项目。

或军工部门进行协同完成；军口重大科技项目科研等基础设施需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功能的，可协调地方或民口部门协同完成。三是军民协同保障军民两用科研等基础建设。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中，军工单位发起或进行的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科研等基础建设，可协调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提供资金、技术等保障，民用部门发起或进行的嵌入国防功能的科研等基础建设，可协调国家或军队提供资金和技术等保障。

3.科技研发军民协同

为提高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效率，军工单位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不能仅局限军工一方,需要充分利用数据库信息对接民口单位,拓宽军民合作渠道,强化科技研发协同攻关,激发军工民口双方各种科技创新力量集聚效能。一是打破科技研发的军民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封闭式模式,通过平台共享、人才交流、科研合作、民技军用、军技民用等灵活多样协同形式,不断扩展军民双方科技创新交流渠道,推进军民科技项目研发联动。二是积极搭建重大科技项目建设合作平台,完善军民科研联动机制,建立跨军民双方的学科、系统、部门、地域的交流途径,定期组织相关科技创新人才、科技管理人才、各方面专家就重大科技项目建设进展、存在问题、科技突破等,深入开展学术报告、论坛、研讨等活动,切实实现重大科技项目军民协作攻关,不断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

4.成果转化军民协同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成果的转化和运用,包括军用转化、民用转化和两用转化等,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的重要目的。为了更好地推进重大科技项目建设成果转化的军民协同,一是可利用区位优势建设国防科技产业园或军民两用科技产业基地,通过军民项目合作带动成果转化。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可有针对性地实施财政金融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成果的军用民用相互转化给予必要支持,积极推动重大科技项目建设成果转化的军民联动,共同开展技术预测和分析,凝练制约军民或共性关键技术转化难题,制定突破军民或共性技术转化路线图,加快攻克技术转化应用中的瓶颈和难题。

三、结语

当今国家与国家竞争的实质,就是国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竞争。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不仅如此,军民融合发展也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国防工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最重要领域,迫切需要加强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理论研究。^[1]本研究认为,把国防工业科技研发融

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之中,深入推进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可军民科技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成果互转互用、平台兼容兼顾、活动协同协调、制度相容相通等,更好发挥国防工业科技、人才、设备等优势,实现国防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在科技创新领域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和开放互动,增强军民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防工业军民协同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功能,可采取军民自主创新内外驱动、军民科技市场需求牵引、军民科技双向转化推动、军民协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等实现形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41.
- [2] 习近平.扎扎实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N].人民日报,2018-03-13(1).
- [3] 王辉.军民技术创新体系协同模式与评价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32.
- [4] 徐辉,许嵩.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18):104-108.
- [5] 杜人淮.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时代要求[J].中国军转民,2008(Z1):54-56.
- [6] 杜人淮,马宇飞.国防工业发展助推新型工业化:机理和实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97-109.
- [7] 赵晓琴.技术转移对军民融合企业发展的影响[J].科技风,2017(18):262.
- [8] 王舒颖.陕西: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行[J].国防科技工业,2016(8):22-23.
- [9] 杜人淮,曹超.创新人才军民融合培养体系及其构建[J].国防科技,2018(2):47-57.
- [10] 贾珍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研究[J].中国高新区,2017(16):8.
- [11] 杜人淮,贺琨.加快创建军民融合发展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8-02(5).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Form of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Defense Industry to Lift the Level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 Renhuai GUO Wei

Abstract: To enhance the country's core competitiv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lift the country's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can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military-civili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its efficiency, so as to promot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shared military-civili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output exchange, compatible platforms, coordinated activities, and compatible institutions. It can be realized in such forms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e of independent military-civilian innovation, demand in military-civilian technology market, bi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civilian technology, and joint involvement in major technological projects.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civil-military collabor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form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李 慧 康 静 王 霞

摘 要: 论文综合运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分析和调研访谈等方法,通过因素识别和提取,从转化主体、转化模式和转化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8个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基于DEMATEL方法对各影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转化主体的意愿与能力、转化模式的匹配程度和转化环境的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是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概要提出了促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建议。

关键词: 军民两用技术;技术成果转化;DEMATEL方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0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3-0102-10

随着国防科技工业转轨加速和民用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对于提升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研发能力、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尤其是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推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成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为促进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2-3]但现阶段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在专利数、论文数快速上升的同时,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有些技术成果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存在成功率偏低、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缓慢等问题。^[4-5]因此,如何有效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带动国防科技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关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内涵界

定^[6-7]、模式优化^[8-9]、政策启示^[10]等方面,且主要运用内容分析^[11]、比较研究^[12]、案例讨论^[13]等定性研究方法,亦有学者关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能力和效果评价问题^[14-15],但主要基于特定研究视角,并且针对单一评价指标。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成因的成果偏少。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目标和多要素的复杂过程,受到主体能力、要素投入和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16-17]

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分析和调研访谈,通过因素识别和提取,从转化主体、转化模式和转化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8个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基于DEMATEL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找出了关键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航空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影响因素研究”(2016R020);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陕西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19Z145);西安市科协决策咨询课题重点项目“西安市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研究”(201702A);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目“治理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军民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与机制创新研究”(GJJJM202101)

作者简介: 李慧,女,河南永城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产业创新战略与政策;康静,女,山西太原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与管理。

一、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内涵及特征

目前,学术界对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内涵尚未形成共识,通常将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理解为是对已获得技术的推广应用、商品化乃至产业化的过程。^[18]相较于国外研究普遍将技术成果转化视作由科研院所向其他机构团体赋予技术成果商业化的使用权利,国内学者更多地将技术成果转化视作技术成果的后续实验、开发、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的创新活动过程。^[19-20]综合相关研究,结合我国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发展实际,本文将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界定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伴随着技术成果从拥有方到受让方的转移,是实现技术知识从成果化形态向样品化、产品化以及商品化形态转变的过程。基于上述界定,除了一般性技术成果转化活动所具有的创新性、风险性和效益性特征外,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还具有如下特征:

(一) 战略导向性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既要从战略需求中找准科技方向,又要把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印发了《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和促进国防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因此,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不仅仅为了实现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必须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和要求。

(二) 系统集成性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一个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的创新过程,也是涉及成果输出方、成果输入方及技术中介服务单位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技术、人才、组织和环境等要素必须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研究开发、经营管理、试验生产等各个环节相互融合与协调,形成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集成系统,以整合国防科技资源,提高掌握和运用军工尖端技术的能力,从而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集成效应。

(三) 不完全市场性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但军用技术成果的保密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民双方的公平竞争与资源共享,大大增加了军用技术成果向民用领域转化应用的难度,加之目前尚存在的技术成果产权不清晰、军民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对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领域形成了极大障碍。

二、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本部分首先基于关键词词频分析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初步提取出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主题。进而,结合上述研究主题,基于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进行因素提取。在此基础上,运用调研访谈方式进一步识别影响因素,从而构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一) 基于关键词词频分析的影响因素初步识别

运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军民两用技术”“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推广”等研究主题的86篇学术文献,采用ROST内容挖掘软件统计研究样本中的高频关键词累计频次,生成了30×30的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而,运用Netdraw可视化软件构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共词矩阵网络图,如图1所示。

图1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相关的重点研究主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21]可以看出,“军工单位”“高技术企业”“接受主体”与“推广转化能力”之间的连线较为紧密,表明转化主体(包括成果供给主体和接受主体)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类似地,“双向溢出”“转化机制”“信息沟通”之间,“技术转化”与“推广转化能力”之间联系紧密,表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转化模式、转化渠道与技术转化推广能力密切相关。此外,“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工具”“国家战略”“军民一体化”“国家创新体系”之间,“技术转化”与“军

民两用技术”之间关联较为紧密,表明制度体系建设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活动关联性较高。

(二) 基于文献分析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提取

通过上述关键词词频分析可以发现,与“军民两用技术”“技术转化”“推广转化能力”等关联密切的研究主题主要体现为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转化主体、转化模

式、科技成果本身等,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中介服务能力、创新资源投入等。为此,进一步对上述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提炼和分类,并根据各研究主题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可以将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转化主体、转化模式和转化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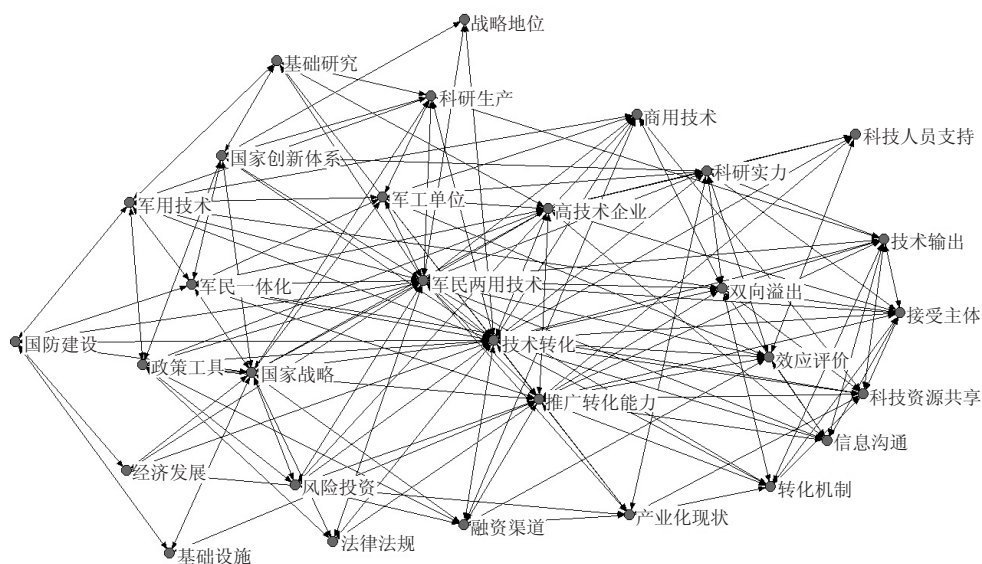


图1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关键词共现图

1. 转化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本质是技术成果形态向应用形态的转化过渡,这一过程离不开各转化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换。军民两用技术转化主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技术输出主体与技术输入主体,输出主体是技术成果的持有者,包括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输入主体是技术成果的需求者,包括企业、军工集团等。^[22]军民两用技术成果从输出主体流向输入主体,进而由输入主体消化吸收后进行转化应用。因此,转化主体的知识共享、应用能力及相互间协同合作的意愿将直接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效果。正如吴海燕等指出的,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能力不足和意识不强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23]此外,由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的特殊性,其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分散在不同的政策规章中,造成产权主体缺位与归属模糊,致使技术输出主体不愿意提供创新成果,而技术输入主体

则不愿意接纳他人成果^[24],最终影响技术转化双方的互动合作关系,加大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难度。由此可以认为,转化主体的能力、意愿及转化主体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促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2. 转化模式方面的影响因素

创新行为模式理论认为,合理运用创新模式能够促进创新要素协同运行及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技术创新产出率。^[25]董晓辉和张莹提出,把握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和成果转化。^[26]目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主要有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及自行转化三种模式,每一种转化模式都需要与技术成果性质、行业动态和外部环境相匹配,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转化模式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是促使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有价值商品或服务的基础。^[27]同时,不同的技术成

果转化模式有着不同的适用边界和应用环境, 转化模式是推动技术成果快速、高效转化的关键。^[28]军民两用技术长期承担军品任务, 门槛高、准入难, 转化模式尚未形成公平的竞争机制, 往往使得民品市场开拓有限。而长期受到政府主导的计划性质的转化模式影响, 使得技术成果转化的系统协同不力, 转化活力不足,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工作难以顺利实施。因此, 转化模式是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3. 转化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

根据系统论思想,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不仅受到系统内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转化过程需要宏观政策支持、科技资源投入以及中介服务平台的介入。^[29]如Raul和Andrea提出国防政策的实施对技术成果推广具有显著影响, 缺乏国防政策支持的企业难以实现技术成果的快速产品化。^[30]政策支持又包含了成果转化资助政策、成果收益分配政策、成果评估定价规则等^[31], 合理全面的成果转化资助政策有益于降低技术中试、再开发的成本, 而收益分配政策则有利于保障转化主体参与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比例, 提高其转化积极性。此外, 王斌和谭美清认为, 必要的科技资源投入是保障创新成果转化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32]郭韬等也指出, 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和原始技术积累是军民两用技术推广顺利实施的资源保障。^[33]同时, 中介服务平台作为技术输出方和输入方之间的桥梁, 能够有效促进转化主体之间信息、知识的交流共享,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如果技术成果转化的中介组织和平台建设不完善, 将导致技术成果转化供需双方难以实现有效对接, 从而导致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偏低。^[34]因此, 外部转化环境是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三) 基于调研访谈的影响因素再次识别

为进一步探索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深层次原因, 初步验证和完善上述关键词网络与文献分析所提取的相关影响因素, 本部分采用半结构化方法对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访谈, 并基于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和提炼。具体做法是, 首先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探讨关键词与文献分析所得出的影响因

素, 以辨析这些因素是否是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 并根据受访者的态度与意见形成访谈记录, 对比、筛选、验证上述分析所得出的影响因素。依托笔者所在高校的军工背景及多年来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所形成的广泛的业务合作关系, 筛选西安市及周边地区的航空、航天、兵器、船舶领域的高校、科研院所、军工企业, 以及产业基地管委会、科技交流中心等单位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作为访谈对象。

通过对访谈记录的分析发现, 我国当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 技术创新人才不足,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基础科研工作难以延续; 第二, 各地虽然都制定出台了鼓励和促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 但配套保障措施和实施细则不到位, 难以落地实施; 第三, 缺乏推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有效孵化和转化的专业性平台。调研访谈结果初步验证了科技要素投入、政府政策支持及科技服务平台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作用, 与上述关键词分析与文献分析所得结果比较吻合。

综合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分析和调研访谈, 本文从转化主体、转化模式、转化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包括8个具体因素, 以 F_1 到 F_8 进行命名, 见表1。

三、基于DEMATEL方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DEMATEL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是美国国家实验室提出的运用图论与矩阵工具进行系统要素分析的方法, 最早由Gabus和Fontela于20世纪70年代在矩阵演算和绘图法的基础上总结形成, 用以对复杂系统各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和识别, 从而找出关键影响因素。^[35]DEMATEL算法因其普适性和机理简洁性成为探索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实践方案, 并在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供应链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6]DEMATEL方法不仅能够区分因素间因果关系的有无和强弱, 并且可以通过对中心度和原因

度两个核心指标的测算,揭示各因素间的因果相关性,并对系统中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37]基于此,本文在前述因素提取和识别的基础上,进

一步运用DEMATEL方法探寻影响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并对相关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表1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分析表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	因素类别	具体因素	符号
	转化主体	技术输出主体意愿与能力	F_1
		技术输入主体意愿与能力	F_2
		转化主体间关系密切程度	F_3
	转化模式	转化模式匹配程度	F_4
		转化模式有效选择	F_5
	转化环境	服务平台建设	F_6
		政府政策支持	F_7
		科技资源投入	F_8

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DEMATEL实证分析

(一) 样本与数据

在表1所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基础上,建立各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调查分析表,采用0—3计分法,将各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从弱到强划分为0、1、2、3四个等级,其中0表示程度最低,该情况下因素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作用,3表示程度最高,表明该种情况下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很强。^[38]数据采集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邮件、网络问卷和实地发放等多种形式采集数据信息。具体面向沈阳、重庆、南昌、上海、西安等国防科技工业发达地区,选取与军民两用技术研发、生产、推广等转化过程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试验基地、政府部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等作为问卷填答对象。同时,剔除问卷填答时间较少和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的答卷数据。

问卷发放周期为2018年8月—11月,共计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25份,其中有效问卷103份,占总回收问卷的82.1%。为了判定问卷调查数据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避免系统误差。首先,对问卷中所有测量项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未旋转因子结构中没有析出共同的因子,并且其中最大的因子解释量为26.548%,说明不存在单独

一个因子解释了大部分变量的变异。由此可见,本文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符合进一步统计分析的条件。其次,Cronbach' α 系数信度检验,问卷题项的总体Cronbach' α 系数值为0.823,且所有题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均大于0.4的删除标准。因此,量表信度检验符合统计标准。同时,文章选取的影响因素测量项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分析而来,并且经过专家咨询、测试修改,保证问卷题项与表述能够较好地反映研究需要,具有良好的效度。

(二) DEMATEL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有效问卷的专家打分情况,并按照DEMATEL算法的多专家信息集成规则,提取包含 F_1 到 F_8 在内8个因素间影响程度的平均值作为对应因素的直接关联程度,建立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39]进而,通过规范化处理公式计算出各因素间的综合影响矩阵,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与原因度等指标。^[40]据此,构建影响因素的DEMATEL因果图,并分析解释系统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具体运算步骤如下:

步骤1:将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设为 $F_1, F_2, \dots, F_8$ 。

步骤2:分析各要素之间影响关系的有无及其强弱,以0、1、2、3分别表示因素 F_i 对因素 F_j 的影响程度,分别为“没有影响”“影响较弱”“影响一般”以及“影响较强”。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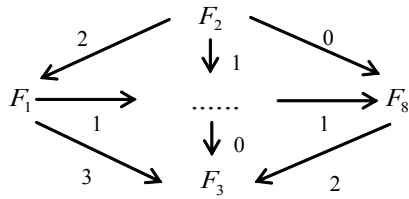


图2 各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图

$$\mathbf{X} = \begin{bmatrix} 0 & X_{12} \dots & X_{1n} \\ X_{21} & 0 \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vdots \\ X_{n1} & X_{n2} \dots & 0 \end{bmatrix} \quad (1)$$

其中 X_{ij} ($i=1, 2, \dots, n; j=1, 2, \dots, n; i \neq j$) 表示因素 F_i 对因素 F_j 的直接影响程度, 同时规定当 $i=j$ 时, $X_{ij}=0$, 见表2。

步骤3: 建立 n 阶的直接影响矩阵, 并设此 n 阶矩阵为 $\mathbf{X} = (X_{ij})_{n \times n}$, 即:

表2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影响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F_8
F_1	0.0	1.2	1.0	1.4	0.7	0.3	1.3	0.4
F_2	1.3	0.0	0.8	1.0	0.9	0.2	1.5	0.5
F_3	0.8	0.7	0.0	0.0	0.7	0.5	0.4	0.6
F_4	0.5	0.8	0.0	0.0	1.5	2.0	1.8	0.6
F_5	0.8	0.7	0.2	0.0	0.0	1.0	1.2	0.7
F_6	0.9	0.8	0.5	1.0	1.5	0.0	1.2	0.5
F_7	1.2	1.0	0.6	2.3	1.8	2.0	0.0	1.4
F_8	0.6	0.8	0.6	0.4	0.5	0.8	0.7	0.0

步骤4: 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mathbf{G}$, 计算公式为 $\mathbf{G} = \lambda \cdot \mathbf{X}$, 结果见表3。其中:

$$\lambda = \frac{1}{\max(1 \leq i \leq n \sum_{j=1}^n X_{ij})} \quad (2)$$

步骤5: 计算综合矩阵 $\mathbf{T}$, 见表4。计算公式为:

$$\mathbf{T} = \sum_{n=1}^{\infty} \mathbf{X}^n = \mathbf{X}(\mathbf{I} - \mathbf{X})^{-1} \quad (3)$$

表3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规范影响矩阵

影响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F_8
F_1	0.00	0.12	0.10	0.14	0.07	0.03	0.13	0.04
F_2	0.13	0.00	0.08	0.10	0.09	0.02	0.15	0.05
F_3	0.08	0.07	0.00	0.00	0.07	0.05	0.04	0.06
F_4	0.05	0.08	0.00	0.00	0.15	0.19	0.17	0.06
F_5	0.08	0.07	0.02	0.00	0.00	0.10	0.12	0.07
F_6	0.09	0.08	0.05	0.10	0.15	0.00	0.12	0.05
F_7	0.12	0.10	0.06	0.22	0.17	0.19	0.00	0.14
F_8	0.06	0.08	0.06	0.04	0.05	0.08	0.07	0.00

表4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矩阵

影响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F_8
F_1	0.08	0.17	0.12	0.19	0.16	0.12	0.20	0.10
F_2	0.18	0.08	0.11	0.16	0.17	0.11	0.22	0.10
F_3	0.11	0.10	0.03	0.05	0.11	0.08	0.09	0.08
F_4	0.13	0.15	0.06	0.10	0.24	0.26	0.26	0.13

								续表
影响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F_8
F_5	0.15	0.11	0.05	0.07	0.07	0.14	0.17	0.09
F_6	0.21	0.14	0.09	0.16	0.21	0.09	0.2	0.10
F_7	0.1	0.19	0.12	0.29	0.29	0.29	0.16	0.20
F_8	0.6	0.12	0.08	0.09	0.11	0.12	0.13	0.04

步骤6: 求解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综合影响矩阵中的每行因素之和为该行对应因素对所有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称为影响度 (D)。另外, 综合影响矩阵中每列因素之和为该列对应的因素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称为被影响度 (R)。其中, 影响度 (D) 与被影响度 (R) 之和为中心度, 相对应的影响度 (D) 与被影响度 (R) 之差称之为原因度。基于此, 可以计算出每个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影响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7	F_8
影响度 (D)	1.14	1.13	0.64	1.33	0.82	1.14	1.76	0.79
被影响度 (R)	1.08	1.06	0.66	1.13	1.36	1.23	1.42	0.84
中心度 (P)	2.22	2.19	1.30	2.46	2.18	2.38	3.18	1.73
原因度 (C)	0.06	0.07	-0.01	0.21	-0.53	-0.09	0.34	-0.05

步骤7: 绘制DEMATEL因果图。以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 (P) 为横坐标、原因度 (C) 为纵坐标建立笛卡尔坐标系, 并运用Matlab软件绘制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原因—结果图, 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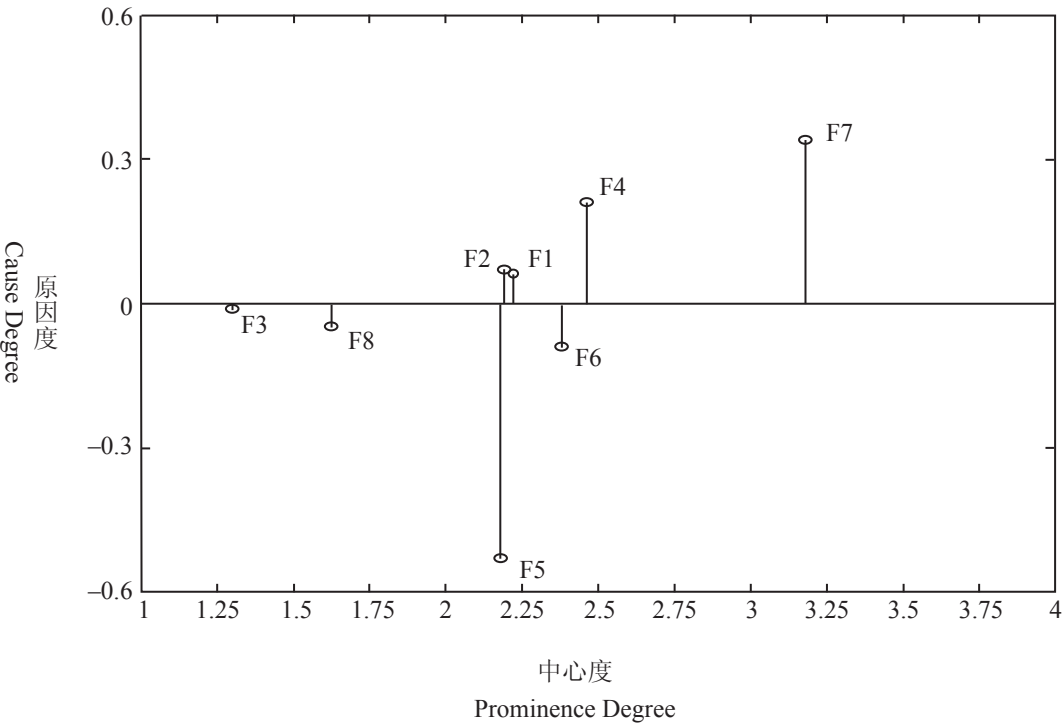


图3 DEMATEL因果图

(三) 结果分析与讨论

1. 基于中心度的结果分析

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指标, 政府政策支持(F_7)排在首位, 随后依次是转化模式匹配程度(F_4)、中介服务平台建设(F_6)、转化主体意愿与能力(F_1 和 F_2)、转化模式的有效选择(F_5)、科技资源投入(F_8)及转化主体间关系(F_3)。表明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代表的转化环境因素在三个影响因素中居于最主要地位, 由此可以认为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中介服务平台建设, 有助于促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化模式的匹配程度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排序第二, 表明构建完善的转化模式对于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亦具有重要影响。转化主体意愿与能力(F_1 和 F_2)的中心度较为接近, 表明军民两用技术输出主体与输入主体在技术转化过程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2. 基于原因度的结果分析

根据各影响因素的原因度指标, 可以将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 原因因素(原因度指标大于0)和结果因素(原因度指标小于0)。转化主体意愿与能力(F_1 和 F_2)、转化模式的匹配程度(F_4)以及政府政策支持(F_7)的原因度均大于0, 表明这4个影响因素作为原因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由此可以认为,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有效实现需要从相关政策支持、转化模式优化以及转化主体能力等相关的影响因素入手。相比之下, 转化模式的有效选择(F_5)、转化主体间关系(F_3)、中介平台建设(F_6)以及科技资源投入(F_8)作为结果因素, 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

3. 关键性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DEMATEL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中心度较大和原因度为正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政府政策支持(F_7)、转化模式匹配程度(F_4)、技术输入主体意愿与能力(F_2)以及技术输出主体意愿与能力(F_1), 说明这些因素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起关键推动作用。其中, 以政府政策支持和转化模式匹配程度尤为明显, 具有较高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一结果也符合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战略导向性和系统集成性的特

点,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与规范, 并辅之以合适有效的转化模式, 保障技术成果转化各个环节的有效运作, 进而推进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而各方转化主体意愿与能力的中心度与原因度指标均比较接近, 表明现阶段技术输出主体能力与意愿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的影响程度总体接近于技术输入主体。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技术输出和输入主体是影响成果转化活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五、结论与启示

推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也是发挥国防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与军队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我国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条块分割、信息不畅、转化水平较低等问题。本文在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内涵与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研究分析及调研访谈分析, 构建了包含转化主体、转化模式和转化环境在内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并进一步运用DEMATEL方法对各影响因素间因果关系及重要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是一个受到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创新过程, 从宏观层面的政策环境到微观层面的转化主体意愿与能力均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进程和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第二,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环境的政策扶持力度越大、转化模式匹配程度越高、转化主体能力与意愿越强,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越容易实现。

基于上述研究,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 聚焦重点科研项目, 健全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实施主体激励机制

营造有利于两用技术创造与应用的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人才奖励制度和科技成果评价体系, 引导和鼓励科研工作者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去, 进而促成重点项目、重点人才落地生根, 逐步形成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效应。同时, 明晰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 规范转化主体的科研生产活动, 实现技术输出方与技术输入方的

协同互动, 并把成果转化工作纳入转化主体科研生产的全过程, 为实现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持续创新、顺利转化奠定基础。

(二) 关注两用技术新动态,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积极关注民用市场需求, 充分利用军工产业尖端科技优势, 发展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高技术产业。同时, 结合农业、旅游业等其他产业发展, 形成多领域的技术改进与发展。以“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合作转化模式, 鼓励相关企业开展和培育新业务, 投身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应用和迭代。同时, 鼓励企业、工业园区及军工产业单位充分利用军民科技资源, 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新途径和新型技术推广模式, 实现多主体共同协作, 助力军民两用技术成果顺利转化。

(三) 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优化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外部环境

构筑军民两用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为科技项目落地铺设便捷通道, 在项目审批、人才引进、社会保障、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优质的管理办法; 在法律、税务、咨询、国际交流等方面提供完善的中介推进服务。同时, 注重军民两用技术重大成果项目研发补贴、专项资金扶持以及地方性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实施,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合理吸收民间资本, 进行市场化管理运作, 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营造良好的条件支持。

参考文献

- [1] 王海, 刘茂长. 军民两用技术转换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3(1): 122-126.
- [2] 汪静, 杨友文, 李钢. 基于AHP-FCE的高校国防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4(10): 48-52.
- [3] 王平, 秦元岗, 贾学卿. 军队科研单位军民融合发展模式的思考——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4(3): 105-107.
- [4] 方茜.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系研究——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J]. 软科学, 2019(6): 18-23.
- [5] 孙霞, 赵林榜. 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的地位与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23): 91-95.
- [6] 董晓辉, 张伟超. 军民两用技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动力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4(1): 143-148.
- [7] 刘希宋, 姜喜龙, 夏志勇. 军民两用技术市场化运行机理及开拓模式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6(S1): 120-124.
- [8] 侯光明. 军民技术转移的组织与政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20-128.
- [9] Acosta M, Coronado D, Ferrandiz E, et al. Patents and Dual-use Technolog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fence Companies[J].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7(5): 1-19.
- [10] 王宏起, 吕建秋, 王珊珊. 科技成果转化的双边市场属性及其政策启示——基于成果转化平台的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2): 42-51.
- [11] 卢章平, 王晓晶.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11): 98-103.
- [12] 侯光明, 葛永智, 唐志超.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比较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9(S1): 98-102.
- [13] 董晓辉, 黄朝峰, 李湘黔. 军民两用技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模式比较——三个典型案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23): 143-148.
- [14] 郭韬, 王晨, 王淦, 等. 基于组合赋权—Topsis的军工集团军民两用技术推广能力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 2017(6): 76-83.
- [15] 薛昱, 张文宇, 杨风霞, 等. 中国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推广战略能力评价——基于双层犹豫模糊语言—MULTIMOORA模型分析[J]. 管理世界, 2018(11): 192-193.
- [16] 章磊, 胡慧姿, 李肇欣.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研发政策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5): 121-127.
- [17] 杨仲基, 王宏起, 武建龙.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及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1): 153-160.
- [18] 董晓辉, 齐轶, 张伟超. 创新驱动发展下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特点及模式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21): 135-139.
- [19] 贺德方. 对科技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若干基本概念的辨析与思考[J]. 中国软科学, 2011(11): 1-7.
- [20] 王吉发, 李娜, 张翠. 科技成果转化影响要素的协同机理研究[J]. 特区经济, 2018(1): 84-87.
- [21] 王小华, 徐宁, 谌志群. 基于共词分析的文本主题词聚类

- 与主题发现[J]. 情报科学, 2011(11):1621-1624.
- [22] 尹岩青, 宫宏光. 装备建设领域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促进机制研究[J]. 科学管理, 2015(13):9-12.
- [23] 吴海燕, 徐芝亮, 韦礼和.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为例[J].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2017(2):26-28.
- [24] 尹岩青, 李杏军. 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7(5):26-29.
- [25] 刘希宋, 李玥, 喻登科. 国防工业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对接模式及实施路径[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9(3):56-59.
- [26] 吴琨, 殷梦丹, 赵顺龙. 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J]. 工业技术经济, 2016(4):9-16.
- [27] 董晓辉, 张莹. 军民融合科技服务机构运行模式与政策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1):131-135.
- [28] 欧晓斌, 李玲娟, 霍国庆. 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规模化转化模式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16(3):108-113.
- [29] 吴玉浩, 姜红, 孙舒榆. 协同视角下知识创新成果与技术标准转化的机理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9(2):7-11.
- [30] Raul C, Andrea L. Company Survey Series II: Finmeccanica Amid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State Control: A Survey of Italian Defense Industry[J]. Defence & Peace Economics, 2013(1):89-104.
- [31] 常旭华, 刘永千, 刘笑, 等. 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目标体系与评估——基于上海数据的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9):58-68.
- [32] 王斌, 谭清美. 要素投入能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果的转化吗? [J]. 科学学研究, 2015(6):850-858.
- [33] 郭韬, 王姝濛, 闫立飞. 军民两用技术成果推广机理及过程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23):1-5.
- [34] 金曼. 经济转型升级中我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研究[J].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15(6):32-34.
- [35] 孙永河, 韩玮, 段万春. 复杂系统DEMATEL算法研究进展评述[J]. 控制与决策, 2017(3):385-392.
- [36] 马跃, 冉爱晶, 朱方伟. 基于GRNN-DEMATEL的工业化对信息化促进效率影响因素分析[J]. 科研管理, 2017(7):154-160.
- [37] 方俊智, 文淑惠. DEMATEL中初始直接关系矩阵的构建方法[J]. 统计与决策, 2017(13):29-33.
- [38] Wu K J, Liao C J, Tseng M L, et al. Exploring Decisive Factors in Green Supply Chain Practices under Uncertainty[J]. Int J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4(1):147-157.
- [39] Hastie R, Kameda T. The Robust Beauty of Majority Rules in Group Decision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5(2):494-508.
- [40] 金卫健, 胡汉辉. 模糊DEMATEL方法的拓展应用[J]. 统计与决策, 2011(23):170-171.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Us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Based on DEMATEL Method

LI Hui KANG Jing WANG Xi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methods such as keyword co-occurrence, literature analysis,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and identify and extract factors to construct an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eight facto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ubject, the mode, and the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DEMATEL method,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among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the transforming subject, the degree of match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us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use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from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dual-us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f technical achievements; DEMATEL; influencing factors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刊,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老图书馆21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域出版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将被视为同意上述声明。不同意网络传播者,请在来稿中注明。